

WORLD
WAR II

蒙哥马利



● 蒙哥马利 著 ● 草之慎之 译编

亲历记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 国防大学出版社

蒙哥马利亲历记

第一章大不列颠的疏漏

当战争的阴霾笼罩欧洲的时候，英军根本不具备与德军对抗的实力

战争一触即发，英国却不合时宜地更换陆军部主帅
德国佬过不来！马奇诺防线流行的口号
优秀的士兵应善于偷猎和偷窃
英国远征军的命运握在一个无名小辈手里

1939年8月28日，我被任命为大英帝国陆军第3师师长。

第3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钢铁师”。我早就料到，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指挥这样的师是最令人惬意的事。我觉得现在的我，真不像是一个刚刚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的人——我在5月份患了重病，我的肺部出现了一个阴影，医生怀疑我得了肺结核。当时我在巴勒斯坦驻防，由于当地的医疗设备实在太差，我的病情日渐恶化，好多人都担心我活不长了，因为我当时虚弱得几乎不能走动。但是，有一种意念在一直支撑着我，觉得只要能回到英国，我就可以健康地生活。于是，他们把我抬到了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当我们的客轮停靠在达苇尔伯里时，我竟然奇迹般地可以自己走动了，并且很快就拿到了一张康复证。之后，我便整天泡在陆军部里没事干，由于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的推荐，加之找再三申请，我终于被任命为第3师师长。

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9月3日，英国政府向全国发出了战争动员令；同时向德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英国政府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嘴硬罢了，因为，此时的英国陆军根本就不具备在欧洲大陆遂行一流作战任务的素质。

在大战爆发的前几年，英国陆军从来就没有组织过一次像样的实战演习，没有一点实战体验。更糟糕的是：军中的通讯设备既少又落后；后勤供应能力极低，差不多等于没有；没有健全的高级指挥机构，总动员后临时凑了一个指挥机构；运输能力很差，为了解决车辆不足的问题，我们征用了部分民用车，但也只能算是滥竽充数而已。

就拿我这个大名鼎鼎的、全英第一流的第3师来说吧，我们的反坦克装备只有能发射两磅炮弹的炮和步兵的0.8英寸战防枪。此外，我们还向法国工厂买了一些安装在小推车上的能发射1磅炮弹的小炮，并且，可怜得很，每个步兵营只能分到几门。除此以外，野炮也被我们拿来反坦克。

我们是发明坦克的国家，在1916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靠坦克赢得了不小的胜利。我们是坦克的最早、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但在1939年的战场上却看不到一辆英军坦克，岂非咄咄怪事。听说在法国境内有我们一个坦克旅，但我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旅的一辆坦克在战场上出现过。

可是，陆军大臣贝利沙向国会提出的远征军到达法境的报告中竟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装备。对此，我与我的同事们引用了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伟大军人威廉·罗伯逊元帅喜欢说的一句话来给以回答：“据我所知，并非如此。”

虽然军队的战斗力与装备和训练有极大关系，但我认为最关键的却是指

挥。

二战爆发时，陆军部里的三个重要人物是帝国总参谋长戈特勋爵；军事作战情报厅厅长庞纳尔少将，他负责所有的战争计划制订及军事情报的收集与运用；地方军监布朗瑞格少将，1939年3月间他将地方军总兵力扩编一倍，可事先竟没有征求帝国总参谋长的意见，甚至都没通知他一声，当时的帝国总参谋长是戈特勋爵，他是看到报纸后才知道此事的。

宣战那天，这三位首长被分别调任为以下英国远征军的新职务：戈特任总司令，庞纳尔任参谋长，布朗瑞格任副官处处长。

这种倾巢而出的调职方式令人不可思议。按规定，战时出国远征的任何英国陆军指挥官都应由阿德孝军区总司令提任。1939年9月，坐镇阿德孝军区的是狄尔上将，当时我们都猜想并一致希望他任此要职。

戈特是个非常豁达的人，是位好心肠的朋友，待人处事完全出于赤诚，对于任何卑劣的手段及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是一窍不通。他担任的部队最高主官是步兵旅长，所以他对于被服和军靴以及战场上小动作和小战术等等士兵该知道的一切都非常清楚。他不聪明，也不太注重后方支援；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战术动作上，并且对在无人地区组织行动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

戈特在哈巴克设立了指挥所，但他却把参谋人员散布到远远近近的13个村落，使得整个总部面积达到了50平方英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通信网开设的艰难。想要弄清楚哪个单位在哪里，简直比登天还难，指挥掌握困难重重。

我一直认为，任命戈特统率远征军是一个大错。因为这一重任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限度。陆军部曾于1939年9月3日给戈特下达了一个由陆军大臣贝利沙签署的训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陆军部曾对远征军总部的配置作过一番合情合理的批评与指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陆军部主官、幕僚对处理类似复杂的问题要比戈特高明得多。训令也曾要求他试办一些他所办不到的事情：他的总部作风必须像个高级司令部，他得对委派给他的战斗和后勤部队行使直接的指挥权。那份训令大意如下：

1939年9月3日

兹特重申你部之任务如下：

- 1、在你指挥下各部队之任务，是与盟军协力，击败我们的共同敌人。
- 2、你隶属于“东北战区”法军总司令指挥。你应坚决执行其所下达的任何命令。经英法两国政府协议，倘你认为其命令有危及英军之可能时，报请英国政府定夺。
- 3、作战初期你所指挥之兵力，将仅限于以两个师编成的军需、总部直属队、军直属队以及交通部队。此外，皇家空军之两个轰炸机中队、四个战斗机中队，以及六个陆军协同中队，均由你指挥。
- 4、野战军序列下之皇家空军部队由你指挥。
- 5、你所需之空中支援，可能非皇家空军野战部队所能胜任。为应付敌空中攻击，可随时向前进空军打击部队指挥官提出申请。

陆军部部长莱斯里·霍尔·贝利沙

下面我们再看看在法国境内的盟军指挥系统：

```
{ewc MVIMAGE, MVIMAGE, !03200670_0005_1.bmp}
```

通过这张指挥系统表可以看出：法军的付未林上将是最高指挥官，英国远征军是在第1集团军序列之下，归华罗特上将指挥。但是，陆军部下达给

戈特的训令，却指示他隶属于“东北战区”，直接听命于乔杰士上将。东北战区方面指挥不明的纠纷便由此而起。

当时，南起龙威、北到北海的盟军部署情况如下：

第1集团军群：下辖法第2集团军、法第9集团军、法第1集团军。固守由龙威向北，经色当直达瓦弗尔一线，其中，亚尔丁—缪司地区由第2和第9集团军负责，这两个集团军大部分由第二流的师组成。

第9集团军左翼，是大部分由一流师编成，而战斗力仅次于英国远征军的法第1军团。

英国远征军：实际并不在华罗特将军指挥下，而是直接听命于乔杰士将军，我所指挥的第3师，是远征军的左翼部队，我的左翼是比利时军。

比利时陆军：是独立的，由比利时国王亲自指挥。

法第7集团军：虽然编在第1集团军群序列下，但乔杰士将军却打算把它作为预备部队，控制在左后方。这项决策是正确的。但甘末林指示，这个拥有7个师兵力的集团军应该指向安特卫普，进入比利时，以支援比、荷两军。结果，人员损失惨重，弹药消耗殆尽，进入比境后一无所成。可以说这是甘末林所犯的最重大错误之一，整个东北战区就因此错误而失去了。

除在指挥方面职责不明外，通信系统竟糟得无法保持正常的联络，以致直接影响到指挥部与下属单位之间正常的信息交流、准确的情况把握和灵活的指挥。自宣战那天起，法方一直坚持所有盟军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静默，以致通讯人员缺少练习，甚至根本没有练习无线器材的机会。大功率的无线电机，对他们来说，更是闻所未闻。结果，在英国远征军里，内部无线通信就从来没有畅通过；对外则等于根本没有。因此，和盟军间的通讯联络几乎全靠民用电话，既谈不上效率，更谈不上“保密”。

此外，从登陆法国起，一直到实际作战行动止，英国远征军总部就从没有实施过任何实战演习，其理由是，因为要保持高度无线电静默，不便实施。于是，在这种借口下，连纸上谈兵都没有什么人去认真搞一搞。其直接后果是：在英国远征军里，普遍缺乏一种对上级指示或战术原则的理解，当上下级之间或友军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便任由这种分歧自生自灭，上级对下级既不去采取什么协调，更谈不上什么确切的掌握。而在战斗过程中，有效的掌握与指挥却关系至为重大。5月23日，毕罗特将军因车祸而亡，使得法、英、比军之间的指挥更加混乱。三天后，盟总才迟迟任命法第1集团军司令卜兰夏将军接任第1集团军群总司令，但已为时过迟。

盟军除利用民间电话作为主要通讯工具外，还采用派遣联络官以及以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访问的方式来加强联系。从5月16日起，陆上交通线便因德军的挺进而陷于瘫痪，东北战区总部和盟军总部以及第1集团军群总部的联络，也于同日突然中断。5月17日，戈特总部和左翼的比军、右翼的法第1集团军以及后方的东北战区总部也中断了电话联络。

戈特的计划是，当作战真正开始时，便率领1个小型的前进总指挥部向前挺进，而将他的总司令部留在阿拉斯。可是，这一计划也由于他认为必须呆在前进总部的军官太多、摊子大大而不得不放弃，最后在前方开设了一个小型的总部指挥所，由于通信设施太匮乏，指挥所的地点不得不迁就埋设国际电缆露出地面的地方，这种地方不但为数无几，而且彼此间距离也相当远。所以，在保密方面就大打折扣。并且，因为无线电通讯器材数量有限，来来往往的大量通讯经常使无线通讯体系超负荷运转。指挥所的规模也因这些本

不必要人员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情报机构也发生了信息不灵的现象。5月15日，英国远征军右翼的法军陷入苦战。集团军群总部虽然在法第1集团军派有联络参谋，但在法第9集团军司令部里却没有联络人员，所以对于德军突破这个集团军正面的具体情况，未能迅速掌握。

仅从上述几点就可以看出，远在战争打响以前，盟军就已经注定了遭受挫折的命运。

我师的辖区是里尔以南一带，任务是加固防御工事。在1939年冬季，我率领部属设立了大量的反坦克障碍、掩体、堑壕和铁丝网，我认为德军很可能在1940年就向我们发动攻击。10月29日，我的军长布鲁克就曾试图提醒戈特勋爵要注意局势的严峻性。但没有奏效。就在同一天，希特勒指示他的陆军总司令，入侵低地国家（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的黄色战役将在11月12日展开。只是由于天气状况太恶劣，才不得不推迟攻击日期。除加强构筑工事外，我还集中全力积极进行实战训练，因为我确信，付早晚要打，并且还会要大打。可当时的一切，却着实让我恼火。当德军席卷波兰时，法国和英国却袖手旁观，坐视波兰失守；当德国大军转向我们的时候，我们竟然无动于衷，甘心挨揍。在这一时期，我们唯一的行动是对德国偶尔进行一次“轰炸”，使用的炸弹则是传单。

1939年12月16日，张伯伦首相视察了我师，当时的情景，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午饭后，他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不信德国人会向我们发起攻击，你看呢？”

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德国人会在他们认为自己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现在已是冬天，我们目前就必须有应付冷天过后事变的准备。张伯伦不置可否。

不论如何，我的词典中是没有“悲观”这个词的，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可供使用的极短的时间内，使第3师处于最佳战斗状态。为此，我利用整个冬季进行战备训练。我的计划是：一旦比利时遭到攻击，我们将向前推进，越过法比国境，占领布鲁塞尔东侧、戴耳河南岸的罗文南北地区。我训练的方式是选定类似距离的空间向南实施武装机动。这样，我们就成为夜间远距离机动的专家。此后，我们又进行了夜间防御阵地占领的训练。到拂晓时分，我们就可以全部展开，坐阵以待。

我的军长是布鲁克将军。我们曾在圣赫斯特参谋学院同时执教，并且很熟。对这位老同事，我一直是相当敬佩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近些年来任何国家所不曾有过的最优秀的军人。我从不拿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让他操心。在战况极度惨烈的时候，我也没有对他下达的命令有过任何异议，也正因为他的所有命令和训令部非常清楚，所以根本就没有提出问题的必要。他对我也极为器重，完全放手，随我发挥。大战结束前，他曾多次对我施以援手，使我免于陷入纠纷，每当其他人要“打倒”我的时候，他永远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当然，有时他也会大发雷霆训我几句，我也心服口服。

冬天来临后，总部指令各师轮流派步兵旅前往火药味浓烈的萨尔地区，据守“马奇诺防线”正面阵地，与据守“齐格菲防线”的德军遥遥相对。我曾于1940年正月到萨尔视察我的一个步兵旅，并在那里体验了几天。那也是我在二战期间第一次看到准备迎接战争的法军，所得印象令我心惊。回到防地后，我马上去见军长，告诉他，我很为法军担心，并预言将来我们会遇到

相当艰难的局面。布鲁克也深有同感，但却无可奈何。

当时，在“马奇诺防线”里最流行的口头语是：“他们过不来！”和“胜利将属于我们！”

我们认为，绝不能把这种情况让我们的部下知道。

1940年5月10日凌晨3时，德军闪击荷兰、比利时。英国远征军立即向东疾速前进，第2军以我的第3师为先头部队。我们的任务是越过边境，占领迪尔河南岸的罗文南北地区。本师在此前曾做过一次预演，因此，此次行动真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十全十美、无懈可击。迪尔河流域地区原来由一个比军师驻守，当时还未曾和德军接火。当比军士兵在5月11日清晨醒来，突然发现有一个英军师出现在他们的防区时，无不大惊失色！当我们在夜间悄悄到达的时候，比利时人都还在做着美梦呢。我去见那位比利时将军，要求立即撤退他那个师，由我接替。他以“没有接到任何交防的命令”为借口拒绝了 my 建议，他表示“只有比军部队才能固守住罗文古城”，这时德军正在步步逼近，前方据守阿尔伯特河的比军正在迅速后撤，罗文地区的部队已经过多，所以我便将部队后撤到比军师的预备队位置。我想，使比军师“撤去”、让我“开进”的最好办法是给比利时人戴上一顶高帽子。于是，我就对那位比利时将军说，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的混乱地区里，必须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来统一调度、指挥才行，而且必须要由所属部队正在据守防地的师长担任。我表示我将服从他的统一指挥。听到这番恭维，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消息传到总部后，布鲁克立刻跑来找我，我胸有成竹地请他放心。我有办法很快就弄走那些比利时人，并且当他们离开后，我就可以变成负责的指挥官。很快，当德军进入炮兵射程，开始射击时，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从比军手里接过了全师正面防务。比军师先是自动转入预备队位置，然后便加入了比军主力兵团。

5月27日，我奉命将本师堵上英军左侧，第50师和比军阵地间的缺口。为达成此目的，全师必须在第5师正面上穿越强行军25英里后，在拂晓前把战壕挖好。在这一区域，曾经进行了一整天的惨烈鏖战，并且在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也没停止。假如一位参谋学院的学员在作业中提出这样一个行动方案，教官和同学们一定会以为他在发狂，没有人会相信这一方案会成功实施。可早。在战况紧急的情况下，根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次运动终于顺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5月28日，我的部队将缺口堵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拚死前进之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却于27日午夜命令比军向德军投降了。我左翼原来是比军部队，现在却成了军事真空地带。我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以图找到一个解除当前危局的最好办法。

此时，后勤供应情况也越来越糟，全部英国远征军都不得不减为半伙。好在战区里的老百姓都已迁走，所以我们能够随遇而安，到处可以找到吃的，当能找到村长或镇长的时候，便拿出证用证换取口粮。事实上，我们从不曾缺过肉食，因为师里的补给组经常就地征用菜牛，牵着牛鼻子随军行动，军中戏称之为“用蹄子走路的牛肉”。记得我在参谋学院学习时，我的教师韦维尔曾经讲过，理想的步兵素质有多种，其中之一便是善于偷猎和偷窃。当然，这只是逃生时的手段，比之杀人的本领要份量轻一些。

远征军总部于5月28日转移到拉潘，之所以选址于此，是因为通到英国的海底电缆在此入海。所以，一直到最后，都可以和多佛尔英国本土保持畅通的电话联系。我师于5月29日深夜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翼的海滩阵地，

任务是据守福厄恩斯和纽波特间的海岸线。我的师部便开设在拉潘郊外的沙岗里，远征军总部在海边的一栋房子里，这时的总部只剩下了戈特和几个参谋。

30日凌晨，布鲁克来看我。他告诉我他已接到回国的命令。他表现得非常烦躁。他是一个热情但容易激动的将军，要他在关键时刻丢下他的部队不管，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我记得，当时他很激动，上身佝偻着，好像在哭的样子，我们并肩站在沙丘上默默地望着东方喷薄欲出的旭日，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尽量地安慰他：我们必须将最优秀的将领们尽快撤回去，因为大战事在即，纵使我们全军覆没，他也得安全回去才行。他告诉我，英伦方面已经决定由我继任他的第2军军长职务。这消息使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是第二军里资历最浅的少将。布鲁克当晚就回国了。

30日晚，戈特勋爵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对所属各部队下达命令。那时我已经升任第2军军长，所以也应召出席。自从5月10日作战行动开始以来，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我的军部离总部相当近，在开会前我便赶到总部和他谈了一会。表面上，他一如平常，笑容可掬，可这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苦闷。

在会上，他宣读了政府发来的关于最后阶段撤退的指示电报。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应尽力固守现阵地，以保证全军顺利撤退。每隔3小时呈报一次战况。如果通信联络能保持畅通，且已撤退至可由一军长负责指挥之时，本部会另令通知贵部返英时机，届时贵官须挑选一军长随行。获电后，你可自行指定一个最后负责的指挥官。如联络中断，则可等残余之有效兵力相当于3个师之际，自行交代返英。贵官当严令被选定之军长，应与法军协力，在防御作战后，相机自敦刻尔克或其他海滩撤退。但如不可能继续重创敌军之际，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法军指挥官协商，停止抵抗，以免无谓牺牲。”

大家都认为，戈特会指定亚历山大少将作为他离开战场后的英军指挥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亚历山大本人甚至不曾出席那次会议。

那天晚上出席会议的两位军长，是第1军的巴克尔中将与刚刚接管第2军的我。而巴克尔任第1军军长，是4月间的事。

戈特完全照陆军部的电令行事。他命令我率第2军在第二天夜间——即5月31日夜至6月1日晨间——开始撤退。第一军断后掩护。戈特还再三叮嘱巴克尔，万不得已之时，可以率残部投降。那晚的会议便如此宣告结束。当大家都离开后，我找到戈特，对他直言相告，我说，我认为巴克尔不适于担任这一艰巨任务。我们需要一位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指挥官来担此重任，因为，在这种指挥官统御下的第1军，只要运气不太坏，是有可能全部退回的，根本用不着考虑什么投降的事。我还向他建议，应该立即将巴克尔遣送回国，而派其部下——第1军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少将接任第1军军长。我深知戈特其人，所以话说得直截了当。我坚持说，这才是最正确、最明智的措施。

戈特采纳了我的建议，立即把巴克尔遣送回国，亚历山大升任为第一军军长。现在远征军里的两个军，都是由少将级的军长指挥。亚历山大就职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在拉潘碰了头，就当前的局势交换了意见，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都确信，远征军一定能全部安全撤退。结局也一如我所料，亚历山大将军终于凭借他那种坚定、从容的作风使全部人马都安全从敦刻尔克

撤回。在亚历山大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最后一刻离开敦刻尔克的情景：“在最后一晚，我与海军上将比尔·坦南特一起乘坐一只海军小艇巡视海滩，查看是否还有什么人没有撤退。当查明全体断后部队均已安全离开后，我登上了停在防波堤处的一艘驱逐舰。这时，这艘驱逐舰遭到了德国机枪的射击。”

5月30日晚，我主持了一次第2军师长会议，在会上，我下达了在第二天晚上由海滩撤退的命令。

那天晚上拉潘的情况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敌人的炮弹像飞蝗一样落在我们举行会议的那所房子的四周。我命令各师，所有不能在海滩上登船的官兵都要沿海滩向敦刻尔克转移，在丹镇海港码头上船。

第二天晚上，在预定的时间内，我们开始撤退。海滩上的装载状况不太好，因为有些临时搭起的栈桥已经垮了；很多官兵不得不徒步走到敦刻尔克。正当我站在海滩上指挥撤退行动的时候，我的随从参谋被一块炮弹片击中头部，我当即大骂他不该大意得连钢盔都不戴，可是我却没意识到我也没有戴，当他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提醒我的时候，真让我啼笑皆非！他的名字叫查理。史温尼，是个非常潇洒的爱尔兰小伙子，来自勒斯特步兵团，我对他特别钟爱，在二次大战期间，他差不多一直跟随着我，最后，不幸战死在法国。等部队都搭载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便和李希准将沿着海滩向五、六英里外的敦刻尔克走去。6月1日拂晓，我们在敦刻尔克踏上了一艘驱逐舰。当天上午便顺利地回到了多佛尔。

我在前文里曾经说过，任命戈特为英国远征军统帅是一项严重的错误。直到今天我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但我们应该了解的另一点是：拜受军符大命后的戈特面临的的是一个多么难整理的烂摊子。然而他却勇敢地接受了这副重任，并且鞠躬尽瘁、竭尽其所能。虽然有许多该办的事他都没办，但我个人认为，其症结在于他用人不当——他选择的那帮人都不够优秀。他虽然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之才的将领，但他看清了眼前的事实：法军土崩瓦解，他必须尽量将他所率领的英军撤回英国。据我所知，取道敦刻尔克的撤军计划，5月21日前后就在总部开始起草。但戈特却从没有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过；他自始至终能够稳如泰山地坚持他认为唯一正确而适当的途径。记得当毕罗特将军于5月21日失踪，盟军之间联络中断时，戈特就本着协调的精神，采取了他本人认为最恰当的行动。他的行动受着一种责任感的支配，他对帝国政府负有确保英国远征军安全的责任。他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头听取我的忠谏罢免巴克尔，启用亚历山大出任第一军军长。并赋予最后撤退的重任，也完全是基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

正由于他能毫厘不爽地洞察眼前的状况，我们才能从敦刻尔克全师而退。假如换上另一位“聪明”的将领，他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对策，可能会试图回师直趋梭姆和法军取得联系。然后远征军的全体官兵将被德军解除武装，押解到北非集中营看管！

戈特清醒地认识到，“至少”他必须将远征军的将士们及其轻装备安全地带回英国。可以说，正是他挽救了英国远征军的全体官兵，也正因为这些官兵获救，我们才能在日后卷土重来，洗雪此次败北之耻。

第二章 命运的召唤

丘吉尔那悲壮、慷慨的呼声响彻英伦三岛

我让丘吉尔在半天的时间里看到了他想看的一切

丘吉尔：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介意

观察部队时你应让士兵脱下钢盔，看他们眼里有没有战胜一切的勇气

陆军部：蒙哥马利应到埃及去

6月2日，我赶到陆军部向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报到还职。

这位老友显得非常沮丧地说，“你可知道，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二千年来第一次遭受入侵的危机？”

看到他那副神气，听到这种论调，我不禁失声大笑。我的放肆激怒了他，他瞪着眼睛问：“有那么可笑吗？”我说，“英格兰人民绝不相信我们正面临着遭受入侵的危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目前有些肩负本土卫戍重任的将领们是些庸碌无能之辈”。他没有否认我的看法，但却一再叮嘱我不可再谈论此类问题，因为这种忧世愤俗的论调，除了使国民夫去自信心外，将一无是处。我从此绝口不谈此事，不过，那些庸碌无能的将领们也一个个相继绝迹。

那天布鲁克也去晋见了参谋总长。他请示总长，目前他的任务是什么？迪尔的答复是：“回法国去，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布鲁克知道，法军马上就要完蛋了，这样做只能把他匆匆组织起来的任何部队拖进深渊。但命令已下，且已给了他两个苏格兰本土师，一个是第51高地师（当时仍在法国，在南部和法军一起行动，避免了敦刻尔克之灾），一个是第52低地师；还有一个唯一的装甲师的残余部队；加拿大第1师以及其他的零散部队。布鲁克提出要求，想把第3师也搞到手，但迪尔表示不行，布鲁克坚持非要不可，最后二人达成一致：等第3师重新装备后，即重渡海峡，返回法国。

虽然我在敦刻尔克已经做过军长，但回到英伦后，我却要求再任第3师师长原职，以便能对之加以整编，使之能肩负未来反攻之重任。

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官兵都已回到了英格兰，但很多英勇的将士为了掩护主力撤退，在敦刻尔克海滩壮烈殉国了。除了单兵武器外，我们的重武器和重型装备也大部分遗留在法国境内。

当时，英国尚有足够再装备一个整师的运输工具和武器。陆军当局决定将这些器材全部交给第3师，以便能早日完成整编，相机再渡海峡，加入仍在和法军并肩苦斗中的英军残部。这项决定对第3师无疑是种无尚的光荣。布鲁克已内定为新任远征军总司令，所以，我们第3师全体官兵厉兵秣马，静待驱策。

我们在萨摩塞特完成了整编，接受了新装备。到6月中旬，再渡海峡的战备全部完成，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誓师东渡。可是，法国却在6月17日全部陷落。

这样一来，一切的轻重缓急顺序都改变了，英国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德军的入侵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我的第3师便被调到最容易遭受入侵的地区——布赖顿同围的滨海地区，我们在海滨别墅里选择最理想的地方设立机枪阵地，构筑工事。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主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市长们、郡议员们、房主和地主们相继要求我们立刻停止工程，但均被我当场严辞拒绝。

法国崩溃后，英国面临的困难仍是老百姓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意义及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在许多人心目中，英国远征军能脱离敦刻尔克逃回是英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看到军服袖上绣有“敦刻尔克”字样的英军士兵们招摇过市，自视甚高，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他们也被当作了了不起的英雄，竟没人意识到英军是惨败，也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居住的这片国土正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举国上下没有一丝大战将至所应有的紧张气氛。最后还是丘吉尔的大声疾呼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那悲壮慷慨的呼声，当即即为全英人民像赞美诗般地争相传诵。民族精神被振奋起来了。

1940年7月2日，丘吉尔首相及其夫人到第3师视察，我对政治家们兴味索然，我一直认为，他们除了增加我的麻烦外一无所能。但是，对于这位政治家，我却不得不另眼相看，因为远在大战爆发多年以前，他就一再告诫历届政府，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事，但是，言者虽然谆谆，而听者却懵懵懂懂。结果，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全被他不幸而言中。

另外，首相在新式装备方面的敢于探索试验以及应用等也值得我为之倾倒。坦克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就是阵地战，一方据守阵地，另一方拼命夺取。当时，德军的装备远比英法联军精良，尤其是他们大量地使用了机枪，再加上由铁丝网、铁蒺藜、战壕、掩体等防护器材，组成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德军很善于打这种固守阵地的阵地战，而英法方面在攻打这种阵地时，其步兵、骑兵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伤亡很重。当时迫切需要一种既能防护又能进攻的武器。

军事作家欧内斯特·温斯顿面对战场的悲惨景象，联想到了中世纪时骑士穿着的盔甲和美国的履带式拖拉机，他把二者有机地溶合到一起，作下一个大胆的设计：用拖拉机进攻敌人。给拖拉机“穿”上厚厚的防护钢甲，配备上猛烈的火力装置，让士兵们在里面射击，不就可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了吗？可是，这一设想被陆军大臣给轻蔑地否决了。当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听说了这个设想后，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他的干预下，第一辆坦克终于在1915年8月问世了，并在索姆河一带中首次使用，使得英军仅以平常伤亡的5%的死亡率就夺取了多次未曾夺取的敌阵地……

我一直不知道那天丘吉尔对我的印象如何，但他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我尽量使他在半天时间内看到一切该看的东西。我引他到“皇家乌勒斯特步兵营”驻地的“兰荪学院”视察了一次演习。反攻目标是海岸上的一个小飞机场，演习状况是假定登陆入侵的德军已经占领了这个飞机场和海岸地区。他对演习大为欣赏，尤其对营属轻机枪载运车排的动作更是赞不绝口。之后，我又引导他视察沿岸的工事设施，当晚七点三十分，我们到达视察的终点——布灵顿。他特别邀请我在“皇家阿勒比容饭店”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他问我喜欢用什么酒佐膳，我的回答——“水”，令他大感震惊。我说，我既不喜欢喝酒，也不爱抽烟，所以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健康。他毫不思索地回复我，他虽然烟酒二毒俱全，可是却能保持百分之百的健康。随后，我们把话题又转到了部队上面，我乘机向他进言：“我这个师是目前全英唯一的装备齐全的师，是最长于打运动战的师，这一点已在敌

人面前精彩地表演过，但现在让我们执行的这种挖掘壕沟、站岗放哨的做法简直就是胡闹。总部应该给我配备足够的车辆，向内陆后撤一段距离，以便能够作为一支机动力量实施反突击任务，来堵住并消灭可能登陆成功的任何敌军，从而阻止其建立后勤保障、后续师源源登陆的桥头堡。而要使这种作战方法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演习，第3师必须拥有足够的必需装备。可是，现在我的师根本就动不了，怎么办？目前国内有成千上万辆公共汽车，给我一些这种东西也行啊！”

首相被我的话打动了，连连点头，并称赞我的意见很好。第二天，他就口授了一份备忘录：

陆军大臣：

我看到第3师沿着30英里的海岸线展开，而不是像我所想像的那样在海岸后方集结，作为机动部队以对付大规模入侵的敌先头部队。对此，我深感不安。更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师的步兵缺乏必要的车辆将他们运往作战地点，否则，它一定是一个完全机动的师。对任何机动部队来说，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随时作好准备、在附近待命的运输车辆。对沿着海岸展开的第3师来说，尤为重要。

我听说朴茨茅斯方向的部队也有同样的怨言，他们也没有随时待命的运输车辆。考虑到英国大量的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而且从英国远征军中又回来了大量的驾驶员，应有可能立即弥补这一不足。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天一定要告知第3师师长，让他全部接管（他会高兴这样做的）甚至现在还载着游客往返行驶在希赖顿海滨公路上的大量公共汽车。

丘吉尔

我不知道陆军部看到这一备忘录后作何感想，但我却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汽车。

1940年7月，我升任第5军军长。从那时起，我的一切想法和做法才开始对国内陆军训练产生真正的影响。第5军的一切措施和成就都具有带头作用。1941年4月，我又奉调接管驻肯特的第12军，肯特正是预期中的英格兰可能遭受入侵的重点；1941年12月，再奉调升任东南守备区司令官，负责肯特、苏雷和苏塞克斯三郡。于是，我的思想和理论、我的训练方式和方法终于由极西的多塞特一隅沿着英格兰南部地区北上，直到泰晤士河口。

我的指挥经验与日俱增，我终于能借实战来检验我的理论。由于在这两年间，我曾追随一些精明的长官，所以收获颇丰。在第5军，我的长官是南方防区司令官奥钦勒克，我们两个几乎从没达成这一致。幸好不久他便调任印度军总司令，而由亚历山大和培吉特继任；布鲁克则先后历任本土军总司令和帝国参谋总长等要职。这三位上司都了不起，我对这三位具有男子汉风度和军人气概的老长官由衷地表示钦佩。

这两年问，我精心钻研的课题是体魄和精神战备如何加强的问题。当时英格兰陆军的这两种战备水平离战争要求相去太远。当我想起著名诗人齐霖在他的“陆地海洋赋”里的序诗，再看英国军民浑浑噩噩的情景，不禁为之怵然：

民族沉沦不着痕，史家论断最无情；若问亡国因何在，百姓巽懦气不伸。

就任第5军军长后，我便严令各部应以艰苦卓绝的作风锐意训练。所有训练必须尽量利用各种季节和天气状况，反复实施。无论在大雨滂沱之时，在冰天雪地之中，或是在泥泞没胫的地形上，在恶劣的天气里，无论昼夜寒暑，都必须比德国人干得更出色、更精彩。假设德国人只能在良好的天气状

况下打得好，那么，我们便应该不论天气、不分昼夜地打，而且能够发挥最强的战斗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垮他们。所有的训练计划都将较高层次的演练包括在内，重点着眼于各级官兵实战精神的发挥和创意工夫的陶熔。师级以上的大规模演习，必须要特别注意如何磨练各级部队主官、幕僚和广大官兵的吃苦耐劳精神，使全军上下都能在长时期内达到不眠不休的作业和战斗行动的程度，使各阶层都能了解如何运用 24 小时的作业编组，以节约精力。

任何阶层的部队主官和参谋人员如不堪忍受这种考验，便立即给予淘汰。

总体性战争所需要的是一种上自将帅下至士卒的总体性体魄和精神。每当一次积极的实践学习结束之后，各种文书便纷至沓来，参谋文书人员全都足不出户，在办公室里埋头伏案穷忙。于是，我下令全军各级司令部的全体官兵，每星期都得抽出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做一次 7 英里的跑步运动，45 岁以下人员不得有任何例外，不愿意跑的可以走，但必须走完 7 英里。规定实施之初，怨声载道，群情激愤，但尚能按命令去做，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渐渐地连年龄超过 45 岁的也纷纷自愿参协。记得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上校到军医那里诉苦，说假如要他跑完这 7 英里的话，简直等于要他的老命；于是，军医陪他来见我，并向我建议豁免这位上校。我问他，是不是要跑的话会跑死，他眼中闪出一股希望之光，答到“是的”！我告诉他，假如自己认为会跑死，那就干脆跑死算了，因为这比补充他的损耗缺额要省事些。他的健康状况确实不佳，所以我宁可让他跑死。结果，他只好服从命令参加跑步，并且到今天还精神饱满。

当时军中最迫切的问题是尽快大刀阔斧地砍掉那些“朽木”之辈。军中多一名这种分子，便会影响到干练有为的青年军官们的旺盛斗志和独创的主动精神。很多年迈的预备役军官这时都奉召复役；许多由少校以上的现役军官根本就没有听过战场上的枪声，绝不肯冒险上阵。这些军中“朽木”必须连根铲除。我走遍了每个单位，认识了所有的中上级军官，以及很多下级军官；一段时间后，我把这帮绊脚石们全部请了出去。

我还处理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按照当时英军的习惯，军官眷属、家小全都随军行动，散住在随时都可能遭受敌人入侵的海岸附近的村镇里。鉴于当时的紧急状况，我下令所有的军眷和家小立刻离开，不准住在负有海防任务的防区里面，我在命令中陈述了这样做的理由：

“德军的入侵随时都可能在沿海地区发生，而我们部队的任务是迎击并摧毁敌人的入侵行动。倘若军官们携家带口地驻在防区，那么，一旦发生情况，他们基于人之常情，势必首先考虑她们的安全问题，因而便会影响到所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执行，有人说，一个优秀军官在此种情况下，决不会有片刻时间想到他的太太和家小，他的全部思想必须高度集中在战斗行动上。我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无论如何，人终究是一种天性脆弱的动物，我实在为敢听任我的手下因无法逃避天性的纠缠而有负职守。这项撤退军眷的措施可以说关系着英格兰的命运甚至人类文明，这种天性的纠缠因素一旦去除，一切都将毫无问题。此外，因为士兵们不能携家带着，所以军官们也应该以身作则。”

我在命令中强调，军眷们必须立刻离开防地。很快，这道命令便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指挥阶层意识的澄清与责任感的强化事关重大。我必须将强烈的紧迫感注入每个官兵的心灵深处。使各级指挥机构保持健全。对不胜任和低能的主官或降职使用，或撤职换人。

参谋人员的素质也必须加以提高，必须树立绝对的服务精神和技能。事实上，全部陆军都需要加强体魄与精神战备，以及遂行战斗的技能。

达成这种目标的先决条件在于部队主官是否配备齐全，是否明确他们的职责和任务所在，是否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就我所知，鼓舞奖励各级青年将校对于达成这种目标可以产生极大的作用。

当时在军中还有若干潜在的威胁，必须随时加以提防。譬如，参谋和主官之间的关系；譬如，负责支援的单位可能会认为战斗不是他们的事。殊不知，战斗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战斗训练。

另一个潜在威胁是，在少数部队里有一种危险思想，有人认为英国和英军已经“挨过了”，这在当时竟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口头语；还有一种人认为德国人是无敌的，是不可战胜的。

最后一个威胁，也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从敦刻尔克撤回来的人们，有许多已开始沉湎于家庭的温馨，他们忘掉了或不愿正视战争尚在进行，威胁仍然存在。针对这种危机，我特作规定：官兵们可以按照正常渠道休假，以便和家人团聚。此外，当艰苦卓绝的训练告一段落后，我总是让官兵们回到舒适的营房饱餐一顿。

根据存在的各种可能的危机，我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逐渐将强烈的紧迫感注入到每个官兵的心灵深处，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重新站稳了脚跟。

我的训练演习的逼真艰苦程度，可以说在英国前所未有的。这些演习多选在严寒季节或盛夏。当官兵们已经筋疲力尽、部队主官和参谋们也难以支撑时，立刻我便会让它们“面临”新情况或新课题。

当时，我在不列颠防卫问题上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同，一般人是着眼于海岸线上的每一寸土地都以重兵固守，凭借海岸线上的钢筋水泥碉堡和堑壕工事遂行固守一线的防御战斗。

这种防御部署既无纵深，又缺少反攻兵力，非常薄弱。遍及英格兰的每个角落都挖掘了“阻截阵地线”，究竟用什么部队进驻这些阻截阵地？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

我则将部队由海滩撤回，控制在后方，伺机反击入侵的敌军。我认为敌军经过渡海机动的颠簸之后，肯定已经晕晕乎乎，难辨东西，此时便是对入侵者加以反击并压迫入海或歼灭的最佳时机。

在海滩上，我只配置了一部分轻装部队，这支部队只要装备有性能良好的通讯器材和充足的火力，便足以迟滞或挫败入侵者的任何登陆行动。

我的防御思想是：构成一种蛛网般的防御体系，无论德军走到那里，都必将遭受到猛烈射击之后的有力反击。

对白厅主张的“焦土政策”我也持异议。他们认为，当德军由海岸进入内陆、向伦敦前进的时候，为了不使物资落入敌手，应该在退却的同时将沿途一切纵火烧毁。我则坚决表示我们决不会退却，在我的战区里，我们肯定能击败德军。

事实上，当时我已经着手训练“不会退却的部队”，我向他们灌输旺盛的攻击精神和必胜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发自健壮的体魄。视察部队时，我

常让士兵们脱下钢盔，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看他们的头发是否剪修得合乎规定，而是要看他们的眼里有没有战斗意志的光辉。

1942年，“联合作战指挥部”参谋处制订了一份袭击迪耶普的作战计划，陆军部分的计划由我负责。此一行动的计划初衷是这样的：联合作战指挥部认为，要想顺利地返回欧洲，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预先夺取一个良港，并且必须在敌人能全部摧毁其设施以前全部占领这一良港。由于此前制订的大规模反攻欧洲大陆的“围捕”计划和对法国实施小规模突击的“大锤”计划被取消，所以，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参谋长们便强烈地感到应该对横渡英吉利海峡作一次尝试，以便从实战中发现夺取一个港口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对诸多可供选择的港口进行的周密研究表明，迪耶普是最好的袭击目标，它位于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有一些合适的军事目标，有一个雷达站，一个机场，各种炮兵连，还有港湾和船舶。当时决定由我的部队担任地面袭击任务，后来又决定派加拿大军第2师为袭击部队。袭击部队预定在7月2日和3日两天，完成两栖装载，4日或5日开始行动。部队完成装载后便听取详尽的任务传达，然后，便“关闭”在他们的舰艇里，不再和外界接触。7月3日夜间的天气状况极不适于遂行突击行动，这种恶劣的气候一直持续到7月8日还不见好转。于是，部队又纷纷卸载，回到营舍。所有的官兵对突击目标及有关作战详情都已非常清楚，按常情，迪耶普突击作战很可能成为英格兰南部各营区里茶余饭后的谈料，因为参加这次突击装载的，除近5000名加拿大陆军官兵外，还有数字可观的海空军官兵。当部队奉令“解闭”归建时，我自忖这次突击作战一定会中止，于是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

但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决策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决定再度实施原定计划，并于7月底呈奉英军参谋首长裁决。听到这一消息，我不禁为之愕然，因为这一行动已不是什么机密。于是我便写信给本土军总司令培吉特将军，建议停止这一行动。我认为，假如有向欧洲大陆袭击的必要的话，目标也不应再选在迪耶普。可是我的建议未被采纳。

8月1日，我离开英格兰前往北非沙漠，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新职。

对迪耶普的袭击在8月19日实施，当时，首相正和我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我们是在当天夜里接到消息的。

加拿大第2师以及和他们并肩战斗的突击队及海军部队，全都打得非常精彩。不过加军的损失极为惨重。在加军的战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加拿大陆军以不足5000的兵力，对迪耶普遂行了仅仅9小时的袭击战斗。可是在这一战斗中被俘官兵之众，却相当惊人。尤其让人不忍卒睹的是在这短短的9小时中，竟有56名军官、851名士兵阵亡，被俘以及各类伤亡总数多达3369名。

我认为迪耶普之役的最大缺点是犯了“一国三公”的错误。本来这种作战从计划到最后突击行动的完成应该由一个单一的特遣部队指挥官统筹指挥。但在事实上，主管当局却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此次作战对诺曼底登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但此教训所付的血肉代价未免太高了些。

但是，人们却把此次进攻失利的责任归结于我事先同意不在开始前实施对目标的集中轰炸，真正是冤哉往也！

1942年8月初，我们在苏格兰实施过一次大规模演习，当时的本土军总司令培吉特将军请我去观摩。在演习期间，一连串大事相继发生。演习开始的第二天，陆军部用长途电话通知我立刻赶回伦敦，他们让我继任亚历山大的第1集团军司令职务，马上到艾森豪威尔手下开始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制订

工作，登陆行动代号为“火炬”，预定时间为11月登陆。亚历山大已前往北非就任中东军总司令。我立刻赶回伦敦，前往陆军部报到。在陆军部，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必须先找到艾森豪威尔，共同制定计划，时间非常紧迫。我想，在三个月内就得向北非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作战计划却还没有着落，并且我与艾森豪威尔也只是一面之缘，困难很多。出了陆军部，我便立刻回到我的司令部，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想法。无论如何，我已在英格兰足足呆了两年，现在也正是该动动的时候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陆军部突然通知我，昨天的计划取消了，让我立刻到埃及接管第8集团军。

事情很突然，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后来我才得知了此次升迁的内幕：7月初，布鲁克决定到开罗去，以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亲自调查直布罗陀、马耳他、波斯、伊拉克地区的情况，最后与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就印度方面边界的防御问题进行了秘密磋商。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关于第8集团军，布鲁克则这样指出：“很明显，在那里有些事从根本上搞错了，只是现在很难判明这些事究竟错在哪里，错到什么程度……危机已经来临，我必须亲自去调查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此，我要单独去。”7月15日，布鲁克抓住一个有利时机，说服丘吉尔允许他进行这次旅行。但是，到了7月30日，即他动身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首相也决定去。于是，一个代号为“手镯”的丘吉尔调查组在8月初到开罗集中起来了。他们将决定第8集团军的命运。

新加坡、缅甸作战失败以来，第8集团军所在的地区是英军唯一的在积极作战的地区，在这一地区，英军的大部分装甲部队已遭受到惨重损失，而且已经被迫后撤了400英里，尼罗河三角洲及苏伊士运河都处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而苏伊士运河则直接关系到盟军的行动自由及盟国的经济和战时补给。这一地区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作为首相和国防部长的丘吉尔，此时无论从公还是从私，都急需一场象样的胜利。但第8集团军司令官奥钦勒克此时也担任中东军区总司令。很明显，他没有能力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

8月3日晚，丘吉尔刚到开罗就召见了提前赶到的布鲁克，他们一直谈到凌晨1点30分，主要谈的就是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人选问题。丘吉尔建议由高特来担任，但高特此时正担任第13军军长。布鲁克认为，高特虽然是沙漠战的老手，但他到底年事已高，太老了。丘吉尔不太满意地说：“那你来安排好了。”

布鲁克一大早就跑到奥钦勒克那里去做说服工作了，奥钦勒克表示同意让我去他那里。

但由于史末资元帅（当时的南非总理，英军元帅）也在开罗，他也认为让高特接管第8集团军要好一些。

于是，8月6日早晨，布鲁克刚起床正在穿衣服的时候，丘吉尔“几乎是光着身子”突然闯进了布鲁克的卧室，谈了自己的安排，布鲁克此时已无法可想，也就只好同意。于是，8月6日，首相驰电战时内阁，建议：将伊朗和伊拉克划出中东军总部的责任范围；以亚历山大接替奥钦勒克；任命高特为第8集团军司令，让蒙哥马利负责“火炬”行动（进攻西北非）。亚历山大于8月9日到达开罗并会见了刚由沙漠回来的奥钦勒克。第8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则经奥钦勒克指定，由第30军军长卢姆斯登将军代理。

命运之神是令人永远都捉摸不透的，刚刚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的高

特乘坐一架速度缓慢的运输机沿阿拉伯堡——赫利奥波利斯航线（这条航线被认为百分之百的安全，因此，即使丘吉尔飞行时也没有飞机护航）飞行时，一架被从高空赶下来的德国战斗机看见了它，把它击落。高特亦因此丧命。

于是，丘吉尔首相、布鲁克总长和史末资元帅当晚便决定由我担任第 8 集团军司令。

我的对手将是大名鼎鼎的以沙漠坦克战而著称的常胜将军——“沙漠之狐”隆美尔。

对隆美尔其人我早已久闻大名，也早就想较量一下，这一来正对我的胃口，我自信能胜任此职，能打败隆美尔。

第三章 历史的机遇

我对沙漠战一无所知
“向导”把我们带进了雷区
摸清“沙漠之狐”的习性
指挥官更应成为偶像
惹眼的双星软帽

我一直认为，我的“统御”的指挥学理论是我毕生建功立业的最重要因素。记得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经说过：“所谓有统御才能的领袖人物，乃是具有能使人欣然从命，具有使人为所不愿为的能力的人”。我认为，“统御”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得清楚的。我对“统御”的评介是：一种凝聚男女于共同目的下的能力与意志，一种能激发、鼓舞信心的性格。仅仅具有能力还不够，领袖人物必须善于运用这种能力。他的统御风格必须建立在真理和性格的基础上，对于真理的需要，常常不易为一般人所体会理解，领袖人物对他的部属一定要讲真话，否则他们对于他的信心很快将发生动摇。当然，对于士兵们不一定要告诉他们全部真相。

“决心”是种事关重大的要素。军事领袖唯一的信条，便是在行动中的“决心”和在危机中的“镇静”。政治领袖们也如此。领袖人物必须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必须要目标明确，并竭尽一切手段达成目的，他必须使每个人都知他需要什么，他决策的基础与依据又是什么。事实上，他必须能给部属们坚定的信心和明确的指导。领袖人物必须能造成一种“气氛”，使部属们生活工作在这种气氛当中。

北非的地理形势和我过去经历的迥然不同。当时我们的作战目标是亚历山大以西的大港的黎波里。在亚历山大和的黎波里之间还有诸如图卜鲁格和班加西等小港。在阿拉曼和的黎波里间的一般地形则是一望无垠的荒漠。其中的三大战略要点是：

第一，由亚历山大到的黎波里的那条柏油路面的滨海公路。这条公路是连接两大海港的主要补给线，也是主要的兵力运动线。

第二，“绿山”丘陵地区，大概位置在图卜鲁格和班加西之间，有时称之为昔兰尼加“突出部”，通常则简称做“杰贝勒”。这一带丘陵是一片要区，在以前的历届战役里，交战双方通常是迂回而过。假如以精锐部队固守，然后相机南向攻击，必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应视为极有价值的地形要点，绝不可轻易放过。

第三，奥吉拉。法军通常称之为麦萨·布瑞加。这是一片位于息尔特湾最南端，向内陆延伸的软沙和沼泽地区。在这片沙海里，只有少数几条小径，隆美尔只要固守住这一地区，便能阻止我们前进，随意进出隘路，对我军发动攻击。我们曾于1941年2月和1942年初，对奥吉拉两度发起攻击。但1941年3月以来，这一带地区一直在隆美尔的控制下。

从军事地理学方面考虑，我认为有4大地形要点须纳入我的作战计划：第一，畅通的黎波里的滨海公路；第二，沿岸各海港；第三，图卜鲁格和班加西间的丘陵地带；第四，奥吉拉地区。

隆美尔的北非兵团由两种不同成份的部队编成，一种是据守阵地防御工事和要点的“固守部队”；另一种则是遂行袭击、形成攻势的“机动部队”。

固守部队是以意大利军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没有装甲单位；机动部队则是拥有大量装甲单位的德军。德军的精锐部队是以装甲第 15 师、装甲第 21 师和“轻兵第 90 师”编成的“装甲军团”。

鉴于德军强大的装甲力量，我认为第 8 集团军也必须拥有一支能与之抗衡的具有强大战斗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装甲军”。这个军不可以用来固守阵地，而只能作为我们的钢铁先锋。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组成一个含有 3—4 个师的“装甲军”。第二个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我军的士气。因为当时第 8 集团军各部都已经狼狈不堪，对高级司令部也已丧失了信心。这种情形必须立即加以改变。

这些问题及其他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当我在埃及降落以后，思路逐渐清晰了。

8 月 12 日，我在开罗郊外的一个飞机场降落了。他们将我接到金字塔附近的“敏拿大饭店”奥钦勒克原定的长期房间里。在旅馆洗了一个澡，吃过早饭后，我便驱车前往开罗中东军总部。早晨 10 点多到达总部会见了奥钦勒克。

奥钦勒克将我带进他的沙盘演示室里关上了门，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人。他问我，知不知道他就要离开。我说知道的。然后，他便对我说明他的作战计划，“保全实力”是这个计划立案的大前提，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第 8 集团军的“完整”，决不可在作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隆美尔不久就会全力来攻，第 8 集团军便可向尼罗河三角洲撤退；假如汗罗和三角洲守不住，则沿尼罗河向南撤退，或向东北退向巴勒斯坦。

他告诉我：我应该在第二天到沙漠前方去，在第 8 集团军团司令部停留两天，一方面就地学习一番。当时他本人仍然是第 8 集团军的兼任司令，并且已经命令卢姆斯登将军代行司令职权。我必须在 8 月 15 日后才能行使职权，因为那天是他将中东军总司令移交给亚历山大的日子，他希望这两樁新旧移交同时实施。所以万一在这以前敌人发起攻击，或是发生任何紧急情况的话，他本人将立刻赶到第 8 集团军司令部从拉姆斯登手里将指挥权收回。这种种措施真是异想天开、奇特非凡，我尽可能地控制我的情绪，富有修养地迅速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出了总司令室后，我便立刻去找亚历山大，他仍然是那般从容坚定，仍然是一如往昔地利藹可亲。

我不得不承认，有“老亚”这种人做我的总司令，是我三生有幸，我再也不会碰上比他还好的长官。虽然在个性方面我俩截然不同，但我们却能和睦相处。

一见到“老亚”，我便立刻向他提出应该为第 8 集团军编一个预备军，这个军应类似隆美尔的“装甲军”，要具有强大的装甲兵力。他同意了我的计划。因他目前还未上任，所以依然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于是，我去找副参谋长哈定少将，他在坎伯莱参大受训时，我当过他的教官，对他非常赏识。当时他并不知道亚历山大和我究竟在开罗做什么，我将亚历山大和我的任务告诉了他，并说明了自己的计划，问他是否能照我的想法，将在埃及现有的家伙拼成一个军；预定 9 月 3 日到达苏伊士的 300 辆“薛曼”型新战车可做为编成装甲师的装备。他当即表示立即着手办这件事。

午后 6 点整，亚历山大和我去看哈定，他说，可以编成一个我们所要的军，番号定为第 10 军，预定编成是：

装甲第1师、装甲第8师、装甲第10师各辖有一个装甲旅、一个步兵旅和师直属队，新西兰师辖有两个步兵旅和一个装甲旅。

当天还有一件待办的事，即我急需一个熟悉沙漠生活的第二随从参谋。听说高特最近从第11骠骑团调用了一个青年军官，他可能正是我所要物色的人选。他叫约翰·柏斯敦，曾在哈罗学校攻读，开战后便中途辍学。我立刻召见了她，并告诉他：“我是今天早晨由英格兰飞到的，明天早晨就要到沙漠里去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但我从没有到过沙漠地带，所以急需一位侍从参谋跟着。你是不是愿意来做我的这位侍从参谋呢？”

他两眼直楞楞地望着我。他的神情显得惨兮兮的，他刚刚追随过高特，高特是中东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所有青年将校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可是现在，他却死了。我深知他内心深处的震惊，便静静地望着他，等候着他的回答：我视线所接触到的，是一对流露坚定神情的灰色眸子。

最后，他终于开腔了：“报告司令官，我很愿意追随您。”

他绝对是个上乘之选的人才。我们一道并肩由阿拉曼而至易北河，转战达十个国家之多，我对他非常赏识器重。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在德国阵亡了。

8月13日凌晨五点，我离开美国大使馆，乘车直奔沙漠。

当时第8集团军的参谋处长是弗瑞迪·戴君干准将。我们是多年老友，相识于约克郡，当时我是少校，他是初出茅庐的少尉；1932和1933年在埃及，1935年在奎塔，我们又曾两度聚首；1939年，我又第三度碰见了她，当时他正担任陆军大臣贝利沙的军事助理。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我一直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军官。真想不到我们又在埃及重逢。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在亚历山大郊外的十字路口静候着我。他比以前瘦削得多，也显得非常疲惫，满脸愁容——显然他是操劳过度。我觉得，在谈公事之前必须先和他重温友情，放松一下他的情绪。他搭上我的车子，我们畅谈着前尘往事，当想起几桩值得回味的插曲的时候，两人都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他的紧张情绪很快地便得到了放松，过了一会，我对他说：“我说弗瑞迪，你们这帮人好像已经把这儿的事情弄得乱七八糟。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他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内容包括当时所有有关的事实。我对他说：“弗瑞迪，别来这一套好不好？你知道我的脾气，我喜欢有关人员对我亲口汇报，不是看任何文件。赶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纸收起来，放松你的情绪。”

他失声笑了起来，我立刻感觉现在我可以听到第一流的情况分析，一切前因后果都将一清二楚。我们在汽车里紧靠在一起，在我们的膝盖上，摊放着一幅地图，我开始倾听着他的报告：由作战状况到最近有关敌军的动态，再谈到每个地区的负责将领们，谈到奥钦勒克针对未来行动所下达的向令，谈到他个人对于一切问题的看法。我让他尽情地谈下去。当地一口气说完之后，我们默然相对了好长时间。然后，我问他官兵们的士气如何。他说不太好，目前第8集团军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明智的领导和确实的掌握。

很明显，我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已经逐渐展现出来。我决不可能独力支撑这种局面，我必须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他的头脑一定要敏捷而清楚，他一定要能勇于负责，一定要能解决所有细微末节的事务，使我能够集中全部精力于重大问题的处理——事实上，必须得有个精明干练的参谋长负责处理所有

的细节问题和庞杂的幕僚事务，我才能放手指挥作战。我必须避免前任那种拘泥于细枝末节的错误做法，否则等待我的也将是失败的命运。

那么，弗瑞迪·戴君于是否就是这个人选呢？

在个性和生活方式方面，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他是生活在神经紧张、心情急躁的气氛之中，他不但喜欢赌博、酷嗜杯中之物，而且还经常山珍海味，讲求享受。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呢？我认为，这都毫无关系，因为秉赋不同才是最好的合作资本！我时常认为，完全相同的两种人绝不会是一对好搭档。他有一副可以高速运转的第一流大脑。同时，他还深知我的为人，熟悉我的作风，这种认识关系非常重大。假如他是我的助手的话，就必须给他以所要的权力；他一定得做参谋长才行，仅仅当个参谋处长，还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干。

可是，在英国陆军里，并没有参谋长制度，在指挥官之下有若干参谋，这些参谋们的业务由指挥官亲自协调。这种制度绝对不适于当时我所面临的状况。教我怎样协调沙漠战役的所有参谋业务呢？我的前任军团司令们，便是在这种制度下被弄得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们都是被琐务缠晕了头才失败的。

在到达第8集团军司令部之前，我就决定以戴君干为助手，我将使他成为拥有全权的参谋长，我要在全部参谋人员面前当众宣布，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提拔起来，使他们了解这项任命是不同凡响的。

上午11时左右我们到第8集团军沙漠司令部。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荒凉：广阔的沙漠里，只有疏疏落落几辆卡车，看不到餐厅专用帐篷，大多数工作都是在卡车里或太阳底下干的；到处都是令人恶心的苍蝇。我问他们，奥钦勒克平常都睡在哪里。他们告诉我，他睡在办公帐篷外的地上，第8集团军禁止使用帐篷，每个人都要尽量地过不舒服的生活，以便司令部的官兵们不致显得比部队弟兄们更安逸。所有军官们的餐厅都是露天的，所以这里才有埃及苍蝇嗡嗡然群集。在高级军官餐厅——也就是我用膳的所在地，是用一面蚊帐罩住餐桌；但是仍然挡不住阳光和苍蝇的侵袭，苍蝇钻进去之后便再也飞不出来。8月5日，丘吉尔首相来这里视察时就在这里用的餐，听布鲁克讲，当时首相曾不无讽刺地嘟哝了一句：“我们在一个满是苍蝇和军事要人的大宠子里用早餐。”我认为这一顿早餐对奥钦勒克没起什么好作用——看来奥钦勒克是节俭得过分了。我也不是一个奢侈的人，但我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应当有合情合理的享受，哪怕只是为了工作效率的缘故。我问他们，空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在柏格·艾尔·阿刺伯村附近，好多英里外的海岸上：陆空军之间毫无任何密切关系可言，陆空军简直像是在各自为战。总之，整个集团军司令部暮气沉沉、凄凄凉凉。

代理集团军司令卢姆斯登少将在司令部迎候我。我对他也不陌生，1938、1939年，他曾在巴勒斯坦我所指挥的第8师里担任过“罕普厦步兵团”的营长，当时他曾是个很好的营长，但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他向我说明了情况，我当即提出有关在隆美尔发起攻击状况下，集团军撤退计划的问题。某些有关撤退的命令已经下达，但都还不肯定。在整个作战前线，一切都显得非常含混。

我感到，我听到的一切不全是实情。事实上，当时第8集团军已经危如垒卵。我决心立刻采取行动。我收到的命令是不得在8月15日以前接管第8集团军。可当天才是8月13日。和总部请示或商量是没用的，但我必须立刻

亲自负起全责。我教卢姆斯登马上回他军里去。听到这项指示，他非常惊讶，因为他收到的命令是代行军团司令的职务。但无论如何他终于遵令离开了司令部。然后，我便在群蝇环伺和热辣辣的太阳之下享用了我在集团军司令部的第一顿午餐。我边吃边想。饭后，我亲拟了一份电稿，报告总部我已经从当天——8月13日午后2点钟就任了第8集团军司令，这是抗令行为。但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接着，我又撤消了所有撤退的前令。

我在防区巡视一遭，见到了若干下级，对这个集团军也有了一个初步印象。于是我决定尽早离开司令部，以免因擅接指挥权而遭到开罗总部的指责。但首先我要和司令部全体人员见见面。我已经见到集团军北翼方面的第30军军长卢姆斯登。下午，我将到第13军司令部接见弗瑞堡将军，他的本来职务是新西兰师师长，高特将军死后，便兼代第13军军长。

途中，我在车里一路研究着地图。我的向导是一位军团司令部的军官，带路到第13军司令部是他的固定职责，他和驾驶兵一起坐在前座。过了一会，车子突然停下来，我问他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竟说不知道，还说他迷失了方向。

我突然发现车子恰好在一片四周环绕着钢丝网的区域里，便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我们正在一处雷区的中央。我满肚子不高兴，让驾驶兵沿着来路辙痕向后倒去，等车子倒出雷区后，我的“向导”军官也恢复了他的“方向”意识。

在第13军司令部，我和弗瑞堡将军谈得很投机，然后又和澳大利亚第9步兵师师长莫谢德谈了半天。他们俩人都是相当优秀的将领。

当天很晚才回到军团司令部，本部的军官都已经集合好在等着我。戴君十把他们集合在我帐前空地上，当时是午后6点半，我便在黄昏的习习凉风中，开始对我的新部属们训话。

我表示很高兴能看到他们并说明几个问题：对某些已下达的命令有的应继续执行，但我所下达的“不撤退”的命令，则由于涉及到作战指导方针的彻底改变，所以他们必须了解。因为，他们必须马上着手有关的参谋作业，假如我们就地固守，则防御阵地必须具备应有的纵深，所有车辆必须撤到后方地区，前方的弹药、饮水和口粮等必须屯足。为使“不撤退”的命令得以最好的贯彻，我们必需在三角洲地带控制大量部队。但防范埃及各大城市的保卫战却必须在阿拉曼就地打下去。已经有两个新的精锐师由英国开到埃及，目前正在挖掘防御三角洲的工事，我将请求将这两个师调到此地。

同时，我还要将在埃及的所有的“家伙”拼凑成一个装甲兵力特别强的新军——第10军。这个军将不用于固守阵地，而将是英军中的隆美尔“非洲军团”，这一工作现已开始。

现在所采取的以“旅群”和“爵克纵队”以及在广大沙漠里将师分割运用的策略必须立刻停止。将来各师一定要以完整的姿态遂行战斗。

我很不喜欢现在司令部里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这样的司令部怎么能提高士气呢？我们应该将司令部设到海边，在那里努力工作，闲暇时候还可以来一个痛快海水浴。

亚历山大给我的命令相当简单：命令第8集团军消灭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团”。我知道大家都认为隆美尔将在近期发起攻击。如果他来得快，那么我们将会相当麻烦；如果他在一个礼拜以后动手，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能给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隆美尔便可随便行动，他愿意进攻就随他进攻，

我们要以逸待劳，给其以迎头痛击。如果他还来，我们还这样对付他，一次又一次，再而衰，三而竭，然后，就该轮到我们打他了。但在我们的战备完成以前，我是无意发动攻势的，一俟战备完成，我们便可将其赶出非洲。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可是在这种不舒服的气氛里却又无法动手。司令部将会尽快搬到靠近空军司令部的海边去，我们将要和空军一起完成攻击计划。禁止架设帐篷的命令已经撤消。我们应该赶快将帐篷架起，将餐厅室里用的家俱弄来，以便尽可能地生活得舒服一些。

最后，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工作方法，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深恶痛绝各种文牍和细枝末节的琐碎事务。我已经任命戴君于准将为集团军参谋长，他所下达的任何命令都等同于我的手令，大家应该毫无保留地坚决执行，他已经完全得到我的信任和授权。

全体人员鸦雀无声，凝神倾听。那晚的训话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鼓舞起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

当天晚上，我和戴君干作了一番长谈。他希望能了解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我预定在8月14日，出去跑一整天，并且以后每天都要到处巡视一番，他则在每天晚上，都急于要和我会一次面。

第二天破晓，我被一位送呈情况早报的军官吵醒了。我觉得一股无名之火直冒上来，告诉他，从没有任何人向我呈送过情况报告，我不愿让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来打搅我。他惶惶地向我解释说，奥钦勒克每天都要人将他早早唤醒，并且将拂晓情况报告呈送给他。

我告诉他：“我不是奥钦勒克，假如有什么事发生问题，参谋长会报告我，假如没什么事，我不喜欢罗嗦。”那位碰了硬钉子的军官显得非常狼狈，狼狈得令我于心不忍，于是，我便邀他一同吃早茶，温和地安抚了他几句，他才如奉大赦般地离开。从那天起，参谋长便下达了新的命令，重新规定情况报告的呈送办法。于是，我再也不会于大清早被他们吵醒过。

很快，我就摸清了隆美尔的一些规律及其近期的进攻计划。他企图作最后一次冲击，妄想早日攻下开罗和亚历山大，确保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假如他果真有此企图，那么，他的主攻方向必将指向南翼或是内陆的一翼，然后向右旋回，以便能突进到第8集团军之侧。

他不可能在我们这个集团军很完整的状况下挺进埃及，要想毫无顾忌地向东挺进，就必须先行击溃第8集团军。

针对敌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我的方案是：

北翼的第30军正面用雷区和钢丝网加强防卫，以便以最有限的兵力达成固守的目的。

南翼方面，我需要一位专职第13军军长，高特调离后，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在南翼视察了一天，对地形作了一番仔细的研究，发现了一处要点：茹威萨山脊东南，恰好位于阿拉曼阵地后方几英里处，因兵力不足，在这一要区竟没有设防。

我就沙漠装甲战问题下了一番功夫，隆美尔的惯用战法是完引诱我装甲部队去攻击他，然后他将自己的装甲部队部署在一道战防炮掩护幕的后面，利用战防炮先击毁我战车，然后，他的战车便能肆无忌惮地主宰战场。我断定，假如在我们发起大规模攻势以前，隆美尔便决定攻击我们，则不会发生这种现象。这样，我便可以将所有装甲车都部署在阿拉曼阵地上，全力固守茹威萨和阿拉姆·哈法两处山脊，让他向这两处山脊猛扑。我们将利用有利

阵地对其实施消耗性反击，隆美尔的战车势必向沿着阿拉姆·哈法西侧掘壕待机的我军战车猛扑。

那天我在南翼地区见到了装甲第7师师长伦顿，这个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沙漠之鼠”。我们就所预期的隆美尔的攻击交换了意见。他认为，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让谁的装甲部队出击去打击隆美尔？他自忖假如要运用装甲部队实施反攻，那一定非他莫属。我说没有任何装甲部队出击，这次我们要运用以逸待劳的策略，让隆美尔自投罗网。我的主意对他来说，就像天方夜谭似地不可思议，他和我就此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我把他说服。哈法会战后我就把他给撤换了。

当晚回到司令部时，关于加强阿拉曼阵地的初步设想已经形成。我决心将现阵地尽量加强，以便不因隆美尔的任何攻击而手忙脚乱，以致影响从容准备自己的大规模攻势作战。据情报资料显示，隆美尔很可能在月底发起攻击。我打算在月底前开始阿拉曼会战的准备工作。不管隆美尔来不来，会战的准备工作都要积极进行。

因此，我们的部队必须要经得起任何攻势，以掩护我们的会战准备，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和戴君干商量后，便请求总部将第44师拨归第8集团军，用以固守阿拉姆·哈法山脊。只要那一带山脊能由一个全师的兵力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但却不可出击），凭借坚固的工事固守往，那么就没有其他的问题值得操心了。我又向总部请求把第51师拨给我，这个师刚到苏伊士。南翼方面的战术问题，我交由第13军自行处理。13军军长一职，经过慎重考虑，我请求亚历山大，想办法将何若克将军由英国调来接任。何若克曾在我的第3师里做过营长，他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

戴君于当晚便用电话和总部进行协调，提出要求，但却无任何效果。于是，我便直接请示亚历山大，他对我所提的要求都慨然允诺。为此，奥钦勒克特别恼火。他在8月15日给我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长信，他指出：“我十分清楚，陆军中各级军官通常是可以上访陆军部的，但是这次你会见副长官谈的是与我的司令部直接有关的问题，结果他们已发出了一些调动命令。我认为，这不是处理这一问题或其他类似问题的正当方式……”

我也承认这种挖墙角的方式不是很光明正大，但是，我认为，当情况需要时，我必须做到极端无情，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的撤换绝对不是大清洗，可以说，经过对“朽木”之辈的处理，我的参谋机构部属的配置是全盟军里面最棒的。

8月15日，奥钦勒克命令我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但事实上，我已提前两天就任了，并已将一切纳入了正轨。尤其将士气提高了很多。

首相乘由莫斯科返国之便，在8月19日视察了第8集团军。我陪他巡视前线，并向他说明我的计划。当晚，他下榻在柏格·艾尔·阿刺柏村附近海边我们的新司令部里。晚饭前，他到地中海里试浴。第8集团军里根本没有人穿什么游泳裤。他没有带游泳衣，所以穿着衬衫遮遮掩掩地下了水，我费了很大劲才将那些无所不至的新闻记者给挡住了。他对在远处游泳的一群士兵都穿白色的游泳裤感到很奇怪。我向他解释：因为战士们成天只穿卡叽短裤，连衬衫都不穿，所以他们的身体都晒得黝黑。像穿白色游泳裤的，是他们大腿上的白肉，那块皮肤因为有短裤遮着，所以没有晒黑！那天晚上，在餐厅里，我们都非常放松，戴君干还特别替首相准备了些适当的酒。其中还

有最难得的陈年白兰地。

当他第二天离去时，我请他在纪念册上题字。因为我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8月13日，恰巧是“布伦罕会战”纪念日，于是，他为我提到：

值此“布伦罕会战”纪念日之际，我衷心祝愿新上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及其所属部队将所向披靡，从胜利走向胜利。

温斯顿·丘吉尔

1942年8月20日

我曾向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下令，绝不容许有“小肚子痛”现象在我的部队里发生。这项训令是为了根绝一种普遍违反军纪的风气而发。在第8集团军里，有一种很坏的习气，当各级军官们告诫部下，不得有某些行动而又说不出充分理由时，往往会发生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事情。第8集团军的下级军官——甚至连第二线的士兵们，通常会就所受领的命令，向上级质询，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他的上级要了解的清楚，知道得多，本领要高，往往要采取强硬的行动才使命令得以贯彻。我决心立刻根绝这种现象，我下令告诫全体官兵，命令将不应再是“可以商量的课题”，而只能是行动的准则。

现在我迫切需要一场像样的会战。这次会战将按照我的思路去进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且要尽快进行，要赶在发动攻势之前，我要靠这一战来恢复全集团军官兵们的信心，我要让他们感觉到我是一个值得他们信赖、是一个战无不胜的优秀指挥官，让他们感到我的所有指挥都是安全正确的，让他们感到他们自己也是一群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优秀军人！以便重塑全体官兵的信心，为以后更加艰巨残酷的战斗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

其实第8集团军确实是一支相当精锐的部队，是一支军中劲旅，他们具有良好的素质，每个师都久经沙场。丘吉尔首相也称赞他们为“受过挫折的勇士”。他们之所以丧失信心，完全是由于指挥的失误，在历经几次失败之后，便自我感觉不那么好了。这种信心的丧失，加上因丧失信心而导致的“小肚子痛”怀疑命令的风气，使得整个军团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我必须尽快打一次胜仗，在这一战中，我要易如反掌地击败隆美尔。

要想击败隆美尔，就必先摸清他的底细。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我判断：隆美尔一定会进攻，因为不管支持撤退的理由多么充足，撤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就足以阻止撤退：是希特勒拒绝了隆美尔关于从阿拉曼撤退的建议；是希特勒在突尼斯的最后阶段，直到轴心国投降那天为止，都不允许救援他的久经锻炼的部队。）此外，在8月份，德军的大战略计划看来仍然是可行的；在德军实施的大钳形运动中，苏联方向的大量德军将经过小亚细亚南下，与向前进攻的非洲军团结合起来，向盛产石油的地区和印度洋突进。在整个8月份，德军向俄罗斯南部发动的强大攻势在继续进行：迈科普8月9日陷落；诺沃罗西斯克9月6日陷落。对隆美尔来说，在德军向高加索的大规模攻势仍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就把这一巨大钳形攻势的另一端后撤，等于是令人不快地承认失败。

这一次，我对击败隆美尔充满了信心：那时隆美尔不仅疲劳不堪，而且有病。他的医务顾问曾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隆美尔患有胃溃疡和鼻病，血液循环也不好。隆美尔不宜再担任指挥职务了，他也确已建议让古德里安来代替他，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实际上，在哈勒法山战役之前和战役期间，隆美尔的身心都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而我则是精神饱满、富于进取并充满自

信。当时我的行动原则是：“按我的主张而不是按以前那些沙漠指挥官的主张来进行这次战役。”隆美尔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绝望和沮丧的心情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冲击的。

我所计划的隆美尔所谓的“机械化的静态战”方面，“英国士兵的优点，比如英国士兵的顽强，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隆美尔语）。他还看到，英国战线的北段和中段已经迅速地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箱形阵地，箱形阵地的南翼侧有宽广的地雷场，这正好是一种发扬英国士兵韧性的部署。一次有计划的撤退将使英军这些精心构筑的工事完全失去作用。再者，隆美尔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十分短缺：他的各个师总共缺员 1.6 万人，他的运输工具有 85% 是缺少备件的缴获车辆；他的战斗装备的数量比编制规定的少 210 辆坦克和 175 辆装甲运兵车；他的弹药十分缺乏；他的士兵的口粮质量极差。此外，马耳他已重新投入使用，使盟国能从中空和海上对意大利护航船队进行袭击，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击沉率；而德国的许多空军中队则从地中海战线转移到苏联战线去了。隆美尔的燃料储备已经很少，而补充又没有把握。在这一点上，向基地撤退对隆美尔也是有利的。“楔入”重点在南翼，楔入后将向左回旋，其装甲部队将指向阿拉姆·哈法和茹威萨两处。现在，我对隆美尔发起攻势的时间、方向、兵力部署等诸要素已了然于胸，剩下的工作就全看我的了。

我决定用第 44 师固守阿拉姆·哈法山脊，将所有装甲车配置在山脊的西端，一旦判定敌人的主攻确实指向阿拉姆·哈法山脊，我便将装甲部队向山脊西侧和阿拉曼主阵地线上新西兰师阵地的中间地带运动，我曾命令装甲部队事前预行演习过，所以对这一运动的成功有充分的把握。9 月 1 日晨，我的差不多 400 辆战车都已部署在一道 6 磅战防炮掩护幕的后方。我严令各装甲部队，不得擅自出击，必须原地固守，必须让敌人自投罗网。

我很清楚，隆美尔决不可能绕过我，直接向开罗挺进，否则，我就会用 400 辆战车猛击其后，让他走投无路，全军覆灭。

我的最南翼应保持高度机动，当敌军迫近时，据守正面的第 7 师将放他们通过，等他们指向阿拉姆·哈法山脊再向左回旋时，便从东南两方予以夹击，以强大的火力切断其退路。

此时，何若克将军也从英格兰兼程赶到，接任第 13 军军长。将作战计划的细节问题交到这位精明能干的部下手里后，我才舒了一口气。我特地叮嘱他，在战斗中切不可使第 13 军——尤其是装 7 师，陷入混战状态。在下一步的 10 月攻击中，他的军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将自己的攻击计划向他做了简短说明。他满怀热情，很快便开始进入情况。

此时的我，已强烈地感受到了成功、胜利的希望，因为就我的部署而言，不管隆美尔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法，这样的部署都能将他堵住。如果他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他将被第 8 装甲旅堵住，而第 22 装甲旅和两个师的炮兵将从其左侧猛击。如果他突破地雷场后向左侧出击，那他将面对配置在隐蔽阵地上的第 22 装甲旅，在他的右面则是严阵以待的第 8 装甲旅。总之，下管隆美尔朝那个方向运动，都将被困住。当隆美尔被困时，英国沙漠空军的飞机将以密集队形对其轮番攻击，投下隆美尔所说的“地毯式炸弹”。此外，炮兵肯定将以空前集中的方式使用——这将是阿拉曼战役的一次预演。据戴君于说，多尔曼·史密斯一直对“缺少真正集中的炮兵火力”一事进行批评。我不仅早已认识到需要集中炮兵火力，而且身体力行（丘吉尔 1941 年 10 月 7

日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这样说道：“在这次战争中，第一个恢复炮兵在战场上首要地位的司令官将获得荣誉，炮兵的这种首要地位过去一直为重型坦克所取代）。我在这一段时间的运气相当好（由于戈特的突然牺牲，命运之神让我就任了集团军司令。在这个时期，人员和弹药源源运来，而我的对手则困窘。生病和萎靡不振），此时在英格兰仔细地、连续地进行的用无线电同时指挥大量火炮射击的试验已经开始产生效果（在这种技术的应用方面，英国直到战争结束都领先于德国）。然而，话又要说回来，过去拿破仑一方面希望得到运气好的将军，同时也要求将军们善于运用自己的好运气！

在这次战役开始前几天，集团军官兵都有一种特别镇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霍华德·基彭伯格爵士的回忆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霍华德·基彭伯格是新西兰官方编史家，当时的新西兰第5旅旅长。他是一位严厉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但他在希腊、克里特以及在沙漠作战初期当营长的经历，却使他变成了一个多疑和谨小慎微的人。基彭伯格这样写道：“他向我们详尽他说明了整个战役计划。我非常喜欢这一计划。我觉得它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的计划都高明。更令人高兴的是，我有了一种主意已定、镇静自若的感觉，这种感觉无疑是从集团军司令部那里感染来的。这是第一个典型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一切准备活动都是在不慌不忙、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德军进攻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霍罗克斯甚至举行了两次演习。当时有人觉得，把一切战斗行动都预先练一遍是多么的古怪、多么的不协调。但是霍罗克斯属下的一位旅长在战斗结束后却告诉霍罗克斯说，当他需要知道在战役过程中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情况时，他就查找演习记录！

但是此时的隆美尔却不镇静。拜尔莱因将军回忆说，隆美尔曾对他的医务顾问说过这样的话：“教授，我昨天作出的进攻决定，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其结果要么是我们在俄国的德军能够抵达格罗兹尼，而我们在非洲能够抵达苏伊士运河，要么……。”苏伊士运河的确是隆美尔的最终目标。现在我们还保留着隆美尔当时亲自画的一张地图，该图表明德军第21装甲师将进攻亚历山大港，第15装甲师和第90轻装甲师将冲向开罗；然后，第15装甲师将占领苏伊士运河，而意大利第20军则将夺取尼罗河谷。鉴于隆美尔缺乏燃料，这个计划是与他的能力不相称的。这无疑是他的病所造成的，他的病态在这个战役计划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个计划要求非洲军团突破地雷场，然后连夜在7小时内通过未经勘察的土地，推进约30英里。隆美尔这样说道，“然后，战斗要迅速发展下去。这场决定性战役无论如何下能变成阵地战。”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发生。可以说，在哈法山战役的最初几小时内，隆美尔就打输了。实际上，英国沙漠空军在8月30日黄昏时就出动了，他们用“威灵顿”式飞机轰炸了隆美尔的装甲车停车场。当非洲军团在地雷场奋力开辟通路的时候，他们发现地雷场比预计的要宽得多、复杂得多。第一个通道直到8月31日凌晨4点30分才开辟出来。8点钟时，隆美尔接到报告说，进展仍然十分缓慢。第21装甲师的冯·俾斯麦将军被一颗地雷炸死，而非洲军团指挥官涅林也因受伤而不能指挥，拜尔莱因接管了涅林的指挥，并和隆美尔一起决定继续进攻。

这样，他们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而干了一件对我十分有利的事。他们本来应当立即掉头折回，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却企图在夜间迅速地向东猛冲。其结果是，德军坦克纵队在地雷场进展缓慢，而第8集团军和沙漠空军则已

完全做好准备，第 8 集团军的坦克已经开到战斗位置待命（第 22 装甲旅甚至在德国坦克纵队的正前方设置了引导哨），炮兵也已作好战斗准备。由于坦克在松软的洼地上行进非常浪费汽油，隆美尔采取了一个折衷方针，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向北作预定的左包抄运动，这样，德军坦克就朝着英军第 22 装甲旅的隐蔽着的坦克开过来了。

“隐蔽着的”这个词实际上用得很不恰当。这些坦克是美国的“格兰特”式坦克，它们的 75 毫米炮安装在车身下部，在射击时坦克指挥官必须把坦克从隐蔽壕里开出来，这样实际上就暴露了整个坦克。这种技术缺陷在此次战斗中给英军带来了唯一的“紧张时刻”，英军的紧张情绪生动地再现在第 22 装甲旅旅长罗伯茨准将所写的一筒评述中。利德尔·哈特在他写的《坦克》一书中曾经引用了这篇评述：

现在我能够通过望远镜看见敌人了。他们顺着那排直通我们阵地的电线杆上来。敌人领头的坦克开了几炮，目标可能是我们的轻装甲连队。所以我命令轻装甲连队后撤，并且要撤得离我们远一些，以免把我们的阵地给暴露了。

它们开上来了，排成令人难忘的阵势……注视它们是很吓人的，就像注视一条蜷缩起来准备咬人的蛇一样。我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有几辆领头的坦克是马克—4 型坦克，这种坦克过去通常装有短炮管的 75 毫米炮，只用来实施近距离支援和发射杀伤爆破弹，在前线通常是不使用的。但是这些马克—4 型坦克却装有炮管很长的炮，一种很不寻常的炮。这肯定就是“情报人员”一直在谈论的长炮管的 75 毫米加强炮。

现在它们全都向左转弯了，面对着我们，开始慢慢地推进。看来，敌人的坦克大部分都集中在 C·L·Y 当面和步兵旅的反坦克炮当面（这时，在这段防御正面集中了 87 辆德国坦克）。我用无线电预先通知了各部队，在敌人的坦克进入 100 码距离以前不允许射击；不要多久它们就会进入这个距离了。几秒钟后，C·L·Y 的坦克开火了，于是战斗打响了。

你一旦处于战斗当中，你就很难判断时间，似乎只过了几分钟，C·L·Y 的所有“格兰特”式坦克几乎都开火了。德军新式 75 毫米炮的坦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伤亡。敌人的坦克停止前进了，它们也遭到了伤亡。但情况仍然严重。我们的防御阵地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立即命令苏格兰尤骑兵第 2 团，要他们尽快离开他们的防御阵地来堵住这个缺口。这时，敌人的坦克又开始慢慢前进，已经开到了离步兵旅的反坦克炮很近的地方。当德军坦克进入几百码距离以内时，反坦克炮还保持沉默，接着突然开火，敌人遭到重大伤亡。但由于寡丁敌众，一些反坦克炮被敌人碾烂了。

我请求炮兵紧急支援，炮兵立刻就向敌坦克开炮。由于炮兵的威力，加上敌已遭受伤亡，进攻被挡住了。但是苏格兰骑兵第 2 团现在在哪里呢？“快上来，龙骑兵，”我通过无线电喊道。“把你们的鞭子挥起来。”但一时没有看到他们越过山脊奔驰而来的任何迹象，而到天黑至少还有半小时。

这时一部分敌人已经开始向我们的左翼侧迂回，英军第 5 皇家坦克团已投入了战斗……。

敌人又在中央开始慢慢地前进。炮兵是我军用以阻止敌人前进的唯一兵器，于是所有大炮都对准敌人轰击，敌人又被挡住了。接着，龙骑兵第 2 团越过北面的山顶开来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离开战场多久，但我却觉得这段时间很长似的。当他们在战场上出现冲下山时，我通过无线电把当前的

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对那个需要堵住的缺口很清楚，径直冲向那里去了。

实际上，形势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严重。那天早晨当霍罗克斯弄清整个非洲军团都已投入战斗时，就要求我准许他把他属下的后备队第 23 旅调出来使用。这个要求被批准了，于是这个装备着瓦伦丁坦克的旅就开上来防守第 22 装甲旅后面的反斜面，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纵深防御。隆美尔迫于燃料短缺（原来允诺在 9 月 3 日以前给他提供的 5000 吨燃料中，有 2600 吨船在运途中被击沉，另有 1500 吨还留在意大利），在那天傍晚就放弃使用坦克了。这样，非洲军团就整整一夜在皇家空军的照明弹和炸弹以及第 13 军炮兵的轰击下停止了活动。翌晨，当我查明隆美尔已不可能向东推进后，就开始集中我的装甲部队。但这几乎已没有必要了。白天敌人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攻击，但远不如 31 日那样猛烈，6 时 40 分，敌第 15 装甲师对哈勒法山脊进行了短时间冲击。7 时 5 分和 8 时 30 分，又分别进行了两次小规模局部攻击。在此期间，敌人还和英军第 8 装甲旅进行了一次激烈交战。这场战斗是在第 8 装甲旅试图向西运动与第 22 和第 23 装甲旅集结时发生的。霍罗克斯牢记我的指示，在损失了几辆坦克后就把第 8 装甲旅撤回了。

这天下午，在预计胜利确有把握后，我采取了两个预备行动。第一，我下令制订计划以便开始“进行夺取主动权的反击”，并命令第 10 军司令部作好准备“以指挥一支追击部队……动用所有预备队推进到代巴。”后一个命令是用来迷惑人的，也是一种安全保障措施，因为无论在战役之前、战役当中或战役之后，我都没有泄露过任何追击意图。第一个命令即“反击”命令规定新西兰师在 9 月 3 日夜间朝南进攻，同样是用来迷惑人的，这一点当我们在下面叙述进攻中途停止时就会明白的。

隆美尔这时只剩下够用一天的油料了，因此在 9 月 2 日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撤退，并在 3 日加快了撤退速度。我拒绝了一切“要求坦克发起攻击”的请求，并且禁止霍罗克斯继续追击敌人和占领希迈马特高地。我要让隆美尔保留下那里的观察哨，以便德军能够看到英军准备下一个大战役时将要采取的各种欺骗措施。——49——到 9 月 7 日，非洲军团已在英军原来的地雷场及其后方站稳了脚跟，于是我下令停止这次战役。

隆美尔的攻击始于 8 月 31 日夜间。当攻击于午夜后不久发起时，我早已按常规进入梦乡。事后戴君子告诉我，当天深夜的经过是：他接到敌军发起攻击的报告后，便立刻决定将我叫醒，报告我这个消息，但当他叫醒我后，我仅仅睡眼惺忪地回答了一句：“精彩，太好了”，便又立刻沉沉睡去，并在第二天我早晨通常的早饭时间，若无其事地悠然吃着早饭，夜里发生的一切，固然已经记不清楚，但对参谋长我却一直能够深信不疑。

曾有人批评我，未能跟踪隆美尔的撤退，使第 8 集团军乘机转守为攻，坐失了战机。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不乘势扩大战果，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我对当时集团军各部队的训练还不大满意，并且，装备也很不理想。训练的成熟和装备的充实，都还有相当的时日。第二，我不愿将隆美尔逼得退到奥吉拉地区有利的阵地。假如我们打算贯彻捕捉歼灭德军的使命，就必须使隆美尔站住脚跟，与我们一决雌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战机，再予以决定性打击。我很清楚隆美尔在攻势遭挫时，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而是断然退却。当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应该在他们冗长而脆弱的交通线的未点上，强迫他们决战。这样，我们本身的后方联络线才不致于过长，若隆美尔在阿拉曼和我们就地决战，则敌我形势优劣之分不言而喻。

总之，阿拉姆·哈法会战是在我们所希望的情况下结束的。第 13 军的行动也完全达成了预期目的，何若克的作战指挥，百分之百和基本计划一致，他当天的建树深值嘉奖。

阿拉姆·哈法之役，纯粹是场不折不扣的“军团”会战。由于集团军总体明确的计划，以及会战中司令部彻头彻尾的确实掌握，第 8 集团军的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次会战使全军官兵都一致认为，军队所需要的是能掌握他们命运的“独一无二”。此次会战后，我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独一无二”的人物。

第 8 集团军的主要构成成份，大都是穿军服的老百姓，不是职业军人。也就是说，大都是懂得读报的青年人。我认为，指挥这种部属所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指挥的头脑就可以了事，同时，还得要有一个群众最瞩目的“焦点”。换句话说，指挥官应不仅仅是个“主人”，还要是个“偶像”。我的所做所为，我的一言一行都莫不是为达成第二种要求而自我设计的。这种作风确实很能发挥作用，我确实已能使他们认识我，认识驱策他们战斗的人。身为指挥官的我，一定先要研究出指挥这些人的最有效手段，研究怎样才能发挥他们之所长、怎样才能将他们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怎样才能使他们响应我的号召，而这又是煞费苦心的艰巨工作。我阿拉姆·哈法会战时起，我便开始戴一顶澳大利亚军帽，我选择这种军帽的初衷，是认为它合乎沙漠的天气状况，殊不知，后来这顶帽子竟成了我的象征，因为在澳军阵地以外，只有我戴这种帽子！后来我所选用的军帽，正如读者所知，是一顶黑色的扁平软帽，选用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实用。至于软帽上的两个军徽，最初也是无意中选用的，但很快地又于无意之中发现了它们的功效。那个装甲兵的军徽，是我视察某一个战车团时，他们送给我的，不意又成了我在沙漠战争中的招牌。不久我发现，这顶有两个军徽的软帽，竟具有不可思议的效用——各部队官兵们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那软帽发挥了“铜帽”（英军对参谋将校的俚称）所从不曾有过的效用！那顶帽子不仅仅等于我的签字，同时，戴在头上还舒服得很。

我认为这次会战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收获是在装甲兵的运用上开了革命性先河。我在阿拉姆·哈法会战中一反过去的传统原则，当隆美尔开始攻击时，我没有让我的装甲部队主动“出击”，而是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静待时机，适时反扑，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由此证明，在部队训练未臻理想而装备又居劣势的情况下，必须在战术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必须灵活机动，当机立断。我之所以不肯乘胜扩张战果，也是因为类似的行动不适合我远程作战计划的要求。

这次会战使我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士气得以重振，第 8 集团军牛刀小试。

会战结束后，我给一位友人写了封信，“我第一次和隆美尔的交手，可以说是非常带劲。幸亏我能有充足的时间将乱七八糟的局面从容收拾清楚，策定我的计划，所以才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打跑。我觉得自己已经在第一局里打赢了，这一局是他发的球。下次该轮到发球了，现在的比数是一比零。”

高层人事方面，三位军长我已经有了何若克。我决心调换第 30 军军长拉姆斯登。于是，便请求调用当时在英格兰任近卫装甲师师长的李斯少将，他立刻飞来北非就任。这项任命非常明智，他不但在阿拉曼表现得人头地，

后来一直在我的指挥下转战突尼斯和西西里，经过和亚历山大一番长谈后，我不得不同意将我的精锐部队——也就是仿照隆美尔装甲军团编装的第 10 军交由卢姆斯登指挥；他曾在沙漠战场里担任过装 1 师师长，而且在中东战区具有很高的威望。我和他素昧平生，所以不可能对他完全信赖，但因为别人一再力保，所以我同意由他出任第 10 军军长；同时，我已从英格兰调用了两位新军长，实在不愿意让第 8 集团军官兵认为在集团军的高级军官里面，竟没有一个人适于晋升的，所以将卢姆斯登调升军长，对于集团军官兵们荣誉感和信心的激发也能发挥作用。另一项重要任命是由开罗总部调用哈定任装 7 师师长。

我想，假如我们打算在隆美尔的阵地上打开一个缺口，从那里突破敌阵，那么，炮兵的使用将事关重大，所以在我的司令部里，必须要有一位新的炮兵首脑人物。当我在开罗总部和一位高级军官谈到人选问题时，他告诉我，现任炮兵指挥官是一位乐天之士，而巨还曾荣膺过高尔夫球冠军。我对于所谓乐天之士并无异议，不过我们马上要玩的并不是高尔夫。最后我决定由英国调围柯克曼准将，我认为他是全英军里最优秀的一位炮兵军官。

我还需要一位一流的高级随军牧师。经过多方调查，我找到了休斯，当时他是某师的高级牧师。休斯也是我的得意部属之一，直到大战结束，我们始终在一起战斗；最后，他晋升到陆军牧师监，在“地方军”牧师中，能晋升到这种最高要职的，他是第一当时我的行政主管是罗伯逊准将，我在坎伯利参谋学院执教时，他是我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极力精明干练，有他主持后勤业务，我就毫无后顾之忧了。他还有位非常优秀的助手，便是格兰姆中校。罗伯逊晋升调走后，便由格兰姆接任他的职务，直到大战结束。

另一位必须在这里提到的，是白勒清。我初到沙漠时，他在“参谋业务编制科”任职；他非常精明，曾经一度外调某一旅任旅部少校副官，接着又调升装甲兵团团长，后来调到军团司令部以后，便迫随在我左右，担任我的作战幕僚首长，一直到大战终结。

最后，我将眼光转到司令部情报部，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位出身于“国王尤骑近卫兵团”的少校，他姓威廉士，是牛津的荣誉校友，天生一副聪慧过人的头脑；他曾在和我的一席谈话当中给我以启发，并极有助于“阿拉曼会战”的致胜。一经接触，我便对他大为赏识，提拔他负责情报业务，直到大战终结。

这样，经过一番人事调动后，我终于有了非常健全的领导阵容。我自信在这幅大的阵容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将隆美尔赶出非洲。

第四章 英军不是“沙漠之鼠”

把敌人的步兵“碾碎”

隆美尔的评论是对我进行强制训练的最佳报偿

油桶铺成的“铁轨”

沙砾与黄金

哈法会战后，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当时，我们和隆美尔的部队在地中海和垮塔拉沼泽地问约 45 里的正面上对峙着。敌军的防御设施正逐步加强到沙漠战场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些防御设施中，有广正面，大纵深的雷区。在敌我两军阵地上，全都毫无暴露翼侧的破绽可寻，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

第一，如何在敌人阵地上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使第 10 军强大的装甲和机动部队通过这个缺口，进入敌阵地；

第三，扩张第 10 军战果，歼灭隆美尔大军。

这是非常艰巨的行动，而如何获得奇袭效果，则更是问题中的问题。但要想奇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首先，我决定尽量使攻势计划能发挥战术奇袭作用，使敌人无法获悉我们发起攻势的确切地点和时间。为达成此目的，必须制定一个大现模的欺骗计划。

其次，一轮明月是在所必需的。通过雷区障碍非常艰巨，部队必须能看得清清楚楚才行。渐渐亏仄的弦月是不够的，因为我计划中的突破，至少要经过一个礼拜的缠斗，才能完成。所以必须要渐盈的弦月才能适应要求。这样一来，时间的选择便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我们的攻势准备进度受到隆美尔攻击行动的影响，肯定会一再延宕，在 10 月以前不可能完成攻势战备。满月时节是在 10 月 24 日。于是，我便将这期待已久的攻击行动定在 10 月 23 日夜间，报呈亚历山大核准。英伦白厅方面的回电，马上便到达了中东。首相在给亚历山大的复电里表示，攻势必须在 9 月间发起，以便能够呼应配合俄军的攻势以及 11 月上旬盟军预定在北非西端的登陆行动（火炬作战）。亚历山大接到复电，便立刻亲自跑来和我商量如何呈复的问题。我表示，我们的准备不可能按时完成，假如提前发起攻势，必将遭到失败，而如能照我所决定的到 10 月再动手，则我可以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亚历山大一如往昔地给了我以全力支持。复电完全照我所希望的拟妥发出，我私下告诉亚历山大，鉴于我对士兵们的承诺，我拒绝在 10 月以前发起攻势，倘若白厅当局坚持在 9 月发动攻击的话，那只好让他们另请高明。哈法会战后，我的身价看涨，此后再也没听到过在 9 月发起攻击的事。

我曾听到一些闲话，说是阿拉曼会战以及以后的非洲战役，都是亚历山大策定的，我只不过是这些计划的执行人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从阿拉曼战役起以后所有的计划，都是第 8 集团军司令部负责起草后，呈奉亚历山大核定的，只不过他对我完全信任，从没有对我的计划有过任何意见罢了，但他也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可以说他对我是言听计从，当他得悉我们迫切需要什么时，他便会在幕后给我们以毫无保留的支援，他从没有批驳过我的任何请示。假如没有他这种慷慨而确实的支援，我们可能会一事无成，亚历山大是最全能的一位中东军总司令。他对我信任得无以复加。

计划初稿完成于 9 月上旬，这次计划由两翼同时攻击敌人。主攻将由北

翼方面的第 30 军（李斯）担任，我计划在这一方向上，从敌阵和雷区里开出两条通道。然后，再以第 10 军（卢姆斯登）通过这两条通道占领侧击敌军补给线的地形要点；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必将会反击第 10 军；我希望能就此给他一次歼灭性的打击。

在南翼方面的第 13 军（何若克）预定运用装 7 师将敌人的装甲部队吸引向那个地方，以有利于北翼方面第 10 军向开阔地带的进出。第 13 军以避免伤亡为出发点，尤其是装 7 师，更应保持战斗力完整，以便能干突破完成后遂行机动作战。我所构想的攻击计划，重点并不指向于两翼，而是指向于中央的某部分；等到突破以后，再运用我的部队，相机向左或向右回旋。这一决策未能得到总部幕僚的支持，他们向我的参谋长施加压力，希望我改变决心。但亚历山大却能始终如一地支持我。

10 月 6 日，我决心推翻以前的全部计划重新构想设计。我的初期计划是着眼于歼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其余部分，也就是非装甲的各单位则留待慢慢收拾。这种作战指导方针完全是根据当时公认的军事思想而制定的，我认为这种指导方针欠妥当，我决定改变作战指导方针，将打击目标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我的修正计划是一面约束或牵制住敌装甲部队，一面对据守防御体系的各步兵师采取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部分一部分地予以歼灭性打击。我要使这些非装甲步兵师在一种碾碎的方式下就歼，使他们在侧翼和后方随处受到攻击，使他们的补给线遭到遮断。这些作战行动必须机密策划，必须在我所属各部队的能力限度之内，才能达到预期的战果。否则，就会偷鸡不成蚀把米，画虎不成反类犬。我估计敌人的装甲部队将不会按兵不动，坐视步兵师被逐步消灭；很可能会发起有力的反击。如果敌人的装甲部队出击的话，那就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摧毁敌人装甲部队的最有效手段，便是诱惑他们攻击我军以逸待劳的装甲部队。我计划使我装甲部队进出于碾碎作战地区以外，然后再利用敌雷区妨害敌装甲部队的行动，使之不能干扰我作战的进行，办法是用我们自己的战车封锁住雷区通道。如此，我们便可以为所欲为，遂行计划中的作战行动了。

全盘作战的关键是第 30 军能否完成突入战斗，能否建立起第 10 军装甲师必须通过的通道，假如各先头装甲旅不过于迟缓地通过走廊地带，那就胜利在握了。我们究竟能否办得到这一点呢？为确保万无一失，我计划在我获悉走廊地带已告肃清以前，以第 10 军各装甲师紧跟在第 30 军各先头步兵师后通过走廊地带。此外我命令假如在 D+1 日也就是 10 月 24 日清晨，走廊地带还没完全肃清的话，则各装甲师尽可自行杀出一条出路，进入雷区最西侧外面的开阔地带。这项命令很受各装甲部队的欢迎。修正计划期间，情报官威廉斯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我们正面的德意两军部署方式叫束腰布局。其意为，隆美尔在整个战线上将他的德军步兵和伞兵部队部署在所属意军各部队中间，或者在意军各部队的后面，因为，当战斗达到惨烈高潮阶段时，意大利军会顶不住。这时，保持了顽强战斗力的德军便可乘势出击，击溃盟军。这是德军保存实力的一个好办法，也是对付盟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威廉斯认为，假如我们将德军和意军隔断，对作战将会大有帮助。因为我们可以不太费劲地突破纯意军据守的阵地。这番分析形成了碾碎作战基本计划的一个主要特点，为阿拉曼大捷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阿拉曼战役实际上有两个计划，代号都是“轻步”。这两个计划都是根据同一个设想制订的。由于隆美尔的防线从地中海岸起向内陆延伸约 45 英里

到无法通行的盖塔拉洼地的边缘，因此没有可以迂回的暴露翼侧。隆美尔必然料到英军要发动进攻，因此，只有让敌人摸不清第8集团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和地点，才有可能达成突然性。这项任务是通过采取上面亚历山大所提到的“欺骗措施”以及通过第13军在南面发动辅助进攻来完成的。

我的欺骗计划是在8月9月间设计和制订的，它是沙漠战中迄今为止最精美绝伦的欺骗计划。它是在集团军的范围内进行的，代号为“伯特伦”。

欺骗计划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尽量隐蔽我方行动企图，不使敌人得悉。二、如果攻击企图被敌侦知，则着重在攻击的时间和主攻方向上作文章，迷惑、麻痹敌人，达成此目标的手段是一面在北翼隐藏真正的企图和行动，一面在南翼造成一种将要在南方发起行动的假象诱敌上当。整个欺骗行动由集团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任何细节都必须予以慎重处理。在有限时间之内完成此行动，需要极细的计划和大量的工作及工具，需要在后方大量生产各种欺骗器材，需要建立一所由训练有素人员的专门人员管理的伪装材料库，更需要千百辆车辆进入选定地区的运动协调，只有所有这些要素都能按照预定计划备齐，欺骗计划才能够顺利实施。

视觉欺骗方面的特点之一，便是在北翼第30军地区内，造成突击行动所需要车辆的密度和行驶频率，要采取的办法是用假车辆假扮坦克和其它车辆的运动，使敌人对大量部队在作战阵地上集结逐渐习以为常。但在夜间则用突击师的真作战车辆把已经“在位”的假作战车辆替换下来，并用被称为“遮阳板”或“吃人者”的专门伪装物把战斗岗位上的火炮和坦克掩蔽起来。我们还在总攻日前一个月就力参加突击的步兵挖好了细长的战壕，供他们在10月23日昼间躺卧用，而且这些战壕都伪装得好像是地形的一部分一样。

在后方，则乘各攻击师和其他单位到达、真正车辆向外移动时，立刻用模拟车辆，造成一定的车辆密度，以迷惑敌空中照相侦察，这一计划的实施，由查理·李查逊完成。

为准备行动，我们还必须在北翼建立许多物资屯储设施。譬如，我们在阿拉曼车站附近建立了一所规模相当大的仓库。这所仓库预定屯储600吨补给品，2000吨油料以及420吨工兵材料。如何使这些仓库和屯储设施不被敌人发觉，是一个相当严峻的大问题。这些仓库的四周全是开阔地，只有杂乱无章的炮弹坑和纵横交错的壕沟。负责作业的单位巧夺大工，将设施掩蔽得不露痕迹。

我们还在南翼地区敷设了模拟油管，由于形象逼真，竟使敌人认为我们的主攻方向指南翼。模拟油管的敷设工程开始于9月下旬，在工程进度方面，故意显示其完成时期在11月上旬前后，模拟油管全长20英里，起点是比尔·萨狄南侧的一个给水站，终点位于萨玛开特·加巴拉东端4英里处。油管槽沟完全按正常方式挖掘。运送油管材料的长达5英里的模拟铁轨，是用汽油桶做成的，和槽沟中行向西蜿蜒。槽沟填满5英里之后，我于9月14日和10月6日分别下达了两个有关振奋士气和严格控制指挥权的指示。模拟铁轨也向前展延。另外，我们还建立了两处给水站和储水池。

另外我又专门针对保密工作下达了一项训令。我认为在停止所有官兵休假，使之和外界隔绝以前，决不可将我们的攻势企图告诉部队；但我不愿明令取消休假；以免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紧张气氛，因此我便下达了一项训令，规定了各级官兵进入状况的时期：

旅长和各级工兵部队长 9月28日

团首长 10月10日
连长 10月17日
其余军官和士兵 10月21日

到10月20日那天，再下令禁止全体官兵前往亚历山大或其他市镇。各级军官也在不公开下达命令的情况下悄悄地停止一切休假。我告诉他们，敌人可能在满月期间有所行动，所以各级官兵必须在阵地待命。

由于有了这个明确的规定，一直到10月21日那天，连同士兵在内的每个人都没能离开沙漠地区。

但有一点必须考虑到的就是，配置在敌方阵地中的部队以及可能向无人地带派出的单位，因为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袭击，都有被俘的可能，所以在10月23日——也就是D日以前，决不可告诉他们任何有关行动的消息。

此时，第8集团军的编成情况是：

第10军辖 装甲第1师、装甲第8师、装甲第10师

第13军辖 装甲第7师、步兵第44师、步兵第50师

第30军辖 步兵第9师（澳军）、步兵第51师（苏格兰军）、步兵第2师（新西兰军）、步兵第1师（南非军）、步兵第4师（印度军）

其他部队有希腊第1旅、战斗法军第1旅、战斗法军第2旅、战斗法军第1飞行纵队、装甲第9旅、装甲第23旅

因为这是一场集团军会战，是根据计划由集团军司令部缜密掌握的会战。所以，中校以上的各级军官对我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必须要了如指掌，对于我的指挥方式必须能心领神会，对于他们如何行动才能和基本计划密切吻合必须胸有成竹。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各部队行动的高度协调。于是我在10月19日、20日分别对各军中校以上军官进行了训话。然后又发布了告官兵书。

第8集团军司令告官兵书

1、在我接管第8集团军之初，曾正告各位，我们的使命在于摧毁隆美尔与其非洲军团，一旦我们准备就绪，就应完成此使命。

2、目前我们已准备就绪。

目前即将展开的会战，将为历史上决定性战役之一。此次会战将成为大战的转折点。举国上下无不以关切之情，注视会战的发展，我们将立即以事实答复国人，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3、我们拥有第一流装备：性能卓越的战车、威力强大的战防炮、大量的火炮与弹药；我们拥有举国最优秀空中打击部队的支援。

最重要的是，本集团军的每一官兵，均应以贯彻到底的决心，进入此次会战，均应以旺盛无比的斗志，奋勇杀敌，以争取最后胜利。

倘若人人都能达成以上要求，则所得者必将为胜利的果实——必将能同心协力彻底痛击敌人，而将之驱出北非。

4、我们能早日赢得此次战争转折的会战，即能早日凯旋还乡，重享天伦之乐。

5、所以，每一官兵均应以无比的斗志，以及一息尚存、誓死尽职的决心，昂然进入战斗。

在未负伤及尚能战斗的状况下，决不轻言降敌。

我愿与各位虔诚默祷全能的上帝，庇佑我们能在此会战中，获得胜利。

第8集团军总司令

官陆军中将

B·L·蒙哥马利

1942年10月23日

这一阶段，除了以上工作外，我还尽一切可能同时解决了训练和重新编组这两个棘手问题。之所以需要训练是因为未经过训练的第44师又在一次战斗中遭到了惨重损失。该师的131旅在9月29日夜间接对穆纳西卜洼地进行了第二次袭击。一个营遭到了重大伤亡。原因又是由于缺乏经验而忽视沙漠战规则。巡逻搞得很差；由于没有获得有关敌人阵地的准确情报，大量支援炮火都浪费了；而该旅甚至还没有学会在夜间如何克服在没有地形特征的地区进行长途行军接敌所可能遇到的困难。该师的两个旅由于遭到失败和损失已经被解散了；而第三个旅，即133旅，则被调去力第10军组建一个车载步兵旅。该旅不得不学习沙漠战的必须知识，同时又要学习在装甲师中充当步兵所需要的新技术。第44侦察营和一些运输排也被调出来执行它们所不熟悉的任务——清除地雷场。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师比第44师更不幸的了。

另一个新的步兵师是第51高地师，它的运气较好。第51高地师驻扎于哈法山脊，它是为第44师换防的；而第44师又去换新西兰第2师的防，让后者到海滨休整和训练，第51高地师拥有自己的训练场，它曾经在训练场上进行过好几次演习，并且还把所属各旅轮流配属给北面的澳大利亚师，以使后者每周能够抽出一个旅来进行紧张的训练。在第7装甲师里，第4轻装甲旅在10月18日以前担负着作战任务，不能进行训练；但第22旅承担的任务要少一些，因而进行了3次演习。在第10军里，由于新装备到达缓慢而进一步加剧了训练的困难。图卜鲁格陷落后罗斯福慷慨提供的300辆“谢尔曼”式坦克实际上在9月份就已经运抵尼罗河三角洲了，但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下，这些坦克却迟迟不能装备部队。例如，第8装甲旅直到10月17日才得到应给它的33辆“谢尔曼”式坦克中的头15辆，其余坦克、直到战役前夕才到达……而且缺乏必要的零件。例如第9装甲旅在“增压”作战中拼死进攻时，在它的某一个坦克连中，只有连长乘坐的坦克罗盘工作正常。

鉴于隆美尔防御工事的性质，训练大纲中最重要的训练项目是扫雷分队的训练。这种训练是在第8集团军工程兵指挥官基希准将的监督下进行的。基希是一位卓越的军官，后来牺牲了。他挑选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英国陆军工兵第3连连长彼得·穆尔少校来负责训练工作。关于穆尔，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战役发生前不久的一个早晨，他发现几个地雷工兵卧倒在鲁韦萨特山脊上，向一个德军的机枪哨还击。这些工兵刚刚清除完一个地雷场上的地雷……穆尔问道，为什么不把那个机枪哨也清除了呢？说完，他就拔掉两个手榴弹上的安全栓，并命令一个地雷工兵开车把他径直送往那个机枪哨。途中，这辆吉普车碰上了地雷，穆尔被炸飞到了空中，士兵们都以为他被炸死了。

然而，几分钟后他背着那个受伤的司机返回来了。敌人的机枪哨的火力还没有压制下去，但是当他被地雷炸飞到空中的时候，他的手指一直按住两个手榴弹的栓，落地后，他把这两个手榴弹插到吉普车的后轮里。他们会炸死出来抢吉普车的德国兵的。”

基希搜集了资深的军官们对扫雷的看法，然后把这些看法告诉了穆尔并

指示说：“我肯定认为我们应当进行一次扫雷训练，正像我们进行火炮的装弹和发射训练一样。去吧，一星期后再带着你的建议来找我。当你制订出了你的训练方法，并由我批准后，你就可以成立第8集团军扫雷学校了。”在穆尔以及后来在一个新西兰人——柯里少校的领导下，这个扫雷学校制订出了一套训练方法，在10月23日以前训练出了56组扫雷人员。

他们还制造了一些机械工具来帮助地雷工兵执行他们的孤独而危险的任务。有20多辆“马蒂尔达”坦克被改装成了扫雷装置，这种扫雷装置在向前运动时能够用它的旋转轴上的旋转链条鞭打前面的土地。遗憾的是，这种扫雷装置行动很不方便，鞭打土地时掀起滚滚灰尘，从而使机器过热。因此，这种被人叫做“蝎子”的扫雷装置主要是供第7装甲师在南面进行佯攻时使用，但—63—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这是在野战条件下对一种有价值的扫雷装置的试验。后来，这种扫雷装置在英国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改进，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以及随后几个月的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阿拉曼战役中，用处较大的是发给三个军的500多个地雷探测器，用这种探测器探测地雷比用传统的手戳法探测地雷速度更快，因而也更安全，在这次战役中，地雷工兵的扫雷规模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为了在布雷区开辟通路，发给了他们长达120英里的标示带和88775盏灯。

我的对手的十分在行的评论是对我强制实施的紧张训练计划的最佳报偿。隆美尔在回顾这次战役时，特别指出了英国地雷工兵在布雷区开辟通路的技能以及坦克和步兵紧跟着推进的技能。他写道：“在夜间进行这种机动显示出他们具有特殊的技能；在这次进攻之前他们一定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训练。”的确，隆美尔曾多次赞扬他的对手良好的训练水平，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替自己辩解。这是一位大师在赞扬另一位大师。

隆美尔还作出下述评论：“这一仗在射击开始之前就由军需官们打了和决定胜负了。”对这一点我也表示赞同，我一向认为，每次战争之前都必须精心算计，都必须尽量地减少人员的伤亡，为此，我需要尽可能全面完善的后勤保障。我在前沿地区的后勤安排以及从基地区域得到的后勤保障，使野战火炮在阿拉曼战役的12天里，一共发射了100万发炮弹，平均每门炮每天发射102发，而中型火炮每天的发射量比这还要多，在这方面就和在其它方面一样，我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但是尽管有巨大的人力物力优势，第8集团军还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经常有人指责我在阿拉曼打了一个“事先精心布置好”的仗，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类型”的仗。事实是，隆美尔的部署使得我必然要这么打。在沙漠战的历史上，进攻者第一次不得不设法突破一条由防御工事构成的连绵防线。这些防御工事的纵深从2.5英里到4.5英里不等。在大部分防线上，特别是在我试图突破的北部和中北部防线上，有两条大致相平行的地雷带，在这两条地雷带之间还隔着一个人们恰当地称之为“魔鬼花园”的山拗。这是一个散布着各种地下爆炸物的区域。隆美尔曾描述过“大量缴获的英国炸弹和炮弹如何被设置到防御工事里，并在某些情况下如何用电来引爆。”（隆美尔还提到用狗来看守防御工事！）这一复杂的防御体系的南段是以英国原来的两个地雷场为基础（即“1月”和“2月”地雷场，在哈法山战役后，隆美尔仍占有这两个地雷场），再加上从盖塔拉洼地延伸至塔卡高地的一系列简易防御工事。

隆美尔通过在每一个防御地段采取审慎的配置来加强这一总的防御体

系。每个营只有一个连配置在战斗前哨上，战斗前哨沿东部地雷场的边缘延伸到一定纵深；主要防御部队都放在后面的主要防御区里，主要防御区位于西部地雷场后面。在两大地雷场之间还有许多地雷带，这些地雷带布置成能够为前沿部队提供翼侧保护的“箱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德军的实际布雷规模了。根据隆美尔的工程兵指挥官在战役开始前两天的一份报告，德军在这次战役中总共布设了44.5万颗地雷，就算只有3%即约1.4万颗杀伤人，那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更使英军为难的是，即使持续不断地进行巡逻也只能搞到当面布雷区边缘的准确情报；至于布雷区其余部分的情况，就不得不依赖空中照相来判断了。此外，德军的炮兵和重型反坦克炮都部署在后面，即在主要防御区或主要防御区后面。隆美尔希望凭借这些措施，能够经受住英军的第一次突击（他知道这种突击将得到强大的炮火支援），而不让英军达到或突破主要防御区。这样，从两翼侧和正面实施分进合击就可以迅速地将英军的更强有力的突击堵住。隆美尔最害怕的是英军在他的防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让大量英国坦克源源开进，因为他知道德军缺少燃料，不能进行长期的机动作战。

这就是隆美尔把德军第21师和阿里泰装甲师配置在南部防线后面而把第15装甲师和利托里奥装甲师配置在北部防线后面的原因之一。他希望在那些有可能被突破的地方，能够把坦克调去堵截而不需要消耗太多的汽油。至于步兵，他有另外一种考虑，他把一个意大利部队配置在一个德国部队旁边，他认为通过这种强弱交互配置的方法，他手边就能经常有德军部队供他调遣前往即将被英军突破的地方。遗憾的是，下面我们将要看到，隆美尔的这种以零星增援“堵缺口”的作战方针正是我所希望的。更为遗憾的是，当这场战役开始的时候，隆美尔甚至不在非洲。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因此，他在9月19日便把指挥权移交给了斯图姆将军，他本人则在23日就离开德尔纳回国去了。斯图姆是一位坦克部队军官，曾在俄罗斯战线指挥过一个军，但在沙漠上却是一个新手。但不论如何，正如拜尔莱因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轴心国防御部队的部署，特别是装甲师的分开部署，是由隆美尔而不是斯图姆负责决定的。

在第一个“轻步”计划中，我曾试图劈开隆美尔的防御工事，然后迫使他打一场坦克战。当初我曾想将主攻放在北面进行，具体由30军实施，我计划在此处敌防线与布雷地带订开两条走廊。第10军（军长卢姆斯登）在通过这些走廊后，在敌供应线两侧的重要地带建立阵地。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必将对那里发动进攻，我希望将其就地消灭。我不打算在我的左翼进攻，也不准备在右翼进攻，而要在中央偏右处突破，说来也巧，斯图姆也认为主要突击将发生在防线中部，但他却把他的预备队——第90轻装甲师和的里雅斯特师保留在原来由隆美尔部署的海岸地区。

当然，我说我不打算在左翼进攻，并不是说要放弃发动一次佯攻以配合第30军在北面的主攻。这次佯攻将由第13军对南面的“1月”地雷场和“2月”地雷场进行，目的有两个：佯攻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威胁性，足以阻止轴心国在南面的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在战役初期向北面战线转移；如果佯攻顺利，它应当打开一个缺口，让轻机动部队开过去扰乱敌人后方。我严格规定第13军不得遭受重大伤亡，特别是第7装甲师必须保持完好状态，以便主要突破成功后用来扩张战果。但是，到10月6日，我开始觉得我的集团军负担过重。诚然，训练正在尽快地进行着，但是，整个集团军特别是装甲部

队的训练水平还不足以保证干净利落地迅速突破，并在“轻步”计划所要求的坦克大决战中取得优势。第8集团军自组建以来已经伤亡了8万人，而自“十字军”作战行动以来一直没有时间进行训练。因此，我们必须制订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战斗原则的计划。过去一般公认的原则是，现代战役计划应当首先着眼于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就很容易对付。我决定把这个原则颠倒过来，先消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暂下打他的装甲师，留待以后再收拾它们。我准备把一个坦克屏护队向前推进以堵住地雷场道的西部出口，并用“粉碎性”作战行动来有条不紊地消灭轴心国防御区内的步兵，以此迫使敌人同我交战。隆美尔不会坐视他的步兵被消灭，因此我希望刺激隆美尔闲其分散配置的坦克部队来进行紧急的孤注一掷的反突击。“粉碎性”作战行动是在一系列坚实的基础上周密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在我军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也确实像隆美尔所说的那样，“粉碎性”作战行动是建立在准确计算的原则上的。及早组织坦克屏护队则是这种作战方针的关键。我决定在地雷场的通道清扫完毕之前，就让第10军进入并通过这些通道。如果到总攻击日期晨地雷工兵和步兵还没有把必要的通道开辟出来，那么各装甲师必须各自扫清道路，进入开阔地带。丘吉尔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战役操心，他甚至在我改变计划之前，就给亚历山大发了一封电报，他说：“发明坦克的本意是为了在敌人机枪人力的威胁下替步兵开辟道路，现在却要步兵来为坦克开辟道路。在我看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67—务，因为火力已经大大加强了。”事实的确如此。

卢姆斯登和他的师长们对我的计划肯定也有这样的看法：按这个计划打，步兵很可能受阻，而坦克如执行命令在地雷场上打出一条通路则可能带来灾难。他们的怀疑影响了新西兰师师长费赖伯格、澳大利亚师师长莫斯黑德和南非师师长皮纳尔。这三个人都是各自对自己的自治领负责，他们向第30军军长李斯报告说，他们都对坦克执行任务的能力缺乏信心，李斯把这报告了我。刚从第10军参加会议回来的戴君干也表示他怀疑卢姆斯登是否坚定。对此我均未予理会。我一向认为：“当人们对重大问题有疑问的时候，不应当让多数人的意见占上风。在这种场合，数量没有什么意义。我既然发布了命令，就决心不折不扣地加以监督执行。”

另外，我是战役的总负责人，一方面我预计在“突入”之后将发生至少持续一周的“混战”，另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步兵并不是很充足，特别是自治领的几个师增援力量薄弱。我不能在战役的最初阶段分散使用步兵，而必须发挥装甲部队的作用。损失一些坦克（并非乘员），我是经受得起的。

10月23日清晨，我出席了记者招待会，下午来到靠近第30军司令部开设的指挥所。晚上看了一会书，便早早上床休息。晚上9点46分，1000多门火炮开始射击，拥有将近1200辆战车的第8集团军也在隆隆的炮声中发起了期待已久的攻势。这时，我正在指挥车里好梦方酣：因为当时我无事可做，只有等到一觉睡醒后，才能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每次会战胜负未决时，情况永远紧张得扣人心弦，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尽量休息，尽可能地养精蓄锐。

有关这次会战的始末，我不再赘述，仅摘几段当时的日记便可略知一、二。

10月24日星期六

攻击已经按照我的计划在10月23日发动。整个战场完全是片辽阔无比

的雷区，一直到10月24日早晨8点，北翼方面的两条走廊地带，还不曾替第10军的装甲师完全打开。在此种情况下，根据我的命令，各装甲师应自行杀出一条出路，向开阔地进击。但他们对这项指示奉行得并不彻底。我发现他们相当踌躇，举动犹豫不决，高级军官普遍缺乏一种大胆的旺盛的斗志。他们都表现得畏首畏尾，担心战车损失；对所有敌军火炮，不论是什么性质，什么种类，都称是8.8公分高炮（一种德军担任坦克任务的高炮，威力非常大）。第10军军长表现不佳。当行动发生错误时，他发挥不出应有的独断专行的决心。各装甲师也普遍地缺乏旺盛的攻击精神。很显然，他们既打不惯这种战斗，又缺乏果决的统帅素质。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驱策各装甲师前进。于是，我立刻召见卢姆斯登，告诉他，必须驱策他部下的各师长前进，假如再继续观望，我就将他们全部撤换，派积极的军官去接替他们，我这一手立刻便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晚6点，在北部走廊里装1师的一个装甲旅，已经冲进了开阔地带，并且马上就受到德装甲第15师的攻击——这种攻击正是我所希望的。

在南翼方面的新西兰师已经开始向西南运动，遂行他们的碾碎作战。再往南，第10军也能按照计划攻入敌阵。

10月25日星期日

我想这才是所谓会战中的真正危急状况。第10军于午后2点30分报告，装10师在第30军地区，南走廊内的进展不十分顺利。雷区和其他困难，使前进一再受阻。装10师师长曾表示，他对这次作战并不乐观；他认为纵令他能冲出敌阵，进入开阔地带，也将会在米特瑞雅山脊的前斜面上，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局面下。他承认自己那个师训练不足，极不适于担任类似的艰苦作战任务。他要求停止前进。卢姆斯登差不多就要同意他这项要求。北部走廊—69—里，装1师已经突出到开阔地带，而且受到敌军装甲部队的猛烈攻击，这种情形完全如我这个“医生”的“诊断”一致。戴君干认为，我应立即和两位有关军长碰头，把握住形势的发展，他果断地下令，召集两位军长于清晨3点30分来指挥所出席会议，然后，再跑来将我唤醒报告他的处置经过，我完全同意并很欣赏他的果决措施。李斯和卢姆斯登按时到达，我让他们分别报告当面的状况。

我发现，装10师的一个装甲兵团已经突入开阔地带，预计在拂晓时分将有更多的兵力突入。那位师长要求将所有突入的部队全部撤退到雷区后面，放弃他既得的一切优势，他的理由是在开阔地带的他那个师可能会遭受惨重伤亡，卢姆斯登同意他的要求，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在电话里和这位师长谈谈。我立刻和他通话，交谈之下，我愤慨无比，怒火中烧；他竟在他先头装甲旅后方差不多16000码（将近10英里）处，我非常严肃地命令他立刻到前方去，亲自负责他本师的作战指挥，他必须杀出去，必须在部队先头领导而不能在后面压阵。

然后，我告诉两位军长说，我的命令决不变更，也不许在我的计划上打任何折扣。散会后，我将卢姆斯登留下，和他积极但白地交谈了一阵。我说，我决意让各装甲师都能突出雷区，进入能机动的开阔地带；现在任何踌躇逡巡、犹豫不决的行动都将会招致万分危险的后果。假如他本人或装10师师长认为他不适于这种行动，那么，我将另请高明。

早晨8点，所有装甲部队都进入开阔地带，到达了我原预定在头一天就能到达的位置。中午，我在新西兰第2师指挥所里，召集了一次军长会议。

新西兰第2师的西南向运动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我决心立刻中止这项行动，我下令，将“碾碎”作战转移到澳军步9师辖区，改而北向海岸回旋，这种新突击战线完全是种一百八十度的回旋，我希望能够出其不意地捕捉敌人。

12月28日星期三

我们已经苦战了三天，根据伤亡数字显示，此后的作战必须慎重，最后的一击必须在30军正面发动。

不过究竟应该发动在何处呢？我们在北部其面对着隆美尔的全部装甲军团，决不可能在那方面打出去。所以那方面我也取得守势，将装1师拉出来控制为预备队。

同时，我又将第10军司令部控制到预备队位置使之准备最后的突破。

我将南翼的第13军作为机动部队处理，除安排一个师的兵力实施正面防守外，其余部队一律由我亲自指挥，作为总预备队，留待最后一击时，作杀手脚使用。

我还下令澳军步9师加强向海岸地区的作战。这时我的计划是沿着公路轴线，发起最后的突破作战。

10月29日星期四

早晨，情况越来越明朗。隆美尔的全部德军显然集结在北部。装1师在北部走廊地带的行动以及澳军步9师北向海岸的作战使他认为我们是企图在北翼沿海地区突破。当时我的确曾打过这种算盘。

现在德军已倾巢而出，集中在我们右翼，再也不能“照顾”意军。德军集中在北翼，南翼方面全是意军，两军之间恰好在我们原来北部走廊地带的北端。

我立刻改变计划，决定将最后一击指向德意两军的接合部稍南侧的意军阵地上。我于11点下定了这个决心。我计划让澳军步9师在10月30号夜间向北猛攻，直至海岸地带。这样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在北翼地区。然后再于第二天夜间，在原来走廊地带北端的敌阵上打开一个缺口，这一行动交给新西兰步2师负责，我将以装9旅和两个步兵旅加强新西兰师，这次会战将由第30军指挥。最后，我再用第10军的装甲师从这个缺口里冲进去。此项行动代号为“超装药”。

10月30日星期五

我写了一早晨为遂行“超装药”作战的训令，此类命令和训令，我总是亲自起草，这是种“主计划”，只有“主人”才能动手写。在第8集团军，这种方式已经成了标准作业程序，以下便是我今天所写的：

绝对机密超装药作战第8集团军计划1942年10月2日

1、“超装药作战”将于10月31、11月1日夜间发动，本作战之目的如下：

- (a) 摧毁敌之装甲部队。
- (b) 强迫敌军在开阔地带决战，使之在经常而持续之运动中，耗竭其油料。
- (c) 切断敌之补给线，并阻止其补给勤务之运动。
- (d) 迫使敌人退出其前进着陆场与飞行场。
- (e) 藉前(a)、(b)、(c)与(d)项行动之综合运用，以瓦解全部军团。

2、第 30 军之行动

(1) 自现在第 297 与 301 北座标间之前进阵地，发起夜间攻击，西向突破 4000 码之纵深。

(2) 到达最后目标之际，以装甲与步兵。继续向西推进，以掩护各装甲师进出，以便于其展开。

(3) 突破正面之肩部，并尽力固守，其东翼则应与我军现阵地紧密结合。

(4) 全部突破地区，应立即予以扫荡肃清，以确保今后攻势作战之立足点。

3、第 10 军之作战

(1) 第 10 军经由第 39 军造成之突破口，进入开阔地带。

(2) 11 月 1 日黎明前，应以至少两个团的装甲车，由桥头堡地区，分别向西北、西方、西南与南方推进。

装甲车部队应对敌军补给线采取攻势行动，随时随地摧毁所经过的一切目标，阻止敌军任何补给品或增援部队的前进，并切断敌军前、后方之间的任何运动。

装甲车部队必须有遂行数日独立行动的准备，应继续不断地压迫敌人，以及随地利用敌军之油料与补给品。

(3) 第 10 军所应夺取并确保之第一目标为：座标 858299 之 46 高地，巨座标 86007 之泰勒·艾尔·阿跨奇间之一般地区。尔后之作战，将发展为：

(a) 摧毁敌之装甲部队。

(b) 彻底瓦解敌人后方地区。

(4) 第 10 军为达成前(a)款行动之一般作战轴线，将为西北向至加兹阿勒车站之线，循此挺进至西狄·拉赫曼地区敌人后方，以阻断敌人。

(5) 第 10 军之前进运动，应注意时间之把握，务期能干 11 月 1 日黎明前攻占目标区，日出时分，即应由目标区继续扩张战果。

(6) 倘第 30 军遂行前第(1)、(2)之行动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则第 10 军所属之各装甲师，即当将向第一目标，自行攻击前进。

4、第 10 军与第 30 军

(1) 第 30 军应将新西兰步 2 师随时保持待机状况，准备接替前第 3(3)段中第 10 军第一目标之防务，俾使第 10 军所部，得以继续对敌人装甲部队之攻势作战，或指向加兹阿勒车站，继续向西北进出。

(2) 作战期间，第 10 军与第 30 军间应确保最紧密之接触、合作与联络。

(3) 倘本作战奏效，则定能彻底瓦解敌人，更进而促使其最后之溃败与摧毁。本作战必将奏效。

果决的统御风格将关系到作战的成败，在此次战斗中，将决不容许有踌躇迟疑之举，必须发挥独断专行之冒险犯难精神，亦不许有怀疑命令之事。

我号召每一级部队主官，务期能以果决之意志，指挥所部英勇奋战激发起各级军官与士兵的乐观心情，与旺盛的攻击精神。“超装药”必将赢得胜利。

5、第 13 军于 10 月 31 日入夜前后，应竭尽全力，在南翼方面遂行佯动行动，务使敌人认为我军之攻势重点，系指向于南翼地区。

6、当发现当面之敌有不支之迹象时，应不失时机地采取果断必要行动。

7、装甲第 7 师(欠第 4 轻装甲旅)、步兵第 131 旅(皇后近卫步兵)将为控制军团总预备队，准备依状况之发展而运用之。

8、皇家空军目下正展开积极行动，以沮丧敌军战志，摧毁敌军物资。

自明日起，此种行动将逐渐加强，至“超装药作战”发起之际，益将推演达于高潮顶点。

9、我们根据不同来源情报获悉，敌军目下所面临之状况，已至为恶劣，其处境亦日形艰难。第8军团与皇家空军的连续不断的攻势行动，已使其战斗力锐减，倘能立即予以重击，则必将促成其最后之溃败。

此项重击之第一阶段，亦即本晚在北翼方面由澳军步9师发起之作战的奏效与否对于“超装药作战”将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行将于明日10月31日夜间发起之“超装药”主作战，将为加于敌人身上之第二次重击，余认为，经此一击后，敌人必将蹒跚摇曳，而终至一蹶不振。

10月31日星期六

我发现，有关“超装药”作战的发起时机还需要研究研究。如照原计划在今天夜间发起的话，很可能会遭到失败，于是，我便决定改变初衷，将攻击时间延期24小时，改在11月1日夜间动手。这种延期可能会对敌人有所帮助。为抵销这种不利，我又决定将突破纵深再延长2000码，总共是6000码——全部突破行动将在炽烈无比的炮火掩护之下实施。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疑“超装药”作战的可行性，议论纷纷，交头接耳、杞人忧天、盲目地讨论着什么“攻击失败后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对这种怀疑，我根本就不屑一顾，再懒得理他们了，因为我已经对每个人说得够清楚了。

11月2日星期一

凌晨一点钟，“超装药”作战行动发动了，在正面4000码、纵深6000码的地区上，我们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攻势。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在开阔的沙漠里倾巢而出。到黄昏时分，我们已经捕获了1500名战俘。

11月3日星期二

种种迹象显示，敌人就要撤退。他们已快完蛋了。

11月4日星期三

清晨2点钟，我给了最后突破地区的关键要害以两记重击。那些地方的敌人曾试图阻止我们扩张突破口的行动。全盘会战在这两记重击之下宣告结束。天色破晓，各装甲车团纷纷通过了突破口，紧跟着，各装甲师也相继冲进了开阔的沙漠地带，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没有雷区的安全空间，可以随意机动，以打击敌人的后方地区和退却纵队。

各装甲车部队向敌人的退却路线杀去。

南翼第13军正面的意军，除举手投降外，别无选择，他们完全无法逃脱；因为德军带走了所有运输工具。我指示何若克马上将这些意军战俘集中起来，然后集中全力于隆美尔部队的追击作战——隆美尔这时已经率部向西退却。

任何一次战斗都会有不少教训，此次会战的教训是：

第一，突入阶段。完全是争取阵地或争取战术优势的战斗，这个阶段结束时，我们所占领的阵地位置及在兵力（均衡）方面，必须要有利于第二阶段的立即开始。

第二，硬仗。我们在这个阶段将敌人击溃，使其战斗力瓦解以至丧失。

第三，突击。这个阶段的高潮是对选中的某一点以致命一击。我们在硬

仗阶段已使敌人认为我们的突击行动来自北翼，沿着滨海公路轴线突出。隆美尔对这种行动很敏感，所以将他的德军部队集中在北翼，准备迎击我们的突击，而将意军留下固守南翼。于是我们便选定德意接合点附近的意军正面，给以猛力一击。此次会战，果决的统御是各级部队致胜的主要因素，部队阶层越高，这项因素的决定性色彩也愈益浓厚。

任何将领，倘若在事情不理想时消沉沮丧，对如何将事情办妥，既缺乏应有的“魄力”，对如何贯彻规定的计划，又毫无办法、毫无泼辣的气质和胆量，那他便是庸才！事实上，这种将领不仅无用，而且还是本军中具有威胁作用的危险人物——因为在敌我相持不决的状况下，指挥官的任何踌躇逡巡，都会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而波及全盘战斗。在指挥官自认失败以前，决不会有败仗；假如不是我坚定不移地坚持我的计划，那么，我们在阿拉曼就决不会打胜。

第五章 阿拉曼，从战无不败到战无不胜

不堪一击的意大利军

上帝不让我当俘虏！

挺进！挺进！挺进！最人限度的挺进！

目标：的黎波里

丘吉尔：与蒙哥马利并肩作战是每一个军人的骄傲
走出非洲

11月5日，第8集团军开始追击，我以卢姆斯登的第10军为先头部队，让李斯的第30军原地整编，让何若克的第13军清理战场。意军战俘很多，不可胜数，在手提衣箱的将领们的率领下，成群结队地向英军投降。

我的目标是黎波里，第8集团军一直把这个地方看作行动的目标。但以往的历次作战都半途而废，这一次我决心一定要把愿望变为现实，为此必须首先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a、攻占奥吉拉阵地，并固守由那里通往西方的各交通要道。

b、把一个具有强大装甲兵力的军部署在杰贝勒的麦基里附近加以训练，使之能向阻击任何妄图突破奥吉拉阵地窜犯埃及的敌军。

c、建议空军立即在玛尔图巴飞行场群及班加西以南地区集结其“沙漠空军”。

在玛尔图巴飞机场集结飞机，不仅会对未来作战产生影响，同时也是目前的迫切需要，因为一支驶向马耳他的船队将在11月16日离开亚历山大港。孤军奋战的马耳他岛上的粮食和油料都已消耗殆尽，这支运输船队能否安全通过克里特和昔兰尼加间的狭窄海域，安全到达马耳他，关系非常重大，如果没有沙漠空军的配合和掩护，则很难完成运输任务。

11月15日，空军在玛尔图巴各飞机场完成了战斗机的集结，按时掩护运输船队安然上路了。

为顺利展开以后的作战，我和沙漠空军指挥官坎宁安达成了如下协议：我们将运用空中力量为远程打击手段，和作为先头部队主力的各装甲兵团密切协调行动，一有装甲车部队报告各前进登陆场肃清后，战斗机中队便立即进驻，开始起飞作战，运用这种陆空军；密切协同的战术，不但能够干扰敌人的撤退行动，还能使我们自己的地面部队能随时随地获得空中掩护。

在我们到达奥吉拉之前，这里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激烈的战斗。毫无疑问，隆美尔肯定会撤退到奥吉拉附近原有阵地，力图在那里阻止住我们的追击；这样，他的补给线将大大缩短，而我们的补给线将会拉得很长。如此一来，我们便处在了不利的位置上。

于是，我计划等第10军到达杰贝勒后便停止前进，就地休息，而以轻装部队向班加西和艾季达比亚挺进。我相信，卢姆斯登会胜任这种作战。此后，我再以第30军、第10军主力攻击奥吉拉阵地，一旦得手，便可向的黎波里进军，我还决定，等第10军在杰贝勒站稳脚跟后，派何若克接管第10军，将卢姆斯登调回国内，经过阿拉曼会战我看出，在大规模会战中指挥一个军，已经超出了卢姆斯登的能力。与指挥作战相比，他更擅长于训练，回到英国更能发挥他的才能。决心下定后，我便请求立刻将邓普塞从英国调来接任何若克的第13军军长。这样，我便有了三位可靠的军长——李斯、何若克和邓普塞；他们三位过去都是我的老部下，李斯和邓普塞还是我的得意门生。这

些人事议案均经亚历山大批准。

追击发起不久，我便差点被俘，我派出去的一个搜索组为我在麦隆萨·玛储地区选择司令部宿营地，当搜索组接近麦隆萨·玛储时，便驶上一条通往玛镇东侧的一个叫私泉口村的小路。不料敌人仍在那里，这股敌人应该早被我解决，但横渡沙漠的追击部队因大雨而延误了行军进度，所以在搜索组到达时，还有敌军盘踞。搜索组全部束手被俘。当时我正在一支小部队的护卫下前进，就要驶上通向私泉口的那条路的时候，前方几百米处响起了枪声。我的先头部队和麦隆萨·玛储郊外的敌军后卫部队接上了火。

在这次追击中的其他作战都相当顺利。隆美尔两次差点被捉，但都被这滂沱大雨给挽救了，第一次是在11月6日和7日，我们的三个师均因油料不足而“抛锚”在沙漠里，因而无法按时到达麦隆萨·玛储参加合围，从而使隆美尔得以逃脱，第二次是11月15日到17日，三天的大雨使我们未能穿过沙漠，挺进艾季达比亚，在德军到达奥吉拉阵地前切断他们的退路，又一次放过了隆美尔。

我们在13天内挺进了560英里。很快地，后方支援逐渐无法满足我的要求，空军必须切断隆美尔的后勤补给线，必须对黎波里港口及黎波里和奥吉拉间的交通线加以彻底的打击。英军开始处于“晃悠”状况，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此时，除非我们的后勤方面有绝对的保障，否则，我决不会轻易与敌人接火。为了达到作战目的，我调动了所有的关系网，组织了大量的物资装备在“中东基地”，10月份的仓库里就有27.2万吨的弹药，9月和10月份，又收到了18480部车辆。在8月份，当地的兵工厂就生产了5万多枚反坦克地雷，光这些就等于隆美尔构筑阿拉曼防御工事所使用的地雷的总数。这些物资在威尔弗雷德·林塞尔爵士的领导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我手中……

当我们逼近奥吉拉时，我感觉到第8集团军团弥漫着一种焦躁情绪。他们曾到过这里两次，但两次都被赶了回去，所以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迅速攻下奥吉拉，以振军威。但这一次阵地易守难攻，只可智取而不可力夺。

最有利的作战方式是设法诱使隆美尔离开阵地，主动出击，这样，我便可以在阿镇西侧的平地上向他发动进攻，从而争取主动。

这时，第30军已经超越第10军，成为先头部队。我便将我的作战计划详细地交给了李斯：用弗瑞堡的新西兰师从玛拉达北侧阵地，迂回敌人的南翼，从那里攻击隆美尔的后方。同时，以苏格兰步兵51师和装六师从正面发动进攻。12月15日开始总攻行动。一切部署就绪后，我便飞回开罗，和亚历山大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并准备再弄些服装来。回开罗前，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突然成了“名人”，当我于星期日晚出现在圣乔治礼拜堂时，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掌声。

从开罗回到我的司令部后，我发现攻击行动很令人满意，敌人开始紧张，隆美尔已经着手将他那些毫无机动能力的意军往后方输送。于是我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两天。

攻击准备进展顺利，12月15日，新西兰步2师已深入到敌后，装7师也以锐不可挡的声势向前猛扑。这两个师还曾一度对隆美尔的装甲军团形成有利的夹击态势。德军被分割成许多小股，从新西兰师的间隙突围。16日战况惨烈，双方不断地捕获和抢救战俘。最后，德装甲军团终于向西突围，但在新西兰的拦截和空中攻击下，伤亡惨重，我下令新西兰步2师停止在诺菲

里亚整顿，以轻军装部队紧跟隆美尔军团，并随时和据守布瑞特的敌军，保持密切接触。

至此，我们达成了预期的作战目的，奥吉拉会战宣告结束了。

我们从阿拉曼追击了 1200 多英里，隆美尔及其大军已被我彻底击败。埃及从此安若磐石。由于圣诞临近，我便决定让大军乘机稍稍休整。我特地通过各种渠道从埃及搞到了大批的火鸡、布丁和大量的啤酒。圣诞前夕，我还向全军团发布了一篇《告全军团官兵书》，向大家表示慰问、祝福。这个圣诞节，我们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在浩瀚的大沙漠里，幸福地渡过了。

戴君于自从 8 月 13 日在亚历山大郊外十字路口和我分子后，一直被沉重的担子压着，他日渐憔悴，终于在会战期间积劳成疾。我立即派飞机送他回开罗休养，当时他已订婚，临走时我告诉他，最好能在回来销假之前，将终身大事办妥，戴君于离职期间，我调用第 13 军李斯的参谋长保比·厄斯金代理他的参谋长职务。

11 月 8 日，安德森的第 1 集团军于阿尔及利亚登陆，这时正向比塞大和突尼斯逼近。

攻占并确保这两个地点之后，他的下一目标便是黎波里。伦敦最高当局纷纷推测，究竟是第 8 集团军还是第 1 集团军先攻占的黎波里。殊不知在第 8 集团军全体官兵的心目中，攻占的黎波里非我莫属。三年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第 8 集团军念念不忘的目标，现在鸭子已经煮熟，就看我们伸不伸手了。

而此时，我的部队士气正日渐高涨，从一个士兵的给我的信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一点：“截止 1942 年 10 月 21 日，我已在部队服役了两年半，但我对军中的一切从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关切之情。我一直认为，军队的成败是当官的事，士兵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责任。但是，10 月 21 日那天，军团管理处王处长将我们召集到一起，宣读了您给我们的文告，那份文告使我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我以前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种文告，里面的每句话都对我们充满着信赖和信心，同时也流露出您必胜的坚定信念，它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心弦，从那天开始，我意识到我是属于某种东西——属于某种有生命力的力量，而所做的事又是如此的艰巨，虽然我仅仅是一名文书，但是这一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职务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伟大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大家都认为，您的演说是种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的谈话，这种谈话对士兵们的精神具有不可低估的强烈的震撼和感染作用。您那篇《告官兵书》已经完全超过了任何命令，您已使我们为能做一名第 8 集团军士兵而感到荣耀……”

敌人由奥吉拉退入布瑞特阵地，着手防御，我制定应付那一线阵地的计划基础是双重性的：

a、我不愿意敌人再长此以往地打退下去，我希望他们能站住脚跟和我打一场硬仗，这样我们便可以将其全歼。因为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很容易在南翼遭到包围，所以我一面把各攻击师主力控制在第一线后方至少 100 英里处待命，一面积极进行各种准备，恢复前进初期可能会出现的遭遇战。

b、攻击布瑞特阵地时，我必须着眼于黎波里。全盘作战的关键是速度，而早期攻占的黎波里的关键则在于支援。

我估计，在油料、弹药和粮食等补给品供应方面，至少要有 10 天的准备，当时我的作战部队是以图卜鲁格和班加西两处港口为基地，由这两处基地沿

公路西行，必须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将补给品送到一线各部队。因此，当务之急是不失时机地集结所要的支援物资。据参谋人员报告，各种物资可以在元月14日完成屯储。于是我决定在元月15日向西发动继续攻势。我清楚，假如我们不能在10天之内到达的黎波里，那么我们会因后勤保障的不足而不得不引兵东退。到达的黎波里后，必须尽快开放港口，恢复全部装运起卸作业；在攻占前决不容许敌人破坏港口设施。

因此我计划：在元月14日完成支援物质的屯储，元月15日凌晨以全力猛扑布瑞特敌阵，在十天内直捣的黎波里。这将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作战任务。

元月4日，地中海突然刮起强风，在班加西港口造成灾害：停泊在港口的舰船在锚链被扯断后，在内港横冲直撞；拖驳灯塔船和卸载设施也都受到严重损失。

风灾后，港口的日吞吐量由3000吨狂跌到1000吨。在风势似乎要继续下去的威胁之下，所有的航船都不得驶离港口；班加西便如此完全丧失了基地港口的价值，元月12日，港口的日吞量竟降到400吨。

情势的恶化，令人不无“其奈苍天何”之感，现在我们只能靠图卜鲁格了，而这里距的黎波里竟有1000英里之遥。到达的黎波里之后，我们还得建立可观的补给品库储设施来应付以后的需求。开罗方面也非常焦虑，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改变攻势日期，以便能有充分的时间重整旗鼓。

我认为：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直捣的黎波里。为贯彻这项决心，我决定将在杰贝勒和麦基里待机的第10军所辖三个师全部就地“搁浅”，抽调出这三个师的全部车辆，使之担任元月14日作战所需要的运补作业，由图卜鲁格和班加西两个港口，向西转运各种补给物资。

我立刻召见何若克，让他负责全部运补作业，以全部精力投入策划督导，编成了一支第一流的运补勤务单位，我们终于能按照预定日期展开攻势。

元月15日，我们开始前进。19日，进迫胡姆斯——塔胡拿敌阵，敌人极力固守，沿滨海公路轴线突入胡姆斯的苏格兰步兵51师，这时已经疲惫不堪了。元月20日，我召见了苏格兰51师师长，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结果非常见效，终于于元月23日凌晨四点钟进入的黎波里，此时距阿拉曼会战发起之日整整3个月。

我们在当地居民相当得体的迎接之下，进入了的黎波里，全城静悄悄的，没有丝毫惊慌的迹象，我召见了当地的意大利高级官员，对他们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安抚，我又任命卢旭准将负责当地行政事务，然后，我宣布全城实施军管，所有商店暂且一律停业，夜晚实施宵禁。我拒绝了当地政府官员请我住到总督府的请求，将司令部设到了离城4英里的田野里——在第8集团军我严禁所有官兵住到民房里、高楼大厦里，全军官兵都要像以前那样，住到野外。这一方面是为了全城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军的战斗力，我害怕他们被糜烂的生活所腐化，从而丧失战斗力。我清醒地意识到，等待第8集团军的将是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所以各部队一定要继续保持他们高昂的士气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此后我和李斯驱车进城，我们并排坐在海边，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嚼着香甜可口的三明治。我们已经成了莫逆之交，我们由过去谈到未来，谈到军心和士气，我们都认为，应尽早使本军团撤离的黎波里，否则长住下去，士兵的士气肯定会受影响。

首相和帝国参谋总长于2月3、4两日来的黎波里视察。我们为两位安排

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参加阅兵的单位有苏格兰步 51 师、新西兰步之师，以及若干装甲部队和勤务部队。当部队以严整的军容、整齐的步伐通过阅兵台时，丘吉尔触景生情深受感动。

他在训话里说道：“自从你们在阿拉曼获致辉煌的胜利以来，你们每晚设幕宿营一次，行程也就接近祖国一天。假如日后有人问你们，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做过些什么的话，你们只用说：‘我曾经和第 8 集团军一起行过军，就足够了。’”

到达的黎波里以后，我的首要工作便是打捞沉船，疏通海港，以便使舰船能够驶进港内，使每天卸载物资的吨位能够与日俱增。这是皇家海军的工作，而且非常艰巨。但对我们来说，完成的速度事关重大，我的工兵指挥官亲自出马和海军一起工作，我们竭尽一切人力、物力协助他们。在我们的全力支援下，海军很快便完成了这项工作，第一艘船于 2 月 3 日进港，第一批护航运补船队也于 2 月 9 日到达。我急于摆脱仅靠来自图卜鲁格和班加西的公路运输补给的状况，尽早解散“派特生”马车夫的补给体系，使第 8 集团军尽早从的黎波里基地获得所要的支援物资。

下一次苦战将在马雷斯防线展开，这是一道非常坚固的阵地，隆美尔的已逃脱的部队已在这里稳了脚跟，德军第 21 装甲师也进驻到临近防区之内，此时，隆美尔的身体状况不是最佳，他一点也不气馁，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决定，不管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只有在接到命令时才放弃对部队的指挥。”我认为，对此防线的攻略的最有利方式，便是迂回防线的西翼，直捣敌阵的背侧。我计划用新西兰步 2 师担任迂回运动。我在圣诞节以前、攻略奥吉拉阵地后就已经侦察过这一带阵地，就是说，马雷斯会战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近 3 十月了。

下一步，我们的行动是将敌人压迫回主阵地内，以便实施侦察。我们要确保班加西、福姆·塔达霍因和梅迪宁等重要道路中心、各横向道路以及梅迪宁附近的各飞机场。

在行动初期，我仅用装 7 师遂行确保道路中心和飞机场的任务。后来又增派了苏格兰步 51 师和另外一个战车旅。

到 2 月底，的黎波里港口的吞吐状况已大有起色，每天的卸载量已经达到 3500 吨。于是，我心上的沉重负担也就解除，“抛锚”在图卜鲁格和班加西地区的第 10 军也可以推进到的黎波里地区。

此时，法军的勒柯来克将军正率领一支小部队由中非赶来，参加我们的行列。他自动要求受我指挥，但唯一的要求是要我供应他给养、油料和被服。对于这位不远千里而来帮忙的卓越人物，我非常欢迎。他需要的一切我都如数照发。

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第 8 集团军应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统一指挥，以遂行突尼斯境内的作战，亚历山大调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司令，负责指挥盟军地面部队，泰德则被任命地中海战区同盟空军总司令。这个阵容相当强大，假如我们能在这场赌局中，将手里的牌漂漂亮亮打出去的话，则突尼斯作战定会稳操胜券。在突尼斯和马耳他方面的制空权加上现在就可以集中起来的第 8 集团军，以这些力量在突尼斯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绝对毫无问题。

坎宁安这时也调到泰德麾下出任战术空军指挥官，协助第 8 集团军作战的“沙漠空军”指挥官则由哈雷·布劳赫斯特继任。

亚历山大告诉我，当他到艾森豪威尔总部就职时，一切都是一塌糊涂。第：集团军团曾在南翼遭到德军的痛击，整个部队毫无生气，好像是一盘散沙，上无政策，下无计划。第一线的情况更加糟糕，既没有控制预备队，也没有开展军事训练，更谈不上“兵力集中”和“增援措施”。美军的素质令人大夫所望，他们无论在士气还是在体能方面，都非常脆弱，而且都是些极嫩的新兵。总之，一切都是往事重演：训练有欠充分，毫无实战经验，加上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何战斗力可言川他们也和我们过去一样，刚刚踏上战争考验的第一步。我们已经介入战争几历寒暑，回想当年，我们也曾犯过许多类似的错误，所以这种现象，也未可厚非。

亚历山大日以继夜地工作，想将一切纳入正轨。2月20日，他忽然向我发出求援的呼声，问我是否可以想办法减轻美军所受的压迫。我答应尽力而为，并表示假如我们两人能在适当的时候，对隆美尔施以夹击的话，一定会使隆美尔在两军之间，像只“水淋鸡”般地乱窜一阵。我的参谋人员常常称这次通信是“水淋鸡”信号。

在我的攻击和亚历山大的反击之下，隆美尔迫于两线作战的压力而不得不中止了他对美军的攻击。这使亚历山大获得了他所需要的时间，他于3月5日写信告诉我说，“病人”已经度过了危机，目前正在逐渐康复之中。但军事机体也和人一样，经过一场类似的大病之后，将永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美军经过这次教训，获得实战经验后，终能在以后的战斗中证明他们是第一流的部队。这种进步固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和我们比起来，却快多了。

隆美尔从第1集团军前线撤退后，我自忖下一步该轮到攻击了——事实果真如此。一发觉隆美尔向我运动，我便立即由的黎波里驰调新西兰步2师迎接他的攻击。当时我立足未稳，为响应亚历山大，我冒了相当的危险。假如这次在隆美尔手里受挫，将使我们对马雷斯防线的攻击准备工作陷于混乱。

3月5日晚，一切迹象显示，敌人必将于第二天早晨发起攻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果然不出所料，隆美尔在6日凌晨以3个装甲师的兵力，发起了我们所预料的攻击，但被我们逼迟，当天午后，他又卷土重来，依然未能得逞，我方战车毫无损失，全部伤亡人数不过130名。敌人则损失了52辆战车，其中7辆被我们的“薛曼”型战车击毁，45辆毁于步兵的战防炮人之下。

我这次的作战指导方式，基本相同于阿拉姆·哈法之役，我断定隆美尔的攻击，一定会在某种姿态之后，便计划在我所选定的地形上，予以迎头痛击。这次，我依然不理他的初期突进轻易出击。

当隆美尔撤退时，我也没有跟踪追击。激战结束后，我按照预定计划主动发起攻势。梅迪宁之战仅仅持续了一天。梅迪宁之战对于马雷斯会战的有利影响也跟阿拉姆·哈法对于阿拉曼会战一样。隆美尔在梅迪宁损失的52辆战车对他在马雷斯的作战行动可能会具有很大的价值。

马雷斯会战是在1943年3月20日至27日。

马雷斯防线，原是法军在突尼斯境内构筑的一道防御阵地，目的是为了防止可能来自的黎波里唐尼亚的意军侵略。

防线的天然地形非常险要，它东依地中海，西边依托重峦叠嶂的迈特马泰群山，从迈特马泰山往西则是一片难以穿越的沙海。德国人接管后，又对法国人修建的防御工事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扩大加厚了钢筋水泥掩体、安

装了大型武器装备，在济格扎奥于河和泽鸟斯于河之间修建了许多前哨阵地。而济格扎奥干河本身则变成了一道令人生畏的防坦克障碍，它的平均宽度为 60 英尺，高度为 8—20 英尺，有些地方的水流宽度为 30 英尺，深度为 8 英尺，为了加强这一天然障碍，德国人在这一地区埋设了 10 万颗反坦克地雷、7 万多颗杀伤地雷以及 19 英里长的铁丝网，他们还把河的两岸都劈成陡坡，看来，我们比较合适的突击路线就是这片防守较松的沙海了，但是法国人告诉我，任何通向这片沙海的迂回运动，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对这种坚固的既设阵地，仅凭正面攻击很难奏效，因为在迈特马泰与海岸之间，机动空间非常有限；所以我的攻击计划是必须向迈特马泰群山地区以西迂回运动——在有限度正面攻击约束下，发起迂回运动。

当时我面临的问题是，在“河海”里是不是可以找出一条出路？

早在 1942 年的 12 月，我就对此加以注意了，当时我就派出了一个“沙漠远程侦察组”对这一片沙漠加以侦察，大约 1943 年的 1 月底，侦察组向我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实施翼侧包围运动的隘口。

我的攻击计划便是本着这个著名的怀尔德隘口制订的：

a、第 30 军用 3 个师的兵力攻击防线东翼。这一攻击以海岸为依托，攻势将相当凶猛。这一攻击的目的是将敌人的预备队吸引到防线东翼。

b、以在其他单位加强下的新西兰步之师，绕过敌阵西翼，向迈特马泰山山区后方楔入。

c、将第 10 军和两个装甲师（装 1 和装 7）控制为预备队，准备相机投入任何一翼，这个军的待机位置，既能防护所有我之要害，同时还应据有一些地形要点。

d、全部作战将在空中打击部队全力支援下实施。

以新西兰步 2 师为基于编成的迂回部队，总兵力是 27000 人，战车 200 辆。这支部队于 3 月 18 日拂晓，在南翼秘密地完成集结。我们于 3 月 17 日夜间，在右翼方面发起强攻，以眩惑敌人，使之无法判定我之主攻方向。这些强攻作战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美中不足的是第 201 近卫旅闯进了一片在德军严密防护下的雷区，结果双方相遇，进行了一番自刃格斗厮杀。近卫第 6 营牺牲了 24 名军官 300 名士兵。近卫旅在那次夜间战斗中表现非常突出，而且对全局作战也立了一大功。

右翼方面第 30 军的攻击发起时间预定为 3 月 20 日午后 10 点 30 分，当我于 3 月 20 日清晨，发觉在我南翼方面隐匿待机的新西兰部队已被敌人发现后，便立即命令他们放弃任何隐蔽行动。立即北方冲击。

有关这次会战的详细经过，已被几位作家详细描写过，在此不再赘述。

至于我在这次会战中所运用的主要战术，则概可归纳为以下 6 点：

1、会战发初于我军右翼方面的猛击。

2、当这次重击打下之后，再从我军左翼发起有力的迂回运动。

3、右翼方面重击的初期战果，相当良好。我们使德军感受到在这方面的威胁非常严重，从而吸引了德军的预备队，德军投入预备队后的反攻火力非常强大，我们被迫后退，使我们在重击之初的收获得而复失。我们不得不回到后阵地，第 30 军军长李斯曾在 3 月 23 日清晨两点钟亲自跑到指挥所来，报告发起攻击至被迫后退的全部经过。当时李斯感到非常惶恐，我当即告诉他：没有关系，这正中我下怀；不过你却一定要将德军预备队缠在你正面才行。

4、右翼方面必须力战固守，必须保持适度的压力，以继续牵制德军预备队。同时要对敌阵地中央部分发起一次新的突击。用印军步4师突击迈特马泰山地。

5、从预备队抽出装：师加入新西兰师的迂回运动。

总之，我决心向攻势奏效的方面尽量投入多的精锐力量，我派何若克率领第10军司令部负责左钳攻势的指挥。当装1师和第10军司令部到达左翼以后，我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左翼方面开始闪击。

6、敌人发觉这种闪击行动后，曾试图从北翼方面抽出预备队前往南翼驰援，堵截我们的闪击。但是已为时过晚，鞭长莫及。左翼方面的闪击发起于装：师最后一辆战车到达后的20分钟，他们威风凛凛，横冲直撞，扫荡一切道路上的敌军部队和设施。

到3月28日上午9点钟，我们终于在历经力时一周的激战后，完全占领了有名的“马雷斯防线”。在会战接近尾声时，我们曾在右翼方面遭到敌人的猛扑，并一度陷入动摇，但是经“左钳”由敌后加以猛击后，便趋于稳定。

此次会战，致胜的关键在于自始至终我们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在任何战争中，假如把握下住这种关键，则决不可能取胜。在预备队的运用方面，敌人所犯的错误正像阿拉曼会战一样，是使用过早和分散使用。我们则一直是使用于狭窄正面上，形成了拳头，发挥了集中打击的效用。

这次会战的最显著特点是3月26日午后，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左翼闪击。闪击发起时间是午后4点，我们处于背向阳光的有利位置，老天作美，同时还刮起了一阵夹沙风暴，风向也是向着敌人。我们是占尽了天时地利，敌人预期我们会像往常一样在夜间发起攻击。殊不知，这次我们却在午后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我们在这次会战中攻击的作战构想其实很简单，主要致胜因素是奇袭。战术的运用是整个集团军协调一致的行动，是全体官兵不怕牺牲、勇于战斗精神的充分发挥。

空军在这次会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一共出动了“喷人式”战斗机、“小猫式”轰炸机和“飓风”式强击机达22个中队之多，随处打击炮兵射程以外的目标。打击每一辆出现在地面上的敌军车辆。空军飞行员们英勇的行动，使敌人闻风丧胆。在这次攻击中，我们一共捕获了2500名战俘（全是德军）：我们本身伤亡600名，空军也仅丧失了8名飞行员。

以第二次大战的整体水平而言，那次闪击可说是陆空军紧密协同的典型战例。当时在战术空军指挥部里，曾经为出动飞机支援而提心吊胆。坎宁安认为，如此紧密支援的战斗大冒险，他还特地派了一位军官前来，试图阻止在这种方式下运用空军部队。但是沙漠空军指挥官布劳赫斯特却决定冒险，他拒绝了战术空军指挥官代表的建议。会战成功后，布氏接到了来自突尼斯空军总部的许多贺电，甚至空军总部也向他驰电致贺！

在非洲的战争显然很快就要结束。

第8集团军下一步的任务是突过盖布斯峡谷，和美军会师。隆美尔的残兵败将已龟缩到一片更为局限的地区。

我们于4月6日在盖布斯以北的瓦狄·阿卡里东西线上苦战了一整天，并捕获了7000名战俘。4月8日，我们和由加夫萨东进的美军会师，现在，我们平均每天要捕获1000名左右的战俘，在这种兵员损失状况下，没有任何陆军还能够支持得很久，还能够保持很强的战斗力，我很欣慰地看到：隆美

尔大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4月14日，我们攻克了斯法克斯。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曾于2月到的黎波里访问过我，就第8军和第1集团军在盖布斯以北会师的时机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

我告诉他，我在4月15日可以挺进到斯法克斯。比德尔·史密斯当即表示，假如我果真能办得到，则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定会给我所要求的任何东西。我说，我正有所求，我希望能有一架专机。比德尔·史密斯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于4月1日清晨，电请艾森豪威尔拨给我一架飞机。4月16日，他拨给了我一架B—17型空中堡垒，这样我便成了个百分之百的机动将领。后来，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曾为这件事对我深表不满。他说：比德尔·史密斯只不过是和你开开玩笑而已。当你真正电请拨派专机时，艾森豪威尔为此“大力光火”。我向布鲁克说明，他那天在的黎波里说话的时候，毫无开玩笑的意思。我想比德尔·史密斯一定没有将我的意见转达给艾森豪威尔，所以艾森豪威尔在接到我电报的时候，自然会感到突然。布鲁克又说，假如我要专机的话，大可以由皇家空军拨派。他们自然是派得的，可是我虽然一再请求，他们却一直没有拨给我。而艾森豪威尔经我电请以后，则能立刻兑现，拨给我一架美国专机，让我乘用，同时也使我的参谋长享受了同样的待遇。艾森豪威尔真是了不起的慷慨人物，他不但能看出我们的要求，体谅我的难处，而且能立刻采取行动。

4月10日，我向亚历山大打了一个书面报告，表示应该尽早决定应由哪个集团军在突尼斯会战最后阶段中担任主攻。我建议由第1集团军担任。因为突尼斯以西的平原是极理想的装甲兵战场，而在我当面的，则是安非达卫和塔库茹那一带非常崎岖的山地。亚历山大同意了我的意见，并让我拨出1个装甲师和1个装甲团给第1集团军。至于我的任务，则是随时对当面的敌军保持压力，使敌人认为，我们的主攻将发起于第8集团军正面。

于是，我便着手制定作战计划，并于4月19至20日，对安非达卫敌阵实施了一次夜间攻击。险峻的塔库茹那山地，非常不容易进入，但我们还是推进了3英里左右。那次夜间攻击之后，我便将部队重新编组，并且开始计划一个礼拜以后的另一次攻击。对这几次攻击的经过和成果，我感到并不理想。我认为：主攻确实应该发起于第1集团军正面，因为第1集团军当面的地形不像我这个正面的如此多山，大可以放开手，运用装甲部队。

但是，第1集团军对突尼斯突破作战的初期试探却未见效。第1集团军以3个师的兵力并列攻击。每个师在6英里宽的正面上，又并列地摆上了所有的3个旅，这种赶鸭子式的攻击，何谈有效？第9军则以两个装甲师的兵力，试图在其他方面突破，当时，我正因扁桃腺发炎和重感冒卧病在床，于是便向亚历山大请示，是否能到我司令部来和我谈谈。他于4月30日来到苏斯。我向他建议，必须将第1和第8两个军团重新编组，对突尼斯的攻势才能在适当的地区，彻底发挥最大的威力。

我建议：由我将装7师、印军步4师、第201近卫旅，以及若干独立炮兵部队，拨交第1集团军，同时从我这里选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军长，负责这次攻击，我觉得何若克是最理想的人选。

最后，我提醒他，我们必须迅速结束在非洲的这场战争。因为我们已经预定在7月间发起对西西里的入侵作战，而在实施那种非常艰巨的联合作战

以前，肯定需要极为周密、为期较长的准备工作，亚历山大对我所建议的一切，当即表示全部同意。

何若克调到第1集团军后，便于5月6日对突尼斯发起了攻击。他选定要点，集中强大的兵力，在突尼斯以西地区，一举突破了敌军阵地。北塞大和突尼斯于5月7日同时陷落，残敌则纷纷向崩角半岛溃窜。

第一支进入突尼斯的部队是装7师。到5月12日，有组织的敌人抵抗全部停止，我们捕获的战俘约28.8万人。

非洲战争终告结束。对德军，这是场片甲不存、全军覆没的惨败，他们所有的部队、仓库、堆栈、重兵器和装备器材等全被我们缴获。从纯军事角度来看，“马雷斯防线”被突破后，德军就毫无可能在北非继续固守下去。我想，这可能是希特勒基于某些政治原因，而下令负隅顽抗的。

第8集团军对北非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有着不朽的贡献。我们曾将隆美尔及其大军赶出了埃及、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唐尼亚，然后，我们又帮助第1集团军，在突尼斯给轴心国军队以最后的一击。所有这些，只有像第8集团军这种第一流的部队才能办得到。有时我会很自豪地想，能够指挥这样的部队，所向披靡、连战皆捷，不仅是种荣誉，还是一种享受。

首相于6月初，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突尼斯全部敌军的被歼和24.8万敌军的投降，已成为我们在北非作战的最后一页，从西北非登陆战役开始，到阿拉曼会战的胜利，到现在的大获全胜，真让人感到无比辉煌、无比自豪。望再接再厉，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绩。

温斯顿·S·丘吉尔

1943年6月3日呈阿尔及尔

在结束这一章以前，我想就某些促成这场辉煌战役胜利的集腋成裘的事实加以分析检讨。由阿拉曼到突尼斯，差不多有2000英里，而我们竟能在3个月内挺进到的黎波里，在6个月内攻下突尼斯，原因何在？

第一，全军将士均能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全力以赴。我曾在1942年8月告诉他们，我将领导他们向胜利之途迈进，在我的军团里，不能有沮丧的意念，不能有失败的气氛。他们都已准备好，都在警觉地待命；只要我一声令下，便能得到最强有力的响应和支持。我们一战又一战地胜利，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事实，使第8集团军官兵对胜利抱有极大的信心，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官兵们逐渐意识到，他们这支部队是所向无敌的。到战役结束时，我相信他们绝对肯做我所要求的任何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部队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关怀着这个部队的成败荣辱。他们给我的是毫不保留的信心。试问，除了部属们的信心以外，一个指挥官还能需要些什么？这时，我只有一种心情，我一直努力提醒自己，千万不能使这群卓越的剽悍之上失败。

其次，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参谋长。我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戴君干其人，在他那肥沃的脑海里充满着无穷的智慧，他没有被任何问题难倒过。从我这里得到计划的大概后，便立即组织细节的设想、推演和计划。然后再迅速报告给我，从参谋的角度看，这项计划是否可行；假如不行，应该怎样？他会毫不迟疑地负起责任，因此我才肯授于他全权。假如一时无法和我碰头，他也能自行决策，而我对此类决策也从不过问。对于他我是完全信赖；他似乎总能体会到我的想法与做法，而且下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没有出过错。

有这么一位精明能干的参谋长，自然我就用不着操心细节问题了，我把

全副精力都集中到下一步该怎么计划，怎么打上去了。

在戴君于的督导下，第8集团军的参谋单位逐渐蔚成一种卓越的幕僚组合，我一直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的虔诚信徒，因为唯有青年人才有追随领袖人物的乐观心情、纯朴思想和坚定意志。我们的参谋人员便属于青年。他们很多都不是职业军人，作为我的参谋人员的唯一条件，便是具有相当学识，能够轻松、愉快地处理日常事务，至于是职业军官还是战时报效祖国的临时性军人，都是次要的。

我初到沙漠时，他们已是久历战阵的老兵，但他们却能接受我这个沙漠新手的领导，能每天丁眠地贯彻我的计划和意志，是戴君于将他们铸合成为一个尽忠职守的整体。

随着战役的发展，我还逐渐领悟到情报的价值。比勒·威廉士是我的重要灵感源泉，他具有超出于我个人以及我参谋人员中任何人之上的绝顶智慧，但是他大智若愚，从不显露锋芒，他能深刻而具体地洞察全盘敌情，他能由千头万绪的情报资料中，推论出正确的答案。他对我工作方式的了解与日俱增；他能在10分钟内使我知道我所想知道的一切而绝无我不想知道的。指挥官和他的情报主官之间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后，就不应该分离。他是全第8集团军所公认的优秀情报主官，他之所以如此深享厚望，说不定与他所戴的帽徽不无关系——他戴的是“国王龙骑近卫兵团”的帽徽，而不是情报军官的标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最优秀的情报军官，全都是文人，他们似乎天生就有担任那种工作的聪明头脑，再加上“征候法则”的磨练和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的运用，所以都能成为幕僚将校中的佼佼者，而比勒·威廉士则又是其中尤其优秀者。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在这一加以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个人指挥体系——我如何从位于战斗地区相当前方的“战术指挥所”里，从事作战指挥的问题。我在非洲战场上对司令部的设置进行了次彻底的改革，我将自己的司令部区分为三个梯次：战术指挥所；主司令部；后方司令部。

“战术指挥所”是我个人从事战斗指挥和掌握部队行动的所在。这是个相当小巧紧凑、具有最高效率、完全机动化的指挥机关。主要成员有通信人员、密码官、联络参谋。警卫部队、以及为确切把握战况所需要的极少数作战参谋人员。

“主司令部”是全集团军首脑机关的组织核心，我在“战术指挥所”向下级指挥官下达口头命令，所有这些命令的细节参谋作业则在“主司令部”和“后方司令部”实施。参谋长和高级行政军官都住在“主司令部”里。但是高级行政军官必须派一员非常得力的副手常驻“后方司令部”。

“后方司令部”是集团军首脑机关的行政支援中枢。司令部里区分有“行政”和“经理”两大处，以及各种勤务科组。

随着作战的进展，我们渐渐变得非常熟练于这种形态首脑机构的发展与运用，以致后来我离开第8集团军时，又将这种制度带到了第23集团军群总部。这种制度，固然极适于军团以上高层司令部的编组，但在军这一级建制里又很不相宜，因为，军长必须在他的“主司令部”全部机构的环伺之下，才能遂行战术行动的指挥和掌握。

集团军司令官只有在“战术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假如一个身为集团军司令官的将领不具备在“战术指挥部”里应有的气质，那么，他也决不会是位优秀的集团军指挥官。

最后一点是战时常听到各种意见，诸如我应该怎样指挥这次作战啦，我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啦等等。我想我的前任们肯定早已养成了这种风气，他们对这类建议很可能一一采纳。

大约在 1942 年 10 月中旬前后，我给帝国参谋总长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当职分析为将者用兵问题之际，对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感到非常不可理解，这种现象就是僚属或其他人士，动辄试图撼惑为将者某一措施之信心，而认为力将者所拟就之计划有欠完整，动辄向为将者提出‘如此’、‘这般’之建议，若职果能‘从谏如流’，则早已弃甲曳兵于阿拉曼地区矣！”

我在非洲战役所学到的教训之一，便是指挥百的决心处置关系非常重要。身为指挥官，必须能当机立断，在决心最重要做些什么以后，能立刻采取行动。对于那些未能洞察全局而又无责任的人们的建议，决不可毫无主见地言听计从。

亚历山大是我自始至终最了不起的支持者。他从下找我麻烦，从不打我官腔，也从不建议我应当怎样做；对于我所要求的一切，他一概立刻照办——当我说明为什么需要某些东西或行动时，他总是耐心地倾听，但是，以他的经验学识和地位而言，他根本无需什么解释或说明，他对我始终推心置腹。

童年时，我就懂得自信自立之道。后来我在沙漠战役里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修养，历经多年的磨练后，我还深刻地领会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

第六章 在亚平宁半岛上

计划越多败得越惨

加拿大师从未上过战场

“盟友”变敌手，德军解除了意军的武装

盟军，在意大利到处乱闯的无头苍蝇

1943年1月，我们接到命令：一俟非洲的轴心势力被肃清，便立即展开彻底击溃意大利的作战，第一步，攻占西西里，行动代号为“强壮作战”。

这是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会后，1月23日，联合参谋委员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强壮”作战行动的最高统帅，亚历山大为副统帅，海军上将坎宁安为海军部队指挥官，特德为空军部队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受命成立一个特别参谋部（有自己的参谋长）来计划和准备这次作战行动。亚历山大被任命为地面作战总指挥官。这导致2月12日在阿尔及尔成立一个以盖尔德纳少将为协调员的中央计划机构。2月11日，艾森豪威尔任命了他属下的几个指挥官，两天后联合参谋委员会同意了这些任命。地面部队指挥官为：我领导东部特遣部队，最初称为545特遣部队，实际上就是第8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第13和30军；巴顿领导西—99—部特遣部队即第343特遣部队，包括美国的第2军（由奥马尔·布莱德雷指挥），该军最后升级为美国第7集团军。这两支特遣部队将在亚历山大司令部的指挥下作战，该司令部在这次战役的计划阶段称为第141部队，后来则简单地把所辖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加在一起，称为第15集团军群。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人名字和日期，那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虽然所任命的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但“强壮”作战计划从一开始就被耽误了。当时非洲的作战正处于最后的关键阶段，像亚历山大（他领导着第18集团军群）、我（领导着第8集团军）、巴顿（他领导着美国的第2军）、布莱德雷（巴顿的副手）、特德（他担负着许多责任）等都将全部精力用于正在进行着的战争上去了。因此，下一个战役的计划工作不得下委托给代理的参谋人员去做。这些参谋人员都有职无权；因为在英国的军事系统中，这种权力只有担任指挥官职务的人才具有。而美军的制度与英军不同，一个代理指挥官职务的参谋军官即具有指挥官的权力。但是在制定一个战役计划时，即将指挥这个战役的人通常必需在尽可能早的阶段参与计划的制定工作，否则，战场指挥官可能会坚决要求对计划作某些或大或小的改变，从而把一个周密制定的计划马上给打乱了。这就是“强壮”作战行动计划将要碰到的事。下面当我们考查进攻西北欧的“霸王”作战行动计划时，我们也能看出，事情也是循着类似的、几乎不可避免的规律发展。这是因为一流的最高级作战指挥官为数很少，很可能当你需要他们来指挥下一个战役的时候，他们还忙于上一个战役的收尾工作呢。

造成耽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即将在第8集团军的编成内在西西里作战的各个师必须从各地调来：加拿大第1师自英格兰，第51高地师自突尼斯，第78师自突尼斯，第1空降师自突尼斯，第7装甲师自黎波里，第5师自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第步兵旅自埃及经马耳他。此外，最高统帅部、最高级作战指挥官、各兄弟军种和各行政勤务中心都分散在非洲海岸各地：阿尔及尔、突尼斯北部战线、开罗、马耳他、斯法克斯、苏塞。不言而喻，由于部队如此分散，即使拥有现代通讯手段，也不可能把它们很好地结合成

一个整体，也不可能很好地协调已经议定的计划。

还必须指出，准备参加“强壮”作战行动的有关人员尽管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但对于这种作战都很不熟悉。他们正在准备进行的战役乃是自的黎波里战役以来的第一次将遭到抵抗的两栖作战。需要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比如，美国水陆两用卡车在紧急关头到达，就对在开阔的海滩上卸载物资产生了巨大影响。登陆艇的驾驶员为了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登陆艇必需进行紧张的训练（驻英国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为他们的训练进行了周密的准备）。空降部队的使用必须仔细计划，拖曳飞机和伞兵搭载机的驾驶员必须提高技术熟练程度，因为这类飞机的大多数驾驶员平常都是执行其他方面的任务（下面我们将看到，由于疏忽了这个重要问题而导致悲剧发生）。所有上述问题美军也同样具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例如，还有极其重要的情报问题。情报问题的核心是：西西里岛上究竟有多少德军，都是什么兵种？这是一个困难的新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系到战役的成败。在陆上战役中，通过前线巡逻、捕俘以及其他可以得到的情报，通常都能够对敌人的实力和部署作出概略的估计。现在，与敌人接触不上，而“无人区”则是大海。但是特德正在组织广泛的、持续的空中侦察活动，因此可以通过航空照片对这个岛屿的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调查。这个岛的大约 100 英里的海岸线也必须加以仔细调查，以确定哪些海滩适宜登陆，哪些不适宜。调查表明适宜登陆的海滩一共有 36 个（其中 26 个实际已使用过）。但是据认为，只有两个海滩具有切必要的设施。因此，计划人员主要考虑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夺取一个或几个港口以及如何实施有效的空中掩护。他们设计出了一些获取情报的巧妙方法，例如，发明了一个确定海滩坡度的数学公式。根据航空照片计算一定风力条件下的两个浪峰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算出海滩的坡度。而仔细检查开罗电信中心发给 70 万意大利战俘的邮件则大大地有助于了解敌人的战斗序列。

我的第 545 特遣队的参谋部于 2 月 22 日在开罗开始工作（巴顿特遣队的参谋部则晚一天在拉巴特开始工作）。邓普塞少将被选拔来领导这一参谋部。邓普塞本来是从英格兰调来接管编余的第 13 军司令部的。该军所属各师在班加西分配给其它部队，而军司令部保留了下来。现在，第 13 军司令部已不再是一个编余部队了，它已经和第 30 军一起组成了亚历山大在西西里集团军群的英国部队。邓普塞后来曾指挥英国的第 2 集团军从诺曼底一直打到德国，他长期站在我一边，是我器重的人。他稳重、能干。忠诚，但不搞英雄崇拜，是我的一个令人钦佩的配角。因此，第 8 集团军的最初阶段的“赫斯基”行动作战计划是由邓普塞负责制订的。他负责这项工作直到 4 月中旬戴君干摆脱了西部战场的事务而到开罗来接管他的参谋长职务时为止。

其实，早在 1941 年，英军就认真研究过能不能在强大的“十字军”进攻作战中扩张战果时进攻西西里，结论是不能。然后，1942 年 11 月，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进攻西西里的概要计划，因此，当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被任命为总司令时，他同时还接到了“一个陈述了各种考虑的备忘录以及构成这次研究的基础的作战概要计划……。”当时有关的高级军官都全神贯注于作战。艾森豪威尔对这个作战概要计划未充分进行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供有关各方进行讨论的一个临时蓝图。由于当时情况十分紧迫（丘吉尔当时急于在 6 月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才不得不采取行动，但这

却引起了很大混乱。结果“强壮”战役计划成为有两支盟国军队参加的大规模两栖战役计划工作的下好的例子。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原始计划可以叫做“港口—机场计划”。它是建立在一些后来被证明为错误的假定之上的，只消看一下西西里地图就能看到三个港口区域，东北面海峡处的墨西拿——由于大靠近意大利本土以及不可能得到空中掩护，不能作为进攻的目标；东南面的锡拉库萨—卡特尼亚—奥古斯塔港口区；西北面的巴勒莫，这几个港口的日进口量如下：墨西拿港，4000—5000吨；锡拉库萨港，1000吨；卡特尼亚港，1500吨；巴勒莫港，2500吨。该计划要求美军夺取巴勒莫，我夺取锡拉库萨。空中优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除了使用盟国机场所提供的大量航空兵外，还准备夺取岛上的几个主要机场。总起来说，这个原始计划意味着：英国的三个师将分别沿着100英里的海岸登陆，而美军则在英军西面60英里远的地方登陆，然后，在进攻开始后两天，美军将再次在岛的西北面登陆以夺取巴勒莫，而英军则再次在140英里以外的卡特尼亚登陆。作为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和美国的空降部队将在不同的机场空降。

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的一个严重缺点是兵力十分分散。亚历山大曾建议对此计划作一些小而重要的改动：除非十分必要，不要分散使用各师；用伞兵夺取海滩而不是夺取机场。这个计划实际上已在3月13日由艾森豪威尔原则批准，但被我否决。4月18日，我给亚历山大发了下述电报，“我认为伦敦制定的这个计划背离了实际作战的一切常识性规则，完全是理论性的。它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应当重新制定。”此后，我就动手来制定新的计划。从这时起到计划制定出来和最后被接受为止，连续进行了许多曲折复杂的辩论。辩论双方的发言人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但关键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成功地夺取包括卡特尼亚—锡拉库萨—奥古斯塔这几个港口在内的西西里岛的东南角，并且只有适当集中兵力才能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当然，如果放弃夺取其他港口和机场的计划，那也是错误的。最后，到4月初的时候，形势又变得似乎可以采取某种妥协方案，如果英国能再提供一个师的兵力连同必要的运输船只的话。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喜剧性插曲。4月13日，副首相艾德礼先生给丘吉尔写了这样一个备忘录：“……我们有没有具有指挥头脑和控制意志的人在直接控制着那些联合作战的计划者们，难道不应当由某一位强有力的、下讲情面的人来引导他们审议重要的问题吗？”艾德礼的这段话最好不过地描述了我当时的工作，但是，我的举动触怒了敏感美国人，3月23日，我曾宣称：“本集团军指挥官打算用第8集团军的名称和声望来影响这次作战，因此打算尽可能使用第8集团军的名称，而下使用东部特遣队的名称。”

4月19日，我乘最近才弄到手的那架空中堡垒飞机飞到了阿尔及尔，在29日的会议上，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体意思为：

1、第8集团军的主要行动日程如下：

4月27日：完成军口后勤保障计划，并下发。

5月15日：头三批船的吨位分配量送呈总部。

5月17日：下级部队上报部队装载计划。

5月22日：综合计划送呈总部。

6月1日：开始航船装载。

2、以下各点必须了解。

(a) 我本人和司令部的参谋们对这次作战的有关情况所知极为有限，对于眼下正在进行中的更是毫无所知。

(b) 预定参加“强壮”作战的下列各部队，现在正在突尼斯作战：

集团军司令部。

第 30 军司令部。

三个整的师。

各种军团和军直属部队。

(c) 负责这次作战的军团司令部人员，对眼下正在进行的行动完全处于暗中摸索阶段。

(d) 负责详细计划作为的参谋们，对各种战役需求考虑不同。

(e) 没有一个真正能体会到战役可能进行状况的高级指挥官，倾注全力于“强壮计划”的准备工作。

3、假如我们再如此下去，后果将难以预料，作战的准备工作必须予以严格的掌握和控制。

4、问题症结是。

(a) 现在就把需要参加“强壮计划”的第 8 集团军司令部和所有的部队由突尼西亚战场撤出。

(b) 假如这样的话，我们是否有把握及时结束突尼斯的战争，使“强壮作战”能够按时发起呢？

5、可能需要采取某种折衷办法来摆脱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

6、以下是折衷的、必须立刻准备好的最低条件：

(a) 在第 8 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里应增加参谋长一名，军衔应该是代理少将级。

(b) 这位参谋长将是我派驻开罗的代表，有了适当的衔级他才能有推动一切的份量，我个人将掌握住一切准备工作的进行。

(c) 我将斟酌派遣我所认为必要的参谋人员在汗罗长驻或暂驻，我将决定怎样抽调派遣才不至于影响到突尼斯的战局。

(d) 以下部队，必须立即撤出突尼斯战场，以便立即着手“强壮作战”的准备工作：

第 30 军司令部。

步兵第 50 师全部。

步兵第 51 师全部。

(e) 我本人要早作开罗之行，看看一切是否能顺利进行；尔后，我将根据需要往来于开罗和突尼斯之间。

(f) 新西兰师不应参加初期作战，因为这个师的兵员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相当时日。

(g) 应使步兵 56 师参加突尼斯的作战。我决下在“强壮作战”里运用任何没有实战经验的部队，现在埃及的步兵 56 师的步兵旅群应加入步兵 50 师，以使步兵 50 师成为一十三旅制的师。

(h) 步 78 师应控制为我的预备师，这个师应在 5 月撤离突尼斯战场。

7、第 8 集团军司令部迟早必须撤离突尼斯。撤离的时机将不得迟于 5 月初。到那个时候，我建议责成第 10 军军部负责第 8 集团军留置单位的指挥，而以之改隶第 1 集团军。

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对于我所提出的全部建议均表示同意，并电请陆

军部，正式下令戴君干为第8集团军少将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忠诚于共国的事业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利益的人，他采纳我的意见显示了他的高明之处，因为正如阿瑟·布赖恩待爵士所指出的，进攻西西里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战役，甚至“火炬”战役也不能与之相比。这一战役要“在包括8艘战列舰和2艘航空母舰在内的1200艘军舰的护送下，用2000多艘船只运输16万人的部队，1800门炮，600辆坦克和1400辆其他车辆。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通过布有大量水雷并由潜水艇、强大舰队和从海岸机场起飞的德意空军飞机护卫着的海面，去攻占开阔的海滩和征服一个由两倍于盟军的一支敌军部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国人）守卫着的岛屿。”实际上，意大利的舰队不能算作一个威胁。至于敌人的空中威胁，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估价：人们在计划制订期间所谈到的种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德军已用他所部署的4000多架飞机压制了机场，而岛上的敌人机场，在7月10日那天，只有两个在活动，岛上百分之五十的敌空军部队已经逃跑了。需要对付的是敌人的地面部队。在7月初，岛上有20万意军（其中一半是4个正规师，另一半是海岸防御部队）和32000名德军（不包括德国空军技术人员）。这些德国人中，15500人是赫尔曼·戈林师的，16000人是第15装甲师，这两个新成立的师都是以著名的非洲师的名字命名的。我的反对一切认为西西里的防御部队不堪一击的说法是十分正确的。我在4月24日给亚历山大的电报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观点。（见下文）

事实也证实了这一预见。7月13日，希特勒决定再迅速赶调两个师到西西里，另外再加上一个由赫布将军领导的军司令部。赫布是由俄国调来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装甲军军长。此外，墨西拿海峡的控制和防御已经完全“德国化”。并且随着战斗的发展，德国人接管了作战指挥，特别重要的是，接管了敌军撤离西西里岛的指挥。德军南线总司令凯赛林早于6月底就来到了西西里，并把他的观点强加给了意大利地区指挥官古佐尼。结果，我在东南部就面临着由那不勒斯师和里窝那师组成的第16军、若干较小部队、赫尔曼装甲师以及第15装甲师的一个步兵群（该师的装甲部队扼守着更西面的地方）。而且这支部队很可能还要增多，而不会减少。

我于4月23日飞往开罗。途中，我一直在思考。格莱斯特一等兵曾用“同胞兄弟”来形容第8集团军。他说得很对：我们确实是一支“武装的弟兄”。我们作风相同、服装相同，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也全都是最后的成功，全都是如何以最小的伤亡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我是这群弟兄之首。错误——尤其是人命关天的错误，最令我冒火；我决不能坐视任何和基本计划“离题”的行为。但对下级部队有关细节的处置则从不干预，对于细枝末节的错误也能宽容。在突过盖布斯山隘，进入突尼斯平原以前，我们所打的，纯粹是第8集团军自己的仗；我们是自己策定计划，能自行调整时空因素，使之能适应战局的发展。亚历山大能放手让我随心所欲地打“自己的仗”，能给我以全力支援；我们回报给他的则是所向披靡的成功，对于我们的行动，他成得下手，也放得下心。

但是，我们现在已由自己的小天地汇入了北非作战盟军的主流。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调整本身的作风，使之能适应全局战争的环境与要求，这也正是一般所谓的“折衷”。第8集团军现在要由海军带到苍茫的大海里，学习如何在欧陆的局限地区里战斗。我们所深知的沙漠、我们所征服的瀚海，这时都要一古脑儿抛到一边去。我们都知道，第二战场的开辟，横渡海峡的壮

举，已经如在弦之箭。西西里之役说不定正是这种未雨绸缪的预演，是种为准备 1944 年的行将来临的恶战的前奏。

我如此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我们曾在沙漠里所享受的“自由”已成为过眼云烟。我们将不得不学习如何和别人共事，并且，为了整体利益将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有一点我绝不松口，就是绝不容许第 8 集团军在一种拙劣计划的驱使下，随随便便地投入战斗，绝下许将官兵们宝贵的生命，虚掷于暴虎冯河式的冒险勾当。我已经统率这个集团军，在非洲转战两千多英里，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我曾向他们承诺，今后决不会再遭到任何挫折与失败。在杀向西西里之前，我还将遍访麾下各师，我要亲口告诉士兵们，我对这次出征是如何地具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飞向开罗的途中，我把前 7 个计划的大概重新过了一遍，从这些计划里，我已渐渐看清楚了未来局势演变的端倪。

显而易见，前面遍布暗礁，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摸索着走过去，决不能像在沙漠里那样再横冲直撞。我们必须保住我们的幽默感，要特别留心，切不可被入戴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切忌犯“小肚于疼”抗命违纪的毛病。不过，在涉及重大问题时，我绝不妥协。

戴君干在机场迎接我。第二天，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简单汇报会，就亚历山大总部最后建议给艾森豪威尔的入侵西西里计划加以详细说明。这个计划可以称之为“第八号计划”。负责将第 8 集团军运送到西西里登陆的海军指挥官是蓝姆塞将军。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当他在多维尔任军区司令的时候，我就结识了他。当时，我是东南军区司令官。后来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我们又再度共事，他不幸于 1945 年初在法国因飞机失事殒命。

我静听着“第八号计划”的说明简报，很快，我便断定这个计划也用不得。按计划，第 8 集团军的登陆地区，是由西西里岛东南塞拉库斯南侧一点，向南绕过拔奇诺半岛，然后再向西，一直延伸到基拉丁带宽广弧形地带。美第 7 集团军则预定在最东北角的特拉巴尼南北一线登陆。像这样兵力高度分散的突击部署，显然是基十敌人的抵抗极为微弱的判断。事后，我就这项计划和柏提·蓝姆塞以及将要以我所属军长姿态出征西西里的李斯和邓普塞三人讨论了一番。

我决定发十电报给亚历山大，表示我不能接受那个为第 8 集团军所拟定的登陆计划，而且我已经自行拟定了一个新计划，使整个集团军可以在一片较合适的地区登陆。这片地区将仅仅包括北起塞拉库斯，向南绕过拔奇诺半岛一带较狭窄的地区。

这便是“第九号计划”，也是我的幕僚们所刁你的“复活节计划”。因为计划完成的时候，恰好赶上复活节的周末。这是第 8 集团军最后同意的一个西西里登陆计划。我于 4 月 24 日给亚历山大拍了一个电报：

1、职已偕同所属军长到达开罗，且已就第 8 集团军入侵西两里作战问题，作了研究分析，兹谨将所研究各点陈述如下：

2、因职未能早期专注此问题，已使此间之一切工作深受影响。

3、截止目前为止的一切计划均立足于敌军抵抗极弱之假设，此诚一大错。盖德意两军在突尼西里之作战表现均为良好，其在西西里之作战，亦将下弱。倘我们基于错误假定而放松对进攻计划的制定要求，粗枝大叶，下求精细，则必将招致无穷后患。职以为必须着眼于德军顽强抵抗而策定计划，必须预期突击登陆后，将面临一场硬仗。

4、职已有带领第 8 集团军出征西西里之一切准备。眼下所有求于钧座者，厥唯准由本部自行策定的作战计划。本部之作战，首先着眼于各军师间紧密协同。职以为确保第 8 集团军之初期行动目标，应指向于塞拉库斯与拔奇诺半岛间地区，尔后则以飞机场与港口为主。首要问题为需选定一适当地区，建立尔后作战行动之坚强基地：

5、时机已刻不容缓。倘伦敦与华盛顿问长此争执不决，则将不可能于 7 月间发起作战。

6、职已对所属下达命令，第 8 集团军之计划作为与一切有关战备之作业，均以前第四节所略陈者为据。

7、蓝姆塞将军已经与职完全获致协议，职等二人将力图战备工作之万全，且均具有争取战胜之信念。

8、职以为空中支援之密切与否，关系此次作战之成败至巨，是以，职必须获得“沙漠空军”之紧密协同支援，必须能与布劳赫斯特携手并肩作战。

9、以上所陈方案，乃在当前人力物力状况下处理第 8 集团军问题之唯一可行途径。恭请鉴核。

由电文内容不难看出，我为第 8 集团军所制定的计划是将本集团军和在西西里岛西北角登陆的美军隔离得很远，同时，也没有部队登陆基拉湾，以夺取那个地方的飞机场。对于美军的登陆行动，我另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使他们向前推进的时机似乎还丁成熟。电报发出之后，我便静候阿尔及尔方面“碍难照准”的复电，最后，果下出我之所料！

第二天——也就是 4 月 25 日，蓝姆塞挨了坎宁安上将一顿狠批。当时，坎宁安是同盟海军总司令，他正和亚历山大在阿尔及尔一同工作，蓝姆塞被那封申斥的电令弄得啼笑皆非。他认为，我应该发个电报给亚历山大加以解释，我便给亚历山大将军发了一封电报：

据说坎宁安与泰德曾到你那里讲过，说他们对我拟定的第 8 集团军突击西西里之计划表示坚决反对。我感到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如果我们将现计划贸然付诸实施，必会招致惨败，我将不顾毁誉，再次冒犯阁下，我与蓝姆塞将军所拟定的计划，肯定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如果您认为有必要，那么，我将携同蓝姆塞将军前来，当面陈述。另，因时间紧迫，此间正按我的计划开展准备工作。

电报发出后，我便于 4 月 26 日离开开罗，回到突尼斯机场我的司令部。一下飞机，我就突然发高烧、感冒和扁桃腺发炎。

同时亚历山大预定 4 月 29 日在阿尔及尔召集一次会议，我和蓝姆塞二人全部奉命出席。我因为卧病在床，便电召在开罗的戴君干，让他代我出席会议。谁知祸不单行，戴君干专机因故障迫降在艾勒·阿堆姆。他因脑震荡被送进了医院。于是，我又电召奥里弗·李斯代我前往出席。

那次会议毫无结果。泰德表示，假如不将柯未索和基拉两处飞机场包括在初期滩头阵地线以内，则他的空军将无法遂行有效的作战。紧跟着，坎宁安也表示除非空军骗走敌人的飞机，否则，海军的护航船也无法行动。身为会议主席的亚历山大在左右两难的情况下，竟无法促成军种间的协议。于是，这次会议便毫无结果的散掉。

我曾电告亚历山大表示，我急于要见他，商量如何迅速结束突尼斯战事，以便早日着手西西里战役的作战计划的作为。他于 4 月 30 日来集团军看我的时候，我仍卧病在床。那天，我们曾谈到如何应付突境的战事，他将头一天

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于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设法解决问题才行，我建议5月2日再在阿尔及尔召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到那时，我一定要飞到阿尔及尔，在会议里亲自报告我要解决的问题。亚历山大同意了 my 建议。

我于5月2日到达阿尔及尔，但亚历山大却到不了那里。当天的浓雾使他无法起飞，我建议不必等他，我们可以自行举行会议，可是坎宁安和泰德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样做对亚历山大确实下大好。

于是，我便去找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他下在办公室，最后，我在厕所里找到了他，我们便在厕所里面，就地商量这件大事。他说，鉴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促进问题的解决。我说，鉴于军事方面的原因重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所以，非如此做不可，而且事关重大，决不能再等待下去。我还告诉他，我可以立即给他提出问题的答案。他说，愿闻其详。我说，美军在巴勒莫附近的登陆应该停止实施，全部美军力量应集中发挥在南海岸，将目标指向基拉东西线及拔奇诺半岛以西地区，以夺取我们空军所认为势在必得的各飞机场。唯有如此，第8集团军和美军第7集团军才能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整个入侵行动才能紧密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比德尔·史密斯听我说完后表示，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谈到这里，我们便离开了厕所。他立即去请示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也非常感兴趣，但就是不肯在亚历山大缺席的情况下，举行分析讨论会。空军赞成这个计划。海军对此略表怀疑，他们怀疑在海滩上的美军，是否能毫无间断地获得所要的补给支援。因为，在他们的突击登陆正面上，或者是附近地区。根本没有什么良港。

接着我又怂恿比德尔·史密斯，让他主持一次会议。我说他可以召集一次参谋会议，我可以列席。当亚历山大第二天到达时，参谋人员可以将一个已达成一致的计划呈给他和他的搭档总司令。

他按我的意思又召集了一次会议。我在会议上说明了我的见解，并且获得了每个与会参谋人员的同意。这样，我就将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长拖到了我这一边。不过，艾森豪威尔却还要等到亚历山大和其他军种总司令将这项计划向他提出之后，才肯作最后裁决。以下便是那天我在总部参谋会上的发言记录：

1、我知道在很多人心目中，我是个令人讨厌的罗嗦人物，大家这种想法一点也不错。我自己虽然也曾想尽了办法，不要这样罗嗦得令人讨厌。不过，因为我在这次大战中曾亲眼目睹过太多的错误和大多数的悲剧，所以才如此挺身而出，才想尽办法不使这些错误和悲剧重演；我之所以惹人讨厌，其道理也正在此。假如我们在西西里方面再遭到一次悲剧性的打击，则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2、目前我们在攻略西西里的计划制定方面，已经到了一种非常严峻的阶段。除非在最近几天之内作出决定，否则，能否在7月间发起攻击将是个问题。

我身为西西里登陆的军团司令官，今天很想能利用这个机会，将我所考虑到的问题给各位做个扼要说明。

3、这个问题有三点：

(a) 西西里的攻略，完全要靠地面部队的有效作战。

(b) 这些地面部队必须要靠海军才能到达那里。到了那里之后，还要靠

海军的支援才能够立足。

(c) 非得空军的支援，这两件事才行得通。要想空军支援，则又非得迅速夺取一些合适的飞机场，以使空军飞行部队向前推进不可。

4、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敌人的抵抗将非常顽强，这次行动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必须准备好一场真刀真枪的厮杀。

最要紧的是切忌分散地面部队的实力，兵力分散必将招致惨败。地面部队必须要完整、紧凑，每个军每个师彼此一定要布置在能相互支援的距离之内。

5、我们还得考虑应该用什么方法把地面部队送上岸去，地面部队的作战才能顺利展开，才能生存立足。

所选定的登陆地区，必须要位于空军战斗机的掩护范围以内，我们必须迅速攻占一处良好的港口，必须要替空军迅速夺取一些良好的飞机场。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假如你们能使这个桥头堡含有一处优良的港湾以及你们所需要的飞机场，便可以说是非常运气，尔后随着作战的进展，可能还会多攻占一些。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面临顽强抵抗的情况下，运阑有限的人力物力，在登陆初期做到以下各点：

(a) 保持兵力的集中状态。

(b) 确保一处适当的地区，做为发展尔后作战的坚强基地。

(c) 使初期作战能够获得从我们本身基地出动战斗机的密切支援。

6、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将来桥头堡阵地的规模，要受到人力物力条件的限制。我们现在一定得弄清楚的是，初期桥头堡阵地必须包括那些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7、把以上原则，运用到西西里岛的东南部。第 8 集团军最需要的登陆海岸将位于塞拉库斯和拔奇诺之间。

这一带海岸地区具备有我在前几节里所提到的一切条件，只有一个条件还不够。而这个条件的具备与否，却“事关重大”，在这一地区，既没有足够的飞机场，也无法阻击敌人空军从附近飞机场起飞来阻击我们的海运及一般作战任务的遂行。所有关系重大的飞机场都位于柯米索—基拉间地区。

根据空军当局的想法，所有这些飞机场必须纳入于初期桥头堡阵地的范围。事实上，所有这些飞机场的意义，也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假如缺乏这些必要的东西的话，那么，整个的联合作战必定会垮得一塌糊涂。”

8、今天我在这里一定得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毫无疑问，我绝对不会在这次作战里“分散兵力”，只要一分散使用兵力，就只剩失败一途。那么，西西里一地不但不是我们建功立业的场所，而是同盟国家的第一流陷阱；这也正是德国人所欢迎的后果，也正是对同盟国的致命打击。

要知道，这次作战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攻占一些海滩，也不在于夺取一些飞机场或港口。而在于全部作战的空间——在于我们是在敌人同境之内遂行攻势作战，作战的目标，将含有飞机场和港口等，最后攻占全岛。

9、说到这里，各位也许会问，是不是还有变通的方案？

(a) 你们可以将整个桥头堡向北推移，将卡塔尼亚地区和那个地区内的飞机场全包括在内。但这一行动范围，将超出我们战斗机的战斗半径，所以这一方案根本不能成立。

(b) 你们可以将整个桥头堡向西推移，到基拉湾地区。这样做固然得到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飞机场。但是，港口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同时，全部登陆

兵力决不可能在海滩上立足大久。

10、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所可能确保初期桥头堡阵地的规模。这方面的相关因素是：

(a) 地面部队决不可犯分散兵力的毛病，我们必须占领一个港口。

(b) 以现有的人力、物力而言，满足陆军条件的桥头堡决不可能将空军认为势在必得的飞机场包括在内。

(c) 据我所知，空军方面的观点是，必须立即阻止敌人使用这些飞机场，然后再尽快夺取，供我运用。除非能做到这一点，否则空军绝不可能保证初期作战以后的空援，就是说，登陆 48 小时后，他们将无力给地面部队以所要的掩护。

11、因此，这些飞机场势在必夺，可是我们根本没有达成此项目的的充分的地面兵力。我们至少需要两个突击装载的师在基拉湾登陆。

12、分析到这里，已经到了柳暗花明的地步，假如想要在西西里登陆成功，就必须以另外两个师的兵力于“D—日”在基拉湾登陆。

这样，所有陆、海、空三军的一切条件皆已具备，西西里登陆战定会成功。

假如拿下出这两个师的兵力，那么基于空军的作战观点，我们很可能一败涂地。

13、总之，我认为应将巴勒莫地区的美军运用到基拉湾方面，在基拉湾的任何一方登陆。

假如能按照这种构想作战，那么，西西里入侵战定会克竟全功。

会议结束后，我当晚便赶回突尼斯司令部，静待事态的发展。

第二天午夜，戴君干将我唤醒，给我看了亚历山大拍来的电报，说艾森豪威尔已同意了 my 建议，至此，我如释重负，我们终于能放开手脚，制定切实的计划，从事切实的战争准备了。

看了电报后，我舒心地倒头酣然入梦。当时我真是下胜感慨，和德国人打仗真要比和自己人唇枪舌剑的斗争要容易得多。

在我对西西里入侵作战感到心满意足之前，还有两件事必须要得到答案。由于有关方面都能接受我的攻击计划，英美两军的地面作战毕竟能成为混然一体的一种作战。双方在遂行作战的时候，都将依赖对方的直接支援。我们的后勤补给问题也可以因为美方的协助而获得解决。时机已经非常迫切，统一指挥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也就是说，诸如协调、指导和掌握等，应该由一个集团军司令官和一个联络参谋负责，我将这意见电呈亚历山大后，立即得到了他的同意。他也认为，整个的作战应该由一个集团军司令统一指挥。亚历山大将我的意见，转报给艾森豪威尔，但是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他坚持要分成两个独立的集团军，一个美军的和一个英军的，由亚历山大统一指挥。

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还重要。我们这次作战的性质是开辟一个新的战区，发起一次新的战役。每个人都莫下将注意力集中在“何处登陆”这个问题上，而对于西西里战役究竟应“如何展开”却没有人想到。我们所希望的是迅速夺取这个岛屿，歼灭敌人，并不是使岛土守军逃回意大利。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统览全局的基本计划。我的基本计划构想是：

在西西里岛南岸登陆的两个集团军应该于登陆后，迅速向北挺进，将整个岛屿从中一分为二。在面对西方的一面应取守攻，两个集团军的综合主力

应集中于向墨西拿迅速挺进，以防止敌军横渡海峡北遁。海空军也必须大力协同，务期敌军无一兵一卒能够漏网。当时，亚历山大虽然也曾同意这种作战计划构想——同意这次战役应由两个集团军在海空军的协力之下共同发展，但事实上，战役的指导并没有遵循这一方针。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的一切抵抗于5月12日完全停止。当我们攻占全岛时，大部德军都已安然渡海，撤回意大利境内。

继任隆美尔负责全盘指挥的意军总司令麦塞元帅于5月13日向第8集团军才投降。当天晚上，在被送到俘虏营以前，他曾经和我一道进餐，我们分别就这次曾一度力敌的会战各方面情况广泛交换了意见。

6月19日，丘吉尔首相亲自授予我为武士爵位。7月8日，他又给我拍了一封电报：“兹仅对贵官与所部之卓越军团遥申吾之敬意与无比信心。”

7月10日凌晨，我们开始登陆，当时的天气状况很恶劣，风很大，海浪很高。但我的要求还是达到了：第5师的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于当日傍晚占领了锡拉库萨。在更偏南一些的诺托湾登陆的第30军也同样取得了胜利。

美军的作战要艰难一些。他们在南部海岸的登陆受到了风和海浪的很大影响，而且岸上敌人的抵抗也更积极一些，还遭到了几次骚扰性的空袭。虽然如此，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美军3个师的突击部队还是都上岸了，并且站稳了脚跟，但是在这个靠不住的胜利里隐藏着若干悲剧性的损失。例如，攻占锡拉库萨是由于第：空降旅在该城南面的阿纳波河上的蓬蒂格兰德桥周围空降了伞兵才取得成功的，这个空降旅于7月9日夜间至10月黎明前离开凯鲁万时，其实力为2075人。飞机途中，有69架滑翔机掉到海里去了，还有56架散落在诺托湾附近25英里的地面上。只有12架降落在正确的地方，因此从7月10日6点30分开始，这87名士兵不得不扼守住这座大桥直到向前推进的第5师来解围为止。在杰拉内陆空降的美第82空降师也发生了类似的惨剧。该师从凯鲁万地区出发时共有3200人，但只有大约三个连投到了目标区，虽然一批批机智的武装人员突然在一个很广阔的战线上空出现曾使敌人惊慌失措，因而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事实是，直至战争的这一阶段，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空降技术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他们还需要更多地注意拖曳飞机和滑翔机的驾驶员的训练，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教训：让一个大的空降机群沿一条复杂的航线飞行是无用的；还有，正如西西里战役中的又一次灾难所证明的那样，在夜间让一大群飞机在自己的舰队上空飞行是很危险的，即使事先告诫军舰不许开火也是如此。到进行诺曼底登陆战役时，盟军已吸取了西西里登陆的许多教训（虽然不是全部教训）。

如果说墨西拿是意大利的大门的话，那么，具有许多丘陵和大山群的埃特纳火山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槛了。埃特纳火山耸之在卡塔尼亚平原的北面，它俯视着西西里这个三角形岛屿的东南角。如果要从南面或西面接近和占领墨西拿，就必须经过埃特纳。虽然从任何地图上看，这种地理要求都是十分清楚的，但作战计划却没有把一旦登陆成功以后怎样到达墨西拿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亚历山大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他说：“下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岛截为两半。”我也有这样的想法，7月12日，我给亚历山大打电报说：“我的作战情况非常好……我建议让我的集团军向北进攻，以便将这个岛截成两半。”7月13日傍晚我又给刚刚看望巴顿归来的亚历山大发了一份电报，我认为，在断裂多山的西西里岛作战的指挥官必须拥有可供使用的良好的公

路，而当时只有两条良好的公路可供第9集团军使用。一条是经过埃特纳火山的东翼侧大致向北延伸的114号公路，我准备让第13军来使用这条公路。另一条是向西北、向延伸而经过卡尔塔吉罗内—恩纳—莱昂福泰的124号公路，这条公路将使我的部队能够迂回驻守在卡塔尼亚平原上的德军，唯一的缺点是，124号公路位于美军的作战地幅内，而且布莱德雷也像我所打算的那样，准备把这条公路用作他的第7军的进攻轴线。于是，我命令部队抢先使用了这条公路。我要赶在美军之前进入墨西拿。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在东部，由于希特勒在进行遥控。德军的抵抗逐渐强硬了起来。希特勒是通过凯赛林来贯彻他的意志的。然而，希特勒的遥控逐渐改变了调子，最初是要求把盟军赶下大海去，最后是决定在西西里东北部保持一个桥头堡，以便掩护德军以及比较忠诚的意军向意大利本土撤退。防线将由赫布来控制。主要防线是一条曲线，它从东北海岸的圣斯特凡诺经尼科西亚、呵吉拉和卡泰纳诺瓦延伸到东海岸上卡塔尼亚以南6英里外。另外还有两条防线，即“旧赫布线”和“新赫布线”，是准备在桥头堡不可避免地收缩时用作停留阵地的。

这意味着西西里战役的胜利不是变得越来越容易，而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敌人正在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并且正在把兵力集中在一个十分适宜于防御的、断裂的和没有道路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地区，英国的装甲部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正如杰克逊将军在《意大利之战》一书中所描述的，“这条防线看起来很像威灵顿在葡萄牙设置的托里什维德拉会防线”，而墨西拿海峡的防守者则是非常能干的巴德上校。巴德作为墨西拿海峡卫戍司令（7月14日凯赛林任命巴德担任此职），组织了集中指挥的非常强有力的对空和对海防御系统，亚历山大懂得这预示着什么。由于我的两条进攻轴线进展都非常缓慢，亚历山大向帝国参谋总长报告说，他打算用第13军经由卡塔尼亚向墨西拿进攻，并派埃特纳火山西面的第30军先到圣斯特凡诺海岸，然后再转回来向墨西拿进攻。7月16日，亚历山大以指令的形式把上述计划下达给各集团军指挥官。这个指令严重地伤害了美国的感情。

布莱德雷这样写道：“它证实了我早先的疑虑，只有蒙哥马利才被允许去进攻墨西拿。”

巴顿深信自己也能到达墨西拿，对分配下来的任务很不满，因为要让他来对付岛上力量较弱一端的敌人。

布莱德雷这样写道：“夺取一些小山，俘虏一些驯良的农民和无精打采的士兵是不光彩的。”

当第二天巴顿受命继续向北推进并切断海岸公路时，他的一个参谋人员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第7集团军司令部对这件事的看法：“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舒舒服服地在我们这边坐着，而让蒙蒂去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了。”巴顿不是那种喜欢闲坐着舒服的人。他通知了他属下的4个师长，然后乘飞机去找亚历山大讲理。他主要是谋求得到向巴勒莫推进的许可。亚历山大权衡了形势后，批准了巴顿的要求。

此时的巴顿还只是这样一个人：在他接任军长之后，第2军的战斗力大大地提高了，但他还没有显露出坦克战专家的任何真正本领。这时他只是开始证明他具有这种能力。日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7月22日，巴顿的军队进入了巴勒莫；而在头一天，我的部队遭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我的部队非常疲倦，我只有把第78师从北非的预备队中调来，才能支持疲倦的部队继续作

战，但这种调动要到月底才能完成。7月25日，亚历山大召开了一次协调会议，会上美国第2军受领了向东突进的任务。到7月27日，美军就已经占领了圣斯特凡诺和尼科西亚，而从南面开上来的第30军加拿大师则占领了奥吉拉。这样，第15集团军群终于到达敌人主要防线的边缘了。但是，从7月26日起，敌人的这条防线起了新的变化，墨索里尼被赶下台了。

于是，西西里的德国人就完全站到前台来了，他们接管了一切，而在此以前他们一直是从幕后进行某种圆滑的控制。7月27日，凯赛林命令赫布进行撤离准备，因此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安全地撤离西西里就是德军当时努力完成的任务。这时，英军战线稳步地向前推进，到8月5日，第13军推进到了火山另一侧的丘陵地带。但是我还必须艰苦作战到底，我甚至把已经抽出来准备进入意大利本土的第5师又调回了前线。第8集团军的突击队员最后于8月16日傍晚进入了墨西拿，但是接待他们的却是美军第3师的第7步兵团，因为巴顿一直让他的部队沿着北面的海岸推进，他采用了文互跃进战术，有时还进行了两栖翼侧包围作战（但往往不成功）。

敌人方面的情况如何呢？盟国的空中力量虽然十分强大，却不能严重破坏敌人的撤离。盟军轰炸机在关键的那几天内在墨西拿区域上空出动架次的数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它给人的印象是，盟军轰炸机向逃跑的敌人投下了无什其数的炸弹。这种印象是很不准确的。轰炸使许多海岸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却极难阻止下决心通过水道逃跑的敌人（1944年强渡塞纳河也是这样）。实际情况是，赫布既撤走了部队，也撤走了重型装备。德军弥补了因丢下意大利人而遭受的损失。杰克逊将军评论说，大多数德军部队在重新进入意大利时，比官们离开意大利来西西里时机动性更强了。

虽然，这场战役的正确发动主要要归功于我，但由于巴顿抢先一步进入了墨西拿，他成了英雄，而我则没有得到一点荣誉。当时艾森豪威尔曾这样说：人们照例对蒙哥马利的“小心谨慎”提出了批评，因为他没有对埃特纳火山上的敌防御部队进行勇猛的正面攻击。这是胡说八道。应当让行这种批评态度的人到灼热的灰尘滚滚的卡塔尼亚服役几个星期，然后让他们爬上山去向巧妙地部署在山坡缝隙阵地上的德国伞兵部队发动进攻。在这里，“第8集团军实施事先精心部署的进攻”，从后勤保障方面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作战上说也肯定是行下通的。顺便说一下，要是这些批评者患过疟疾，那他们可能会懂事一些。西西里战役的伤亡数字如下：

伤亡原因	美第7集团军	英第8集团军
疟疾	9892名	11500名
战斗	8375名	约9000名

艾森豪威尔后来经与亚历山大和我进行讨论后说：“当时我认为，现在我仍然认为，用7月中旬我们所拥有的兵力兵器对埃特纳火山的敌人阵地发动正面进攻将要遭到失败。”

由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巴顿具有指挥机动部队保持进攻势头的能力，可不可以这样问：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和我是不是全部错了，因为我们都未能看出我在西西里所创造的那种局面和我为诺曼底战役设计的那种战备格局非常相象？如果一俟各种可能性变得清楚后，我就主动承担起责任或者受命将尽可能多的敌人抵抗力量吸引到东部来，而巴顿则受领尽早发动一次他擅长的那种强行突击的任务。那么情况将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登陆后不久，我便面临着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加拿大第1集团军司令

官马瑙敦将军，由英格兰率领一批参谋将校于7月中旬到达马耳他，要求到西西里去视察作战中的加军部队。

加拿大步1师的官兵，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实战经验，这时刚刚很勉强地在西西里站住脚跟，师长格埃席蒙兹也是个毫无经验的青年将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一个师作战。

于是我决定不让加拿大部队和外界发生任何接触，我也不愿意任何来战地访问的人在席蒙兹正忙于指挥他那个师和第一流德军苦战的时候，搅乱他的心情。不过，为使事情确有把握起见，我还是跑去看席蒙兹，问他是否愿意让马瑙敦到西西里来，他的答复倒非常干脆，“千万不要让他来。”于是，我便向马耳他方面发了个复电，请求他们让马瑙敦将军的访问之行延期。

加军在西西里战役中的表现非常精采。他们虽然从不曾打过仗，但是，却全都具有极高的训练水准，而且还能很快地学习到战场上的种种技巧，因而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当我将这个师控制为预备队、准备向意大利本土发起入侵作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第8集团军能征善战的老部队之一。

在历经沙漠苦战的第8集团军官兵心目中，西西里真不啻是灵境天堂。当时正值盛暑，树上挂着摘食下尽的橘子和柠檬，家家户户都有丰富的美酒，西西里的女孩们尤其友善得逗人怜旁，但是，传播疟疾的蚊蚋却令人伤脑筋。各部队的医疗军纪都不太好，在规定排队领取预防药的时候，都是马马虎虎的敷衍了事。我们因疟疾侵袭而蒙受的伤亡率几乎和战斗中的伤亡不相上下。我们虽然都已经习惯高温条件下的生活，但是，在沙漠里是干热而在西西里却是又闷又潮。

在后方的将士们都尽量地少穿衣服，有些人甚至在头上戴一顶西西里的宽边草帽。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当时发生的一桩趣事：有一天，我坐在敞篷车上，正驶向第一线的时候，看到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上坐着一个几乎一丝下挂的战士，脑壳上戴着一顶丝质的大礼帽。当卡车驶近我的车子时，那个驾驶兵由车窗探出头来，向我脱掉他的高帽于，做了一个怪模怪样的鬼脸。逗得我不禁失声大笑，虽然我只要求士兵能够打仗，能够打胜仗，对于服装问题一向不太苛求，但是也不能太荒唐了！我决心整顿一下军容。于是，在回到司令部以后，我便立即下达了一道在第8集团军前所未有的有关服装问题的手令。手令全文如下，“第8集团军人员不得擅自戴高大礼帽。”

到西西里后，我不得不放弃那架在史法克斯得来的“空中堡垒”。我们已经离开了非洲那些大飞机场，在西西里实在找不到几个飞机场可以平安降落这种大型飞机。有一天，当我们降落在巴莫摩，准备去看巴顿将军的时候，“空中堡垒”几乎撞毁在飞行跑道上。于是我便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可以为我换一架别的飞机，他马上给我换了一架“达格塔”，里面还搭载有一辆吉普，这架飞机要比“空中堡垒”有用得多了。

我想，差不多每个人都不会否认，我们在西西里学习到不少东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所学习到的是怎样不做某些事情，总而言之，在西西里所得的经验，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莫大的价值。无论对于地中海战区的盟军，对我的幕僚们、对第8军团的每个官兵，还是对我自己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是，战役的结束阶段却令人不无美中不足之感，因为在我们拥有绝对海、空军优势的情况下，竟坐视岛上的大部德军越过墨西拿海峡逃到意大利本土上。也正因为未能西西里将德军一网打尽，所以才为我们尔后进入意大利的作战留下了无穷的后思。

我曾和亚历山大讨论过“时间因素”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人冬以前得到我们想要在意大利得到的一切。此外，我们还必须确保后方支援能够毫无遗憾地适应第一线行动的要求。而目前的现况却并非如此。亚历山大当时虽然是凝神倾听着我所报告的一切，但是，我想他不见得会同意我的看法。

由于意大利人的投降迫在眉睫，所以德军将在他们防区内的意军全部解除了武装。

有关意军投降的谈判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在意大利一方大肆施行愚民宣传的气氛中进行着。因此在这期间，艾森豪威尔难于给他属下的指挥官们下达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这时，盟军制订出了许多作战计划，每项计划都打算让一支盟国部队从意大利南部的某一地方登陆。这些计划的代号分别为“酒杯”、“敲板”。“滑膛枪”、“煽动叛乱者”。“硫黄”、“支柱”、“巨人”、“巨人”、“雪崩”和“贝镇”。

9月16日，第8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终于和美第5集团军的右翼取得了联系。柯拉克将军曾经为这次行动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贺函。他在那封信里，对我们的迅速支援备加赞誉：“贵官所属第8集团军向北挺进之行动，堪称极尽巧妙神速之能事”。

他虽然这样说，但我却认为我们对萨勒诺危急关头没起什么了不起的大作用，我相信在我们到达以前，柯拉克将军就已经将战局稳定了。我们在17天内，竟且战且进了300英里之遥，一路之上，不但地形易守难攻，非常有利于敌人的持久抵抗；同时，由于敌人的破坏，我们必须自己架桥，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崎岖的道路更是伤透了我的脑筋，地图上明明是10英里，而实际往往是20乃至25英里。当时虽然我们尽了全力，但我认为对第5军团的解围其实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8月20日，经我再三询问，艾森豪威尔才决定，让第8集团军的两个军以并列攻击的姿态遂行意大利本土上的作战，其指导思想是：

“支柱作战”，在半岛靴尖部北海岸的爵亚·塔乌洛地区。

“贝镇作战”，横渡墨西拿海峡的直接突击。

到7月底，又开始考虑到在萨勒诺地区登陆的第三方案，这一方案的代号是“雪崩作战”。

我认为，“雪崩作战”是相当理想的方案。我应该在最初就投入全部力量，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精力，以保证其顺利实施，但实际上，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

8月17日，终于决定放弃“支柱”方案。原定实施这一行动的第10军则拨还美军第5集团军，以遂行“雪崩作战”。于是，英美两个集团军入侵意大利本土的作战，便按照以下方式实施：

第8集团军——北渡墨西拿海峡，遂行“贝镇作战”。

美第5集团军——在萨勒诺登陆，遂行“雪崩作战”。

我们的麻烦也由此开始。

为了支援“雪崩作战”，他们将用于“贝镇作战”的登陆舰艇纷纷转供第5集团军。弄得我完全无法着手“贝镇作战”的计划实施，因为我既无资深的海军将校，又没有足够的海军计划参谋。无可奈何之际，我便提出抗议，并想办法使亚历山大也帮我提出抗议。仍没什么效果，但我们大家仍认为“贝镇计划”不可能实施。

我于8月19日午后，给亚历山大拍了一份电报：

(1) 我已奉命于 8 月 30 日开始遂行攻击欧洲的作战，目前虽无任何情报资料来断定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敌军将展开何种程度的抵抗。

(2) 我并没有受领有关此一作战之“目标”。本集团军的作战目标究竟是否在于为海军确保海峡的陆地空间，以及采取有利于“雪崩作战”的牵制行动？如揣度有误，则敬请指正。

(3) 配备给我的登陆舰艇与海军人员在敌人的抵抗下，将没有任何能力达成攻击目标。

(4) 由于计划与准备阶段的一再拖延，8 月 30 日实施“贝镇”作战肯定是不可能的。

(5) 我赞同“雪崩作战”优先的决定，但我也不同意在刚登陆时就受挫。

(6) 我眼下迫切需要的是您有关横渡墨西拿海峡的明确作战命令，请明确指示我的作战时间与目标。(7) 请提供一些能显示敌军抵抗程度的情报资料。

这封电报发出后不久便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于 8 月 1 日那天接到亚历山大有关“贝镇作战”目标的复文，那是他亲笔写在纸头上的便笺：

“你的行动是在意大利的靴尖部分确保一处桥头堡阵地，使我们的海军部队能够安全通过墨西拿海峡。

“在敌人由靴尖部分撤退时，你应以有力的一部跟踪向北追击。你应该记住，你在意大利南端牵制住的敌人兵力越大，则你所给予‘雪崩’的协助也就越多。”

这一目标很值得推敲。他们并没有考虑如何使我这个集团军的作战能和美国第 5 集团军取得应有的协调——美第 5 集团军预定于 9 日夜间在萨勒诺登陆。同时，更没有想到，第 8 集团军向北的推进是否能够越过加但萨罗颈部地带以北，也就是由勒佐以北约 60 英里处。因为支援我们作战的一切物力已被削掉很多。

在这种构想下作战的实际后果是尽人皆知的。在萨勒诺的登陆很快便面临到许多困难。我受命向前推进，以协助第 5 集团军的作战，于是，在后勤支援方面的难题便纷至沓来。

艾森豪威尔于 8 月 23 日召集他属下各总司令在阿尔及尔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奉命列席。他在会上指示我，将我为遂行“贝镇作战”所策定的计划加以扼要说明。我遵命说明了以后，更就自己对于这次作战的看法作了一番补充报告。我告诉他们，由于海军行动的延宕，我不可能在 8 月 30 日夜间发起这次作战。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所要的舰艇和海军人员，并且能够在 9 月 2 日夜间开始突击登陆。可是，海军当局却又告诉我，他们最早也得要等到 9 月 4 日夜间才能支援我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当即建议坎宁安立刻亲自到西西里跑一趟，把事情搞妥，他还指示，一定要在 9 月 2 日夜间开始作战行动。

坎宁安当即遵命退席，飞到西西里。经他亲自出马，海军终于同意在 9 月 2 日夜间发起渡海攻击。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艾森豪威尔又告诉我们，关于眼下正在进行中的和意大利政府商谈停战问题的情形。意大利人表示，他们对大战已感到极度厌倦。假如我们在意大利本土登陆，他们准备里应外合，和我们并肩打击德军。我当即对之加以反驳说，这简直像历史上空前的骗局，我告诉他们，意大利人将永远不会堂堂正正和德国人斗争。假如他们果真打算一试的话，一定会

被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所能指望意大利陆军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让他们在我们的后方帮帮忙，或者在德军占领地区采取不合作的消极行动。

但是，假如意大利的一般气氛果真如此的话，我所预期在“贝镇作战”中面临的抵抗将可能不会大过顽强。

美第5集团军司令官玛克·克拉克将军也在那次会上说明了预定于9月9日夜在萨勒诺的登陆计划。我补充说，在意大利境内约20个师的德军当中，至少将有4个师可能会迅速集中，以对抗第5集团军的登陆攻势。但当时参与会议的每个人都陶醉于意大利人将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远景之中，认为未来情况的发展很值得乐观。

我于9月2日发布了以下的告集团军官兵书，分发各部队当众宣读：

1、西西里是我们所攻占的第一块意大利领土，我们将战斗带到意大利本土的时机现在已经来临。

2、第8集团军是同盟大军踏上欧陆本土的第一支队伍，对于我们，这是一种无比的殊荣。

我们一定会以事实证明，第8集团军对这份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3、本人愿意借这个机会正告第8集团军的弟兄们，这次我们行将承担的作战定会克竟全功，对这一点，本人具有绝对信念。

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完善的计划，我们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中支援。

这次行将来临的会战将只有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另一次成功”。

4、弟兄们，向胜利之途勇敢挺进！

9月3日，凌晨4时30分，成千上万发炮弹开始向墨西拿海峡对岸轰击。这些炮弹是第30军密集部署的炮兵部队发射的，由于从巴顿的第7集团军借来了80门中型炮和48门重型炮，这次炮击的火力格外猛烈。与此同时，15艘战舰轰击了海峡南端的雷焦的敌防御部队。驻在内陆的重型轰炸机也作出了贡献。这一切都是“贝镇”行动的雄伟序幕，大约300艘登陆艇和渡船在一种差不多是像节日一般欢乐的气氛中把13军的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送上了意大利本土。

但是，我的后勤运输能力大差，并且作为我的两个进攻轴线的趾部翼侧的两条道路质量也不好；第8集团军对于从西西里运来的供应物资没有优先使用权；还有，我必须采取步骤夺取并使用克罗托内机场，以便出动更多的战斗机对萨勒诺进行猛烈打击。因此，我将轻装甲部队尽可能推进到最远处，并用加拿大师在9月11日夺取了克罗托内，还打算让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继续向前进攻，同时，我还必须把塔兰托拉接管过来，因为第1空降师已于9月9日在那里空降并夺取了一个小桥头堡。凭借这个桥头堡我就可以计划把印第8师从埃及调来在那里登陆。

9月9日，第5师到达奥莱塔，加拿大第1师到达波坦察。然而，后勤供应十分紧张。第5军司令部、第5军和印第8师司令部要到10月1日才能报到，在此以前，第8集团军要进行大规模进攻看来是不可能的。在此期间，我继续沿着意大利半岛的东侧推进（这一侧很快就成为第8集团军独占的地区），并在9月27日使用由第78师一部、装甲部队和一些“特种空中勤务部队”组成的“A”集群将德国伞兵部队从至关重要的福贾机场群赶走了。

从那时起，第8集团军在意大利作战的过程就是从一条河向另一条河稳步推进的过程。第一个重要障碍是比费尔诺河。一支从海上登陆的突击队顺

利地迂回绕过了这十障碍。该突击队于10月2日夜间至3日黎明前夺取了亚得里亚海上的泰尔莫利港，港口及一切设施均完好无损。在离海岸远一些的内陆第78师建立了一个桥头堡。虽然凯赛林曾亲自下令要消灭这个桥头堡，但经过激烈战斗后，该桥头堡还是坚守住了。后来当德军往北撤退到特里尼奥河一线后，又出了同样的问题。

在特里尼奥河，第8集团军接触到了实际的意大利战线。首先，特里尼奥河的北岸就是伯恩哈特防线的亚得里亚海一端，而在北面20英里远的地方则是建立在桑格罗河上的以卡西诺为中心的古斯塔夫防线。在这两条防线后面还有其他一些防线，其中以大哥特防线最为险要，这是德军在阿尔卑斯山前的最后一个防御堡垒。所有这些防线都有重兵防守并且拥有十分厉害的武器，一道防线被攻占后还有另一道防线。其次是天气恶劣。杰克逊将军颇为激动地这样描写道：“甚至在夏天，意大利南部的道路网也只勉强能够拥有大约11个现代化机械化师的两个集团军使用。当时几乎每一座桥梁和涵洞都被破坏了；到处是河里和溪里溢涌出来的流水；河上临时架起的通道上挤满了坦克和重型车辆；原来是道路的地方现已变成了一片沼泽。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兵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等待到恶劣天气结束。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指挥官愿意这样做。”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集拢了我的集团军，贮存了供应物资，来进行特里尼奥河战役的。第8集团军是在泥泞里，在阴冷浇身的雨水中把河对岸的德军第76装甲师赶跑的。

当时在第8集团军的编成内有两个军。第5军包括第78师和印第8师，部署在右面，其翼侧依托亚得里亚海。经过休整和改编的新西兰第2师此时已到达意大利，我把它调来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在特里尼奥河对岸，敌第16装甲师与第78师对峙，第1伞兵师与印第8师对峙。而敌第26装甲师则与英军左翼的第13军对峙。敌第65步兵师在桑格罗河后面组成德军的预备队。我的作战计划照例很简单，第13军对伊塞尔尼亚实施迷惑性攻击，以吸引住敌26装甲师的注意力，然后由第78师在海军和空军的强大支援下从濒海的翼侧实施主要突击。当时桑格罗河的两岸已成为一片泥滩，车辆只能在道路上行驶。德军巧妙地在一些独特的山间农村里构筑了防御工事。步兵发现在多岩石的土地上挖掘战壕很困难，因此不得不采用过去的“石掩体”（在地面大硬不能挖掘的地方，用石块在地面上构筑掩体，以保护自己。这是在印度西北边疆发展的一种技术），并且越来越多地用毛驴来运送装备和为前沿服务。到11月19日，第8集团军就已经越过了特里尼奥河并占领了桑格罗河南岸。它的下一个障碍就是古斯塔夫防线了。

夺取桑格罗河及河岸后部地区之战是我在意大利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是罗马战役的第一阶段。虽然这个城市于次年6月才攻克），是向着第5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的协作迈出的一步。在桑格罗河的进攻开始以后，盟军在战线的西翼进行了一次向北的冲击，包括在台伯河南面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夺得了安齐奥。遗憾的是，虽然桑格罗战役是意大利进行的第一次重要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但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是由于指挥官的任何过错）。随后几十月的事态发展证明，由于希特勒采纳了凯赛林的乐观的方针（尽可能坚守住罗马以南）而没有采纳隆美尔的悲观方针。后撤到阿尔卑斯山），英美军队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完全突破这些山中要塞。后来，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了各种谋略，例如利用好天气，联合使用两个集团军的力量，采取复杂的、成功的欺骗措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隐蔽地集

中大量优势兵力，等等，才获得成功。这一成功是在 1944 年的“王冠”战役中取得的，它使盟军在“霸王”登陆作战快要发动的时候夺取了罗马。但是在意大利，任何规模较小的作战行动，甚至集团军一级的作战行动，都只能达成一种最后势必会被敌人堵住的突破。这已经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桑格罗战役将证明这一点。

由于第 8 集团军控制着桑各河南岸斜坡，德军以他们惯常的方式只用少量守备部队据守着北岸 3 英里左右稍为平坦的地面。他们的主要防线位于里科里山脊上，从海岸边的福萨切西亚起向内陆延伸，经过莫扎格罗纳到达圣玛丽亚和卡索利，然后在高地上沿着东西走向的里和 84 号公路延伸至桑格罗堡和艾尔弗雷迪纳。德军在 40 英里的正固上部署了 4 个师（而且还占有一切地利）。我用 5 个师发动进攻，其中包括刚调来的新西兰师。但是我的步兵师都很疲倦，特别是军官的人数远远没有达到定额。例如，第 78 师在最近六十月中已经伤亡了 1 万人。

然而，第 78 师又再次投入战斗中，因为我的计划要点就是由第 5 军的第 78 师和印第 8 师沿海岸进攻。海岸公路是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控制的路线，以便调运供应品和弹药来保证预期的进攻。在我们的侧翼大约 15 英里远的地方是与海岸公路平行的 81 号公路，新西兰师将沿这条公路向卡索利和基耶蒂进攻。最后，第 13 军应当装出显然要向桑格罗堡—艾尔弗雷迪纳一线进攻的样子。准备是十分周密细致的，因为像往常一样，我早就把战役中应当做些什么提前考虑好了。士兵们每夜都在河上不停顿地进行巡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河两岸的田野都是湿漉漉的，而河水又随着山中雨量或雪量的大小而惊人地涨落不定。皇家西肯特团的编史家曾生动地描写了某营所遭受的苦难。该营任命了一个“巡逻长”来协调巡逻活动和报告。每夜大约派 60 人出去巡逻，他们有的排雷，有的保护工兵和坦克侦察组，有的则引诱敌人射击以便将其阵地的位置准确地测量出来。每个巡逻兵归来后都要受到讯问，然后根据询问情况逐渐汇编成了一个有关这个营的正面的大型全景地图。有时需要游过河才开始巡逻，而且常常需要水（这是在冬天），在这个营中有几个人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淹死了。还进行了一些欺骗活动：比如实施了一个旨在表明我的作战指挥所已向西转移到了第 13 军地域的无线电欺骗计划；即将返回英国的第 5 军空降师进行了一次暗示要对佩斯卡拉进行两栖攻击的搭载演习。还运用了阿拉曼战役中采用过的骗局：将第 5 军战线上的日益扩大的弹药堆集所隐蔽起来，而在第 13 军战线上则假扮了一些弹药堆集所和火炮阵地，制订了对进攻的大规模空中支援和炮火支援计划。进攻日期定在 11 月 20 日。

但是，从那时起，天气迅速恶化了。暴雨常常一下就是两天，接着又是一、两天的毛毛细雨或雾，而山里则在下雪，整个地区都变得湿漉漉的，泥泞不堪。在这些天里，桑格罗河在一天内能够涨落六、七英尺。第 8 集团军的预备行动就是在这种气象条件下进行的。新西兰师、印度师以及第 78 师全部设法获得一个牢固的据点，但是，山里可能有洪水冲下来，把三座经过紧张努力修建起来的桥梁冲垮；或者一个印度旋向前成功地推进后又会被在它后面涨起来的洪水截断，因此，这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直到 29 日夺取了莫扎格罗格纳后，情况才得到了改善。到 30 日傍晚，里科里就完全在第 5 军的控制下了。我重新调整了部队以便让第 78 师得到休息。然后，又在海岸线上更远一些的地方选择了两个攻击目标；奥托纳——由第 5 军进攻；战线左侧

的奥尔索尼亚由第 13 军进攻。加拿大师于 12 月 20 日向奥托纳派出了巡逻队，奥托纳当时由敌第 1 伞兵师第 3 伞兵团控制，其指挥官是位巷战老手。因此，加拿大师进行厂整整一个星期的逐步争夺战才迫使善战的敌人后撤，但当时任何一方大概都不明白他们已经为未来的军事教科书的编纂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战例。新西兰师尽管有坦克部队的支援，也只能小心谨慎地进攻奥尔尼亚。德军防御部队坚守住这个小镇直到战斗的声音逐渐消逝为止。

此战失利的一个原因是德军的战线已经大大地加强了。但是真正破坏了我的整个计划的却是天气（当然，天气常常是不成功的将军的借口）。在新西兰部队的战线上，需要用六个人抬一副担架下山。最能说明那个地区酷烈的自然环境的是基彭伯格的令人心碎的报道。他报道了新西兰师的一个排的情况。这个排有一些曾在希腊、克里特、“十字军”战役、阿拉曼战役以及上百次其他战斗中作过战的老兵，由于在前线拒绝参加战斗而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 12 月里，第 78 师有 5 个人冻死，有 113 人被遗弃。

第七章 遥望法兰西

陆军部：蒙哥马利担任第 21 集团军群总司令
艾森豪威尔让我负责陆上全部作战行动
应全部修改原定计划
我绝不是草包
和首相的谈话相当尴尬，首相的风度令人起敬
D 日延期

12 月 24 日一大早，他们便将我唤醒，递给我一封陆军部的来电。让我立刻飞回英格兰，继任培吉特上将出任 21 集团军群总司令，这个集团军群序列下的几个集团军正积极准备横渡海峡，开辟第二战场。这个突如其来的电令，真是令我悲喜交加，悲的是，我就此便要离开厮守一年多的第 8 集团军；喜的是，我居然能被看中担此重任，居然能卷土重渡海峡，雪洗当年敦克尔刻败战之耻。另外，此令对我还有解脱与兴奋的双重意义，所谓解脱是因为我对意大利战况太不满意，我们之所以面临这种状况，完全是自食其果，坐失了在严冬来临前扩张战果的大好时机。

在这个月的作战期间，我们有以下战果：

- a、攻克了西西里；
- b、击溃了意大利，并迫使其退出战争；
- c、将意大利舰队封锁在马耳他岛；
- b、攻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意大利本土，以及那不勒斯和福查的各飞机场。

这些辉煌的战果，均以在意大利所付的代价换取而来。我们的真正敌人是德国人。而我们却因为某些做法的错误，以致未能在气候转变以前给真正的敌人以真正的打击。所以我对调离意大利战区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当我们在西北欧开辟第二战场时，决不可再犯此类错误。只要我能在有关负责当局的圈子里，还能发生影响作用，我必将竭力避免重蹈覆辙。

好多天以前，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已被任命为第二战场的最高统帅，当时在第 8 集团军，大家都在揣测究竟谁将任他的总司令，谁又将接掌他在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权。呼声最高的是中东军总司令“巨象”魏勒笙。

12 月 24 日下午，我们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时才揭开了这一人事变动之谜底：

魏勒笙 继任艾森豪威尔原缺
亚历山大 留任现职
蒙哥马利 21 集团军群总司令

直到听到这一消息为止，我还没有将当天清早接获调职电令的消息告诉过任何人，我原打算先就某些问题和戴君干商量商量，而当时他正在休假期间，要到晚上才能回到我的主司令部，我知道，关于我究竟要带谁到我在英格兰的新单位去，需要煞费一番周折，我愿意这些重要的人事能够早日得到决定。

至于我立刻要调用的下级单位主官，我早已胸有成竹，他们是：

戴君干 参谋长
格兰姆 首席行政官
威廉姆斯 情报处长

李查斯 坦克顾问
赫犹斯 随军牧师长

至于其他要调用的人员，我想以后慢慢再说。我立刻电请陆军部，准我偕同这五位军官一道回国，同时我还要请调白勒金担任我的作战处处长，他不仅是个优秀的作战助手，也是戴君厂因病不能到职时最理想的代理人，而戴君干因为工作过于辛苦紧张，积劳成疾。没有戴君子，就少不了白勒金。白勒金的最大长处是能体会我的意图，事无巨细，他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在任何时候都能轻松地肩负起代理参谋长的权责，但是，我却不能一口气调走大多的人，因为这样做将会对不起我的后任，于是我决定在第一批请求调用人员的名单里暂时不将白勒金列入，等到以后再设法调动他。

陆军部立刻批准了调用戴君子、威廉姆斯和李查斯三个人的请求，对于格兰姆和赫犹斯两人则未予同意。最迟我还是决定偕格兰姆一道回国，决心不借一切代价，和伦敦陆军部当面争取。至于赫犹斯和白勒金两个人，则等到伦敦之后，再相机设法力争。

奥立弗·李斯接任我的职务，他将于12月30日到达。我决定于12月31日离职。李斯是第8集团军的老人，根本用不着例行长时期新旧任务的移交。

我于12月27日飞到阿尔及尔，拜会了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史密斯将出任艾克新职的参谋长。

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他想让我负起初期陆上作战的全部责任。并且他要在英格兰的美国各集团军全部由我统一指挥，以遂行初期登陆和今后的作战行动。我们讨论到我所需要指挥机关的编组形态，以及我们在新成立的集团军总部里，需要哪些美军将校。我于12月28日午后，飞回意大利境内的战术指挥所。

12月30日晚，奥立弗·李斯来到司令部，我当即向他办清了移交。第二天清晨，我搭乘“达柯塔”号专机飞走了。

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马拉喀什，首相最近也在那里养病，我在那里和他共度了除夕和元旦以后，便在1944年元旦夜里登机，继续向英格兰前进。

当飞机在地中海上翱翔的时候，前尘往事和未来远景，一齐涌上心头，我特别清晰地回忆起和艾森豪威尔打赌的事，他曾坚决认为，大战将在1944年圣诞节结束。我想，那一定可能办得到，不过却要看我们的做法是否正确，而对于我们未来的前景，我却又毫无信心。当我于12月31日晚到达马拉喀什时，首相正在研究“霸王”计划——即入侵诺曼底的作战计划。他将计划递给我，并问我对这一计划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不是他的顾问，“霸王”计划显然是个规模空前的联合作战，我不但没有看到过这个计划，而且也没有和任何海空军负责当局谈过这个问题。他要我研究一下这个计划，并将我的初步印象告诉他。我只好说，我将躺在床上推敲一番，第二天早晨再向他报告。

艾森豪威尔也在当天下午来到了马拉喀什。他准备回国，在就任“霸王作战”最高指挥官以前晋谒总统。几天前，我曾在阿尔及尔见到他，他告诉我，他本人对“霸王”计划只有个大体轮廓，而且感觉不怎么好。他还指示我，在他赶回欧洲以前，让我在英伦方面代表他处理一切事务，要先替他计划分析修正好，等他1月中旬回到英格兰后再做处理。我回答他说，我

想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应该和我一起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对全盘状况的掌握比我清楚。同时我还建议最好能有个书面指示给比德尔·告诉他在艾克本人回到英国以前，由我代理他处理一切问题。

我到达玛拉喀什那天晚上，正是除夕之夜，我们和首相及其夫人一起吃了一顿相当轻松愉快的年夜饭，当时在座的还有比勿布鲁克勋爵。与听到有关他的传说不同，他在言谈之间充分流露出深切关怀盟邦利益的心情。

晚宴后，我托词要研究“霸王计划”，请求首相准我先行离席上床。我用了很长时间，将这个计划分析了一遍，并将初步意见写了出来，第二天早饭前用打字机打出来，送呈给首相。他躺在床上，看我那份研究作业。

次日近午时分，丘吉尔夫人建议出去野餐，首相一直和我讨论“霸王计划”及我在建议里所提的问题。我告诉他：在大战期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便是必须有经验的战斗指挥官们早日进入未来作战计划情况；假如他们知道的大迟，则将不可能再就已经定案的作战设计加以任何必要的变更。依据我的经验，所有的计划都需要修改，可是都没有充分修改的时间。譬如，1943年5月间的“强壮”计划以及此次的“霸王计划”看来都不太高明。

晚饭后，我离开玛拉喀什，前往英格兰。艾森豪威尔不肯让我乘我那架双发动机的“达柯塔”型专机，虽然我已经加装了一个备用油箱，但他仍然认为不够安全。于是我登上了一架美军C54型四发动机的巨型机。我将自己那架专机装了满满一飞机洁子，让飞行员直飞英格兰，我于正月初2到达伦敦。

弗瑞迪·戴君于及我从第8集团军带来的幕僚们已提前赶到。第21集团军群总部设在西肯辛顿的圣保罗学校里，因此我又重新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旧地。我的办公室就是校长室。虽然在学校里我也曾是个了了起的风云人物，身兼足球第15队队长，曲棍球第11队队员和游泳队队员数要职，但是我却从不曾进过那间屋子。好像非要身为总司令之后，才能进得去似的。

我回国不久，便看出我们面临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重任，我是被委派在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合作战中担任地面部队总司令的要职。大部分的部队和下级司令部人员，虽然全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但他们毕竟都缺乏实战经验。而且我们距离登陆行动开始只有5个月的时间了。

21集团军群总部是以有四年历史的本土军总部改组而成。它的前身完全是个专门处理来往文件、传达命令的类似传声筒的业务机关，从来就没有到海外去过，自然更谈不上作战经验。总部里的很多高级军官服务将近四年，作风都已定型。我到位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向这种冥顽的幕僚气氛开战，给他们注入新的血液，起用一些具有实战经验、了解我的方法、而且能够彻底奉行命令的高级幕僚将校，这些我都能做到，我由意大利带回的那些高级军官们很快便接掌了高阶层职务，开始在戴君于的督导之下，积极展开作业，这些措施曾激起那帮老人的反感，在伦敦各俱乐部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些无聊的怪话，说是什么“好人滚蛋，坏蛋登台”，把我挖苦得体无完肤。

在我回英伦以前，21集团军群的总司令是培吉特上将。我们是军校的同期同学，而且还是相知多年的莫逆之交。他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很快出了一些成绩，他训练的部队都可以拉出去作战，我来后，他接替魏勒笙，出任中东军总司令。

当时在英格兰的陆军各部队，一般都缺乏实战经验，都是些理论多、实践少的单位，军官们对于基层军官所必须了解的能减少牺牲的一些战场要诀

一窍不通。无论高级指挥官如何精娴韬略。战场上最后的决胜关键还是团以下军官和士兵们的主动精神和作战技巧，缺少这种关键资本的部队将必败无疑。西西里战役结束后，第 50 师、第 51 师以及装 7 师等这些历经实战考验的部队已由地中海战区调回英格兰。于是，我便把这些久战之师和从未开出国门的部队相互对调军官，以使此类的实战经验尽量推广。这项措施，最初也曾弄得怨声载道。经再三说明理由后，大家的反应才渐渐正常。

另一个使我感到头痛的问题是陆军部对在联合王国境内各部队的活动抓得太牢，比在战场上遂行作战任务的集团军内控制还要紧得多。我反复强调，第 21 集团军群事实早已在枕戈待旦的应变状态下，已经准备在最近和精锐的德国陆军一决雌雄。这些部队因为缺乏实战经验，所以迫切需要坚定的领导和当机立断的决心，以便确保在欧陆的鏖战中杀敌致胜，而决不容在编制或法则的局部修正方面，因为犹豫不决，而延宕时日。我们的一切想法和做法应该摆脱书本的羁绊。鉴于事态的严重，我于正月 13 日，召集在英格兰的 21 集团军群所有集团军将领前来圣保罗学校举行会议。在会上，我首先告诉大家我对战斗行动的看法，并就我的工作方式详加分析说明，使大家了解今后我们应该在什么气氛下工作、战斗。会上，各级将领一致认为，要想各师能按照我的要求遂行战斗任务，就必须在编制方面进行调整，我同意调整编制，并命令他们立刻着手实施。

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一些陆军的主管单位。在他们心中，我显然又是个新的草包，而且是个难于应付的家伙。会后，他们将开会的情形呈报各自的上级，于是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布鲁克紧跟着便通知我说：“陆军大臣詹姆斯·古瑞柯爵士对我明目张胆地不顾陆军部权责的做法大力震怒。”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有点乱了手脚，因为，在得不到陆军部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我是决不可能适时完成各集团军战备的。布鲁克还向陆军大臣建议，邀我一同吃顿中饭，以便我们好好地谈谈。当时我和古瑞柯还不太熟，所以认为布鲁克建议一道吃饭的解决办法下无道理，陆军大臣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吃饭的时候，我便趁机向古瑞柯娓娓解释，为什么修改编制势在必行，时间是如何的紧迫，而我们的部队是如何、适应战场要求。我一面向他道歉，一面要求他相信我，基于作战的需要，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假如嫌我在哪方面做得过火，我将随时准备应召，当面加以说明。

餐叙后，我和陆军部的隔阂便得以澄清，那次餐叙也正是我和古瑞柯笃厚友情的起点，他和他的太太已成为我今天的挚友之一。就我个人而言，他可以说是一位前无此人的最好的一位陆军大臣。

至于在更换高级指挥官问题方面，我只要求陆军部作了一次人事调整：将在第 8 集团军任军长的邓普塞将军由意大利调回英伦担任第 2 集团军司令官。我对相识多年的邓普塞一直非常赏识。他指挥第 2 集团军转战欧陆各处，直到大战终结。

远在 1944 年以前，伦敦就成立了一个同盟国军队联合参与编成的计划制订小组，随时和华盛顿方面的盟军参谋长联席会保持联系。这个机关成立后，一直研究盟军向西北欧反攻作战的问题。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弗莱第·毛干将军。他常常向我诉苦，说在没有指挥官主持的情况下，制定一个完善的切合实际的计划是如何的不容易。

21 集团军群总部根据毛干所拟定的计划大纲起草了一个战术计划，我越看这个计划越不像东西，突击登陆的正面大过于狭窄，用以掌握全部正面的

只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在登陆地区很快便会发生拥挤不堪的现象。

虽然瑟堡港口的夺取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可是，在瑟堡半岛以东地区竟没有计划一兵一卒登陆。我对问题的看法完全来源于实战中的血肉教训，而在这些教训中，以下四点尤为重要：

第一，必须将战略方面所希望的，和以现有兵力在战术方面行得通的，两方面综合考虑。

第二，为达成此目的，必须在发起攻击之前，决定作战的方式。

第三，假如侧翼和后方安全，那么，你的有利态势便也告成。

第四，简单是作战计划的最重要因素。计划一旦过于复杂，则作战必将面临着危险。

大军在诺曼底上岸之后该如何发展，尚无任何明确的答案。我们建议在欧洲大陆开辟一个新的战区。这次战役所涉及的整个问题是在西欧遂行陆上攻势作战，以达成消灭敌人实力、攻占德国的目标。

因此，首先要决定如何发展陆上作战，然后再研究如何确保我们在海滩上的登陆行动的要求，当时我们的计划作为程序却好像恰恰相反。根据当时我们所了解的，德军在法国境内的总兵力共有 50 多个师，其中有 6 个师是装甲部队。比勒·威廉士判断我们在“D—日”晚间，可能会和 6 个师的德军展开一场苦战。我们这次行动，决不容许有丝毫冒险投机成份。因为一旦登陆失败，大战就有可能再拖上几年。我们必须以疾风迅雷之势一举登陆。乘敌没有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建立稳定的立足点。当我们行动时，空军要严密控制住内陆的敌人，阻止他们的预备队向我军立足地区运动。

在初期登陆阶段，我们至少需要 5 个师的兵力，同时还需要以若干个空降师降落在两翼地区，以确保我们向内陆挺进时侧翼的安全。截止“D—日”晚间，我们需要在岸上集结 8 个师的后续兵力。“D+2”日应能集结到 12 个师。一周之内应集结 18 个师。所以我们心须从地中海战区调集更多的登陆舰艇及空运工具。

我发现，此次作战能否成功，关键在于“铁砧计划”执行得好坏。不如将它修改为一种威胁性的登陆，以便能将节约下来的登陆舰艇，专用以支援“霸王”行动。所谓“铁砧作战”，是美法盟军预定在法国南部的土伦以东地区登陆，休后转战意大利。英当局对此毫无兴趣，而在美方心中，“霸王”和“铁砧”两个行动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要借“铁砧作战”将敌人的兵力抑留在法国南部，从而有利于“霸王作战”的遂行。法国人也欣赏这种作战，因为戴高乐所向往的是在一位法籍总司令指挥下的法国军团光复法国本身的领土。斯大林也非常欣赏这个作战，因为这将迟滞亚历山大在意大利战场的攻势，从而可以使俄军先西方盟军一步，进入维也纳。我和邱吉乐首相对于这些作战都不感兴趣。

有关“铁砧计划”的讨论一直进行到 8 月间，才算告一段落，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实施。具体时机，则定于我们歼灭了法莱斯袋形地带内的德军之后。

由于某种我丁清楚的原因，“铁砧作战”后来又改称为“天龙作战”。

我始终反对并主张完全放弃这一行动，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在“霸王作战”的同时遂行“铁砧计划”，使得登陆物资流于分散。

第二，这一行动将削弱正在紧要关头的意大利战场的攻势，使我们坐夫

先俄军一步进入维也纳的有利战机（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失策，所以才产生了第二次大战后的严重后果，才造成 1945 年以来的冷战局面）。

最后我们将作战发起时间延后，问题才得以解决，原定于 5 月 1 日发起的诺曼底登陆行动续延到 6 月初，“铁砧作战”顺延到 8 月。但我认为，“铁砧作战”（或天龙作战）发起于 8 月 15 日，是二次大战中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之一。

正月 21 日，艾森豪威尔同意了我们的修正计划。

我们企图对两处海滩实施同时突击，一处是卡里塘河北口侧的诺曼底海岸，另一处是这一带海岸和阿内河中间的地区；初期目标是为尔后的作战确保一处含有飞机场及瑟堡港口的基地，这一带基地的东翼应将卡昂的公路中心点包括在内。

我负责指挥所有地面部队的突击行动。我将部队分为两个集团军：在邓普塞将军指挥下的英第 2 集团军和布莱德雷将军指挥下的美第 1 集团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集团军：何瑞阿将军的加拿大第 1 集团军和巴顿将军的美第 3 集团军。最要紧的一点是：按照我的计划，一旦在诺曼底立足，便“佯”向东翼方面，也就是卡昂地区打出去。

我企图借这种来势甚猛的佯动，吸引敌人的主预备兵力尤其是他们的各装甲师——将他们抑留在东翼。我用邓普塞集团军里的英军和加军部队，遂行牵制行动。将敌军主力抑留在东翼方面以后，我再运用布莱德雷将军的美军，由西翼打出。这种突出攻击先指向南方，然后再在大范围内指向巴黎，横扫塞纳河南岸，我希望这有力的巨轮以法莱斯为中心，阻断塞纳南岸的敌军。这时，巴黎南侧塞纳河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和这一牵制行动密不可分。

计划获得各方同意后，我便将所有细节，交给了戴君于，我自己则致力于解决装备问题，希望我们所使用的兵器能够适合作战要求。另外我需要建立全集团军群的信心。

到 5 月中旬，我遍访了联合王国境内的每个部队，每个参予诺曼底入侵行动的官兵都亲眼看到过我本人，都直接听到过我的谈话，我要视察百万人以上，同时要使一百万人以上的部队都能视察过我。我用这种方式赢得了将在我麾下遂行战斗任务的来自英国、美国、比利时、波兰、自由法国与荷兰人们的信心。这虽然非常辛苦，但报酬却很丰厚。

我回到英格兰几个礼拜后，补给部曾要求我参观国内各承造陆军装备的工厂。许多此类的装备都是“霸王作战”所迫切需要的，各工厂里的男女同胞们莫不夙夜不懈地为我们赶工生产。

此类的参观访问使我能和军队以外的广大社会群众发生频繁接触。每到一工厂，他们都要求我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我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大军中的一员，无论是在战斗前线上的士兵还是生产前线的工人，都是在力同一理想，同一目标而奋斗；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方面是不分轩轻，毫无差别，我们的共同使命是将工人和士兵锻合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摧毁德国人君临欧洲、统治世界的野心。

2 月 22 日，我在欧期顿车站向全英格兰的铁路工人代表发表了一次演说。那天到场的听众中，有铁路间业工会的秘书和铁路从业员各部门的代表。我一共演讲了一个半钟头。我告诉他们，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怎样能出力帮忙。我告诉他们现在的战局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险恶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必须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以早日结

束这场战争。演讲完毕后，各同业工会的秘书们当场保证他们将全力支持。

3月3日那天，他们又请我前往伦敦船坞，对16000名船坞工人和卸货工人演讲。

在演讲访问中，我得到的印象是民众们都显得非常疲惫，而且普遍有一种厌战情绪。矿工、工厂工人、船坞工人、铁路工人和家庭主妇们，都已在高压下含辛茹苦地生活了多年。任何人都很难得有个假期，很难得暂离工作岗位，轻轻松松地休息一下，入夜后的烟火管制使阴郁的情调越发浓厚，我认为，欧洲战争非在1944年结束不可，人民渴望和平。我曾对他们宣誓，必将竭尽一切可能在圣诞节前后结束对德国的战争。在这点上我很有把握，但前提是不能再犯任何错误。

在环游全国的旅行中，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老百姓心目中好像我怀有争取胜利的神效秘方，好像是政府派我来领导他们走向较乐观的康庄大道。我意识到这种气氛中的危机，并深知在政治圈里我这种活动必将受到十手所指的歧视。

我曾受到过一次暗示，说我应该“中止”这种访问旅行，对此我不加理会，我告诉他们，我是应白厅中某部长之邀做这种访问旅行演讲的。

事实上，当时英格兰的群众的确需要能振奋精神、鼓舞他们支援战争的热情，他们需要一种崭新的谈话题材。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入侵欧陆的作战必将是一场血肉横飞的惨烈厮杀，伤亡必定会空前惨重，我向他们保证，实际情形将不会如此。这一切只有通过接触才能办到，而我的访问旅行正有利于达成此目的。

“国家储蓄委员会”也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发起一些全国性的名为“胜利之翼”。“海军周”以及“向陆军战士敬礼”的储蓄活动。

到3月底，“霸王作战”已是万事俱备，各集团军相机进入集中地区。这种集中运动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要尽早开始。

“D—日”定在6月5日。

在整个4月，各部队都忙着各种演习，我们还在5月3日到5日实施了一次所有突击部队的“大预演”。

我还于4月7、8两日，在伦敦我的司令部里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高司演习，召集各野战军的全体将级军官参加。我的目的是使所有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幕僚人员能够彻底进入“霸王作战”，使他们除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想外，还能对一般计划、海军问题和计划及空军的行动，有一个全局性的概念。这是第一天的课目，第二天，我们分别就若干可能在作战中发生的情况，特别加以演练，首相在演习的第一干曾亲临视察，并且对所有参加演习的军官训话。

4月28日，我将总部搬到朴茨茅斯地区的“南维克会馆”，那将是我们“D—日”的作战指挥所。我的“A”区营舍便设在附近的“布茹姆菲德会馆”。

最高统帅部于5月15日在圣保罗学校举行了一次有关我们联合计划的最后一次简报，出席那次简报的，有国王陛下、首相和史未资元帅以及英军参谋首长。

那天，艾森豪威尔的表现非常好，他发言不多，但中肯、扼要，具有极大的份量，国王也在退席前，即席发表了一篇相当简短明确的训示。

在“D—日”以前，首相对各部队的编装情形曾深表不满，认为初期登陆

的战斗部队和编制车辆之间缺乏平衡。根据他的观察，携带步枪和刺刀的战士不够，而载重汽车和无线电车辆等又嫌太多。同时他要到朴茨茅斯亲临我的总部，向我的部下调查这件事。

他于 1944 年 5 月 19 日来到朴茨茅斯。等他就坐后，我说：“报告首相，我知道您今于是想和我的幕僚人员讨论有关第一批登陆部队兵员和车辆比例的问题。但我却不能让您这样做。因为这项措施是经过裁决的。我决不肯让您在这个时候干扰我的幕僚人员，因为这样可能会动摇他们对我的信心。他们为准备入侵作战已经干得心力交瘁，一切准备工作差不多已全部完成，而且在英格兰的部队都已向集结地区运动，着手装载准备。您尽管跟我辩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但绝不能和我的幕僚们商量，再说，现在已来不及采取任何变更措施。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确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到‘D—日’那天，自然会有事实证明。假如您认为这件事我们做错了，那么就是说您已经失去了对我的信心。”

我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后，接着便是一阵相当尴尬的沉默。首相没有立刻回答我，我想最好还是赶快用行动来打破这种尴尬的沉默气氛！于是便站起来向他请示，问他是不是愿意现在就到隔壁房间去，和我的幕僚们见见面。他表现出的风度，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他眨了眨眼睛说道“好！你可以禁止我和我的部下做任何讨论”。

那顿晚饭尽欢而散，当晚上床时，我还不禁在想，他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以他那样官高爵显的身份，但是却丝毫没有官场的习气，任何喜怒的感情，也毫不形诸于色。

由 6 月 1 日起到反攻欧陆作战开始的 6 月 6 日间，所发生的大事如下：

从 6 月 1 日起，我们一直关注着天气预报。在 6 月上旬，只有四天能适应遂行“霸王作战”的天气，理由是：

- a、德军的海滩上布满了障碍物，我们必须要在低潮时才能从事障碍物的扫除作业。
- b、完成这一作业，至少需要 30 分钟时间。
- c、为了充分利用海空军轰炸和炮击效果，我们需要至少一个小时的白昼时间。
- d、在先头登陆艇靠拢海滩后，我们大约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高潮。

根据以上四点，6 月上旬最适于作战的时间如下，黎明时间是 5 时 15 分。

(D—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高潮时间) 5 : 30 6 : 10 6 : 35 7 : 13

黎明后时隔 15 分 55 分 80 分 120 分

我认为 6 月 4 日不合适，6 月 5 日较为合适，6 月 6 日相当合适，6 月 7 日不行，因为在靠拢海滩以前，有长达两小时的白昼。过了 6 月 7 日，就得再等两个礼拜才能有一段合适的日子。可是，将已经接受任务、完成装载的部队再拖上岸来，等上两个礼拜，却是相当危险的。6 月 2 日清晨，我在朴茨茅斯附近的“南维克会馆”对总部战术指挥所和主司令部的全体军官训话，对后方司令部的训话则于当天下午在伦敦实施。

晚上，艾森豪威尔和我在“布茹姆菲德会馆”吃了顿静悄悄的晚饭。饭后，我们前往“南维克会馆”，出席有一些气象专家参加的天气会议。天气看来还不坏，但是，专家们却在担心冰岛上的一团低气压。

6 月 1 日

天气预报不太好。在冰岛上的低气压已经开始向南发展，另一个由亚速尔群岛北上

的高气压带则被这股低气压挡了回去。也就是说，原来所预期的从6月4日夜到6月5日，笼罩在海峡地区的一条有利的高气压带将无法到达海峡地区。简直糟透了。晚九时半，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气象会议，会上决定6月5日为“D—日”，今后将不再做任何变动。但是我们知道，6月4日必须再作一次最后决定，假如有延期的必要，纵令有些船队已经启航，也要召回。

6月3日

我们于凌晨4点钟，在“南维克会馆”开会。有些船队已经按照以6月5日为“D—日”的计划启航出海。天气报告令人非常泄气。海军认为，登陆虽然也可以，但却将相当困难。蓝姆塞将军不发表任何意见。我主张按预定计划出动，最高副统帅泰德则主张延期。

艾森豪威尔根据所有的因素，加以权衡之后，决定将“D—日”后延24小时，即6月6日发起攻势。当晚9点半，我们又开了一次会，天气预报仍然恶劣，我们决定明早4点再召集一次会议。

6月4日

我们在清晨4点举行会议时，海峡里掀起了一阵阵的冲天巨浪，大风暴来了。假如“D—日”仍定在6月5日，那么登陆行动定会遭受惨败。气象预报显示，6月6日风暴将趋缓，据气象专家们预测，如无特殊情况，6日后将有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

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在6月6日那天动手。大家都没有意见，会议只用了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

当晚，我便赶到幸德赫德，去和雷诺少校贤伉俪商量，就我的儿子大卫的安置问题作最后决定。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父子没有见过一次面，同时我也不愿去和他告别，以免惊动了温彻斯特所有的孩子，弄得大家都知道“D—日”就要来临。日后雷诺夫人告诉我，她已经看出那天晚上就是“D—日”的前夕——她不是由我的言行举止看出的，而是因为我将自己的便服带到他们那儿，放进一个衣柜里面。

一整天的时光都消磨在6月6日“布蓝姆菲德会馆”的花园里。吃过早饭，我替英国广播公司录了一张告各集团军官兵书的唱片，这段告官兵书曾在各部队登船以后向官兵们公开宣读，根据上半天的战报，我们的登陆行动进展得相当顺利。我决定去诺曼底，呆在朴茨茅斯郊外对全盘战局不发生任何作用。

于是，我便于晚9点半钟，搭上在船坞待命的驱逐舰“福克诺”号横渡海峡。我急子和邓普塞、布莱德雷碰头，他们正在自己的指挥舰上和自己忠实的部下在一起。

6月5日

第八章 貌合神离的联姻

我的舰船搁浅在法兰西海岸
我们都欠上帝的账，只有一死才能还清
向我袭来的流言蜚语
不耐烦的新闻界
英美联军“感情上的鸿沟”
谁是谁非的制造者

6月7日早晨，我所搭乘的驱逐舰“福屯诺”号到达了诺曼底滩外的海面后，便向西航入了美军地区。我们靠布莱德雷将军的座舰“奥古斯塔”号停下，我和他就第1军当面的情况作了长谈。布莱德雷对他东翼奥玛哈海滩的作战情况非常关切，我们当即就他所面临的问题加以分析研订了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福克诺”号驶回英军地区，和英舰“塞拉”号与“布岁罗”号泊在一起。邓普塞将军和海军的魏安将军来到“福克诺”号上，我们分析检讨他们的状况与问题；在英军海滩上的一切行动都能按照计划实施，丝毫没有值得担心的地方。正在我们三个人讨论问题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偕同蓝姆塞将军搭乘蓝氏旗舰航行到英军地区。我当即登上蓝姆塞旗舰，和他们谈了一阵。然后，我便教丘吉尔上校将我的旗舰驶回到美军地区，以便能在“奥古斯塔”号上和布莱德雷将军再谈谈，靠近“奥古斯塔”号以后，才知道“奥玛哈”海滩的情况已渐渐好转，布莱德雷将军也已经上了岸。他的参谋长则来到我的座舰向我报告情况。

当时天气已转晴，海面上风平浪静，坐在驱逐舰上，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作“环绕舰队”的巡礼，真是说不尽的轻松愉快。海上的景色目不暇接，到处都是船舶相接的舰艇，封锁舰和人造海港也相继到达。空中没有一架敌机，海上和陆上的鏖战也远得只听见偶尔一两声炮响。在此情景之下，很难想象在岸上已经有过一场决定欧洲命运的激战。我们于午后8点30分左右，在美军海滩外抛锚停泊，我问丘吉尔上校，他能不能第二天早晨7点钟，把我送上岸去。

第二天早上凌晨6点30分，我们向海滩靠近。水非常浅，我要求舰长尽量靠近海滩，他一面吹放汽笛，一面和岸上联络。所有的海滩标志都被烟幕笼罩得模糊难辨。突然舰身发生了一阵微颤，舰尾不晓得搁在沙包还是礁石上面了。当时，我正和一位侍从参谋在后甲板上，于是我便让他到舰桥上去打听打听，我们是不是还要靠岸近一些。舰长对这个问题很不以为然。那位侍从中尉回到甲板向我说明一切。他告诉我船搁浅了，我竟迷迷糊糊说了句：“好极了。舰长果然尽量把军舰靠近了海岸。现在把我送上岸去的小艇呢？”

最后，一些已经上了岸的参谋们，终于弄来了一艘登陆艇，把我从驱逐舰接上岸去。驱逐舰也于不久以后被拖出了浅滩。他们告诉我，这次“搁浅”曾被他们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海滩。

我们在“D—日”的突击已经获得了奇袭效果。当时，海峡里的天气情况虽然恶劣，但各部队却都能在惊涛骇浪之中，以良好的状态，分别在预定的海滩完成登陆行动。我们慢慢地站稳了脚跟，逐渐向内陆扩展。

如果丘吉尔能够自行其是的话，那他也许比我更早就闻到战斗的火药味了，因为早在6月4日夜，他就决定上一艘巡洋舰，去分享战斗开始时刻的欢乐。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将自己的计划对布鲁克严守秘密，因为他

知道帝国参谋总长一定会否决他的这个打算。幸好，英国国王本人否决了丘吉尔的这一打算，所以直到6月12日他才被获准进入诺曼底。这样，不受任何参观者的干扰，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将登陆所造成的弯弯曲曲的战线连成一片。我在登陆后48小时内就踏上了法国国土这一事情本身雄辩地证明了登陆成功，但是，取得了多大成功，在哪里取得了成功呢？

虽说登陆的总体计划只有一个，但对于进攻开始日参战的部队来说，各登陆地段必然会有某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对于曾经在太平洋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进军的美军两栖部队来说并不陌生，即战斗是在争夺滩头阵地（在24英里长的英军地段内，5个登陆滩头的宽度都未超过一英里）。到第一天结束时，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基本没有改变。两个侧翼的空降部队的行动再次证明，这些精锐之师即使空投不当也能取得似乎不可能取得的成就。但令人遗憾的是，诺曼底空投表明，在西西里取得的教训并未充分吸取和运用。尽管如此，至少在一点上我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即利一马洛里所预言的美国空降部队及其运输机可能损失大半的情况并未出现，损失并不十分严重。然而，由于空投和空降不准确，人员、装备过于分散的状况确实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飞行航路过于复杂（西西里战斗已经显示了这种复杂性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进入空投区之前，云层使一些飞行员搞错了方向，而另外一些缺乏经验的飞行员，光去注意地面的高炮火网，实施迂回机动，以避高炮射击。结果，虽然在此战线上使用的850架运输机只损失了20架，但第101空降师却撒在了一个25英里长、15英里宽的地区。天亮时，总数6600人中只有2100人到了预定地区。甚至一天之后，集中在一起的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尽管如此，到傍晚时，他们还是夺取了沼泽地五条堤道的西端。第82空降师的运气稍好些，其先头伞兵团的大部分人降落在离正确地点3英里之内，并很快占领了卡朗唐至瑟堡公路上的要地圣梅尔埃格利斯，随后而来的是52架滑翔机中的22架。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是空降在敌人中引起了极大混乱。正如切斯特·威尔莫特所描述的，这些意志如钢、自身带着全副装备的士兵像“从一个巨大的盐瓶中撒到大片的土地上”，使敌人茫然不知所措。不过，到那时为止，这些空降兵与在“犹他”滩头登陆的第4师还没有建立起可靠的联系。

英国广播公司的随军记者切斯特·威尔莫特随第6空降师飞来，该师的任务是在奥恩河口附近及其周围广大地区保障登陆作战东侧翼的安全。第一架飞机要把一些伞兵投到划分给该师的地域引导人员，威尔莫特对飞机上所载人员情况的叙述表明了这支部队的典型组成，他们全都是志愿兵，“……在这个先头突击队中，一个是来自伯克郡的搬运工，一个来自肯特郡的工具制造工，一个是来自爱丁堡的泥瓦匠，一个是来自伍斯特郡的掏下水道工人，一个是来自爱尔兰自由国家‘军’的逃兵，另一个是来自奥地利的难民。所有这些人由一名年轻的中尉（在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伦敦西区一家喜剧院的合唱队员）率领，他们当中有三人经历过敦刻尔克的大撤退，一人在非洲打过仗，其余的都是第一次参战。”

由于空投过于分散，第6空降师也遇到了困难，但它的主要任务即夺取奥恩河和卡昂至大海之间的运河渡口，占领梅维尔的梅岸炮台，还是完成了。前者是东西侧翼和主桥头堡之间主要交通线，后者则能猛烈轰击“斯沃德”登陆滩头。晚上，增援的第6机降旅乘145架滑翔机顺利到达。到那天夜里，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盖尔少将手中有了6个伞兵营、两个机降营、一些

轻型坦克和火炮及大约 50 门反坦克炮，他用这些力量就可抵御第二天敌人可能发起的反击。就像美国人一样，他也没有与登陆部队接上头。

但是，空降作战实际上只是一种保障性行动，是为了掩护从海上登陆所投入的庞大人力，物力。对我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投资”究竟产生多大的“红利”呢？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军地段，即时可见的效果并不令人鼓舞。当然，在“犹他”滩头收益确是不小。第 4 师得利于其登陆滩头的位置：在科唐坦半岛的背风处，该师的登陆艇所遇风浪不大，容易靠岸，而且，由于水位不是很高，滩头障碍物清晰可见。进攻开始前，269 架中型轰炸机对德军的岸边防御工事进行了精确的地毯式轰炸。离岸 3000 码放下水的 26 辆水陆两用坦克，全部安全地漂浮着向岸边前进。一个小时内，爆破分队已为后续登陆艇扫清了道路。……“犹他”滩头是在进攻开始日出现上述顺利情况的唯一滩头，由于这些有利因素，再加上对面的敌军比较弱，第 4 师在夺取了桥头堡之后，遇到的障碍是沼泽地和滩头缺乏出口，而不是敌人的顽抗。这天结束时，2.3 万多人登上了岸，并开辟出供机动和增加兵力用的大片地域。

同一天夜里，“奥马哈”滩头的景象和形势却完全不一样。虽然也有 3.4 万多人上了岸，但就像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他们“在敌人据守的岸边所取得的立足点没有一处纵深大于 1 英里半”。之所以没有出现全盘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因素：海军的大饱和和美军第 1 师——“伟大的红 1 师”——的勇气。该师是一支经过“人炬”作战行动和西西里作战锤炼的队伍；具有集团自豪感，在这一天表现十分突出，就像在未来的阿登战役中许多毫不畏惧流血和牺牲的美国士兵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能以这样一种精神战斗：“我毫不在乎。人总有一死，也只是一死。我们都欠上帝一死。”

“奥玛哈”登陆的目标，从原先一个宽 16 英里、纵深 5—6 英里的桥头堡减为现在的小小“立足点”，这是因为预见性不强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牺牲。“奥玛哈”地段的海岸态势使它成为一个明显攻击点。德国人在此重重设防，修建了许多能扫射滩头的坚固支撑点和战壕，在所有可能的出口处都布上了大量地雷。美国人是清楚知道这种威胁的。但在进攻开始日那天，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或许是由于缺乏洞察力，或许是出于不可触犯的民族自尊心，使美国人在“奥马哈”滩头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

实际上，早在 1944 年 1 月，即在艾森豪威尔刚刚接到任命后不久，就曾观看了各种专用坦克的性能表演。这些坦克都是霍巴特将军在他秘密的第 79 装甲师中研制出来的，用以克服在迪那普的两栖突击以及其它两栖突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有突破布雷区的扫雷坦克，有喷火坦克，有用来轰击钢筋水泥的大炮坦克，还有架桥坦克，等等，所有这些在霍巴特的“动物园”中应有尽有。但艾森豪威尔马上订购的只有一种，而当这个问题转给布莱德雷和他的参谋们时，他们却没有选中其它种类的坦克。尽管如此，美国人下定决心并付诸行动的能力，在艾森豪威尔处理水陆两用坦克（他订购了大量这种坦克）问题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图纸立即用飞机运往美国，第一批 100 辆水陆两用谢尔曼坦克在 6 个星期内运到了大西洋彼岸。

前面已经说过，我是个喜欢新式装备的人，在观看了霍巴特的表演后，我很快就领会了每种装备的特殊作用，这种作用在 6 月 6 日英国人登陆的滩头上得到了证实，1945 年 2 月，霍巴特的师扩编成英国陆军中唯一的全装甲

部队，一共 17 个团，21430 名官兵，1566 辆履带式坦克（一般的装甲师只有 350 辆），这是一场现代化战争，而且是一场颇带美国风格的现代战争。然而，富有想象力地运用这种多功能新技术装备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常常被美国人指责为谨小慎微、刚愎自用的人，是我和英国人及在英明睿智的席蒙兹率领下的加拿大人。

这些正是美军第 1 师在“奥玛哈”滩头所极其匮乏的武器。海上波涛汹涌，而登陆艇在离岸 12 英里之遥就下了水。这样，正如美国陆军部关于“奥玛哈”的战斗报告所说：“士兵们衣衫湿透。冷得发抖，挤在满载、狭小的登陆艇中，动弹不得，再加上晕船。弄得无精打采，哪有精神去应付那极其紧张的登陆作战。”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在离岸 4 英里之遥下水的 29 辆水陆两用坦克中，上岸的只有两辆，由于天空为云层遮盖，美国第 8 航空队的轰炸机不能像“犹地”滩头上空的轰炸机那样进行目视瞄准轰炸。虽然采用了导航飞机和仪表轰炸，但几乎没有炸中登陆滩头及其防御设施，却有很多炸弹扔到了内陆 3 英里以内的地区。这样，那些到了法国滩头的步兵实际上处于一种毫无防御手段的状况，面对着比他们预料的更强大得多的敌人，一筹莫展。原先，他们认为只会遇上力量薄弱的德军第 716 师的部队。5 月份，有迹象表明，实力较强的德军第 352 机动师正从圣洛向海边运动，但美国人认为不太可能。结果，6 月 6 日那天，德军第 352 师就在“奥玛哈”前线。这样，原来预想的一次成功的进攻很快变成了一场求生的搏斗。只是凭着官兵们拼死战斗的坚强意志，这场求生的搏斗才慢慢转化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这种坚强意志体现在第 1 师师长 G·A·泰勒上校的大声疾呼中，“在这块海滩上呆着不动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死人，另一种是垂死的人。让我们冲出这个鬼地方去！”最后，总算争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代价是 3000 人的伤亡。

英、加军队前线的情况稍好一些。大部分水陆两用坦克在步兵一上岸或上岸后不久就跟上来了，装甲兵工程师们也在第一次攻击波之后带着专用设备上来了，这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好处。尽管遇到一些困难和顽强的抵抗，这三个滩头都没有出现“奥玛哈”滩头上的情况。越过滩头的所有机械化设备，从一开始就几乎在全线投入使用，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

“工兵的一辆架桥坦克把桥架在沙丘上，第 22 龙骑兵团的三辆扫雷坦克从桥上通过，第一辆边扫边前进，当其在布雷场中前进了约 40 码时，一枚地雷在其履带下爆炸；第二辆由于机械故障停了下来，第三辆被铁丝网团团缠住再也不能前进。接着，德国人挖的一条 15 英尺宽、9 英尺深的反坦克壕挡住了去路。于是，登陆部队在壕中放人柴捆，一辆推土机开始堆土填平壕沟。壕沟的前面原是一道暗沟，其中水流奔腾，现在阴沟被炸开了，成了巨大的水坑。另一辆带着柴捆的坦克上去填坑，不料‘坦克滑进了水坑，渐渐沉没，露在水面上的只有柴捆。’坦克手们爬了出来，但未及浮出水面，就在敌人的迫击炮人丁死的死，伤的伤。另一些工兵用炸药炸开柴捆，把一座桥‘从大海方向伸过来，搭在当作桥墩用的沉没的坦克上，但是另一头还缺一大截，只好用圆木填补……’约在 9 时 15 分，第一辆水陆两用坦克过了桥，其余坦克紧紧跟上。然后是野战炮通过。但是第一门大炮‘由于判断失误，闹了个肚子朝天，……’三辆推土机连在一起也没有把它拉开，于是来了两辆‘阿弗雷斯’，几经周折，才把它拉开来。”

正是由于得到了这种支援，特别是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支援，在“戈尔德”

海滩登陆的第 50 师，虽然遇到了敌人顽固据点的激烈抵抗，还是努力在当天下午将其四个旅都送上了岸，并向内陆推进到离巴约不远的地方。在“朱诺”滩头，加拿大的登陆也并不顺利。那一天，他们的 306 艘登陆艇中有 90 艘受损。但对加拿大人来说，这里没有再出现类似在迪耶普的情况。尽管由于打开通道行动迟缓而导致海滩上交通堵塞，但加拿大第 3 师在装甲部队掩护下，终于取得了突破，并向前、向侧翼推进，直到该师的部分装甲部队抵达了当天的部分目标，即卡昂至巴约公路上的布雷特维尔—洛洛约斯和卡尔皮克，在其南面有一个很好的机场。

隆美尔在进攻开始日那天并不在诺曼底，而是在乌尔姆附近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准备去贝特斯加登谒见希特勒本人。他的参谋长斯派德尔将军在晚上隆美尔回来之前代他指挥。他的手下有 21 装甲师，当时我认为该师会部署在卡昂的东南，实际上该师的一部分已经运动至卡昂城内。上午 7 时，该师划归第 84 军，以协助其对付奥恩河那边英军第 6 空降师的机降。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在卡昂的南面，勒尔装甲师在沙特尔附近，但这两个师都作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而由希特勒直接指挥。龙德施泰特曾几次请求将这些装甲师投入战斗，但到上午 10 时得到的答复是：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可以向北进发，勒尔装甲师必须原地不动：没有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哪一个师都不得投入作战。到下午 2 时半，勒尔装甲师和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才获准开上前线，但这已为时过晚，直到半夜，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的先头部队还在卡昂的西南面。

德军这种指挥上的瘫痪状态使英军在左翼没有出现“奥玛哈”滩头那样的情况。结果，英军第 3 师虽曾在滩头上历尽艰辛，在展开时颇费周折，但还是摧毁了几个坚固支撑点，沿着海岸前出到乌伊斯特勒昂，到午夜换下了守卫运河大桥的空降部队。在南面，英军夺取了重要的佩里那山脊和其他要地、村庄，所有这一切都未曾遇到德军装甲部队的严重抵抗。即使当时就在现场的德军第 21 装甲师（拥有 127 辆马克 4 型坦克，40 门突击饱和 24 门 88 毫米大炮）也是分散各处，指挥失当。该师的各个营分布在奥恩河的两岸，88 毫米大炮在佩里那山脊，其他的大炮在卡昂城里或其周围，而坦克主要在法莱斯附近。一开始，两个战斗群被派到奥恩河东岸去对付英军第 6 空降师，然后又撤了回来，参加第 21 师向卡昂地区的大进军。但是，这一行动暴露了，遭到了盟军的边疆空袭。所以，第 21 装甲师师长福伊希延格在那天下午对原应被消灭在海边的英军第 3 师发起进攻时，他发现英国人早就摆好了阵势在等着他，能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在空中活动频繁。结果，德军反击失败。到当天晚上，第 21 装甲师只剩下了 70 辆坦克，而英军第 3 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距卡昂不足 3 英里的地方。

此时，我还没有上岸，但他们送来的这一天战果的粗略情况已使我感到满意。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已沿着一条长 24 英里的正面向纵深突入 4—6 英里。“奥玛哈”滩头的情况只能说明部分受挫。“犹他”滩头前景乐观。两个空降侧翼正在巩固。德国人的反应迟缓，再行抵抗也没取得什么结果。盟军掌握着制主权，德军的坦克如预计的那样彼牢牢地吸在卡昂。

进攻开始后的第二天，情况更是如此。这一天，东面侧翼所发生的一切与“坚韧”计划紧密相关，“坚韧”是一项巨大的欺骗性计划，它使德国人相信诺曼底登陆只不过是一次佯攻，这一假象在希特勒以下的德军高级指挥官的脑子里还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德军第 7 集团军只能单靠自己的力量作

战。本来能从第 15 集团军调过来的 5 个步兵师和 2 个装甲师还在原地未动。甚至第 7 集团军本身的坦克战备预备队也不能马上派上用场。虽然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和勒尔装甲师已投入战斗，但是党卫军第 17 师还在 200 英里以外，在卢瓦尔河以南；党卫军第 1 装甲师在比利时，而党卫军第 2 师还远在图卢兹。这样，德国人用步兵挡住美军而用装甲部队把英军赶下海去的貌似宏伟的战略，在奉隆美尔之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党卫军第 1 装甲军军长迪特里希看来已是纸上谈兵。他最多只能从第 21 装甲师和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勒尔装甲师在 6 月 8 日前还不能到达）中搜罗到 160 多辆坦克。他打算对杜夫尔—拉代利夫朗德的坚固支撑点发起一场协同进攻，因为这里是加拿大人和英军第 3 师之间的一个大空档，但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汽油短缺（这是德军在诺曼底期间一直存在的困难。主要的燃油储备位于第 15 集团军的地域中，由于铁路系统毁坏，燃料油只能通过公路在夜间运输。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很快就摧毁了一切与燃料油有关的设施）推迟了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的集结，等他们开始行动时，第 21 装甲师已与英军第 3 师激烈交战。第 12 装甲师也被加拿大人在卡尔皮机场发起的一次突击吸引了过去。原计划上午用 160 辆坦克向海边进行大突破，结果到这天下午，为实现这项计划而纠合起来的力量只有 17 辆坦克和一个步兵营，进攻势头大减，而且，此时英、加部队之间的缺口已经合拢。

实际上，此时我已经在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德国人随即调来的装甲部队就像预期的那样开往卡昂，并像预期的那样零零碎碎地投入作战。我利用吸引敌人注意其左侧的方法来大大支援其右侧，因为“奥玛哈”滩头的美军所遭遇的那股敌人并没有什么后备力量，现在，美军正以非凡的反击能力勇猛推进，将其狭窄的桥头堡扩大到敌人所扼守的地域以外。在科唐坦半岛的底部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在这里，美军也一直保持进攻态势，并夺取了地盘。而德军从布列塔尼半岛调集必要的预备队时却动作迟缓，而且，当这些预备队于 6 月 11 日开始进军时，又不断地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打击，前进速度很慢。

6 月 8 日上午，我上岸之后就我的战术指挥所设在了克勒里的一座古堡别墅的花园里。当我正式坐下来开始办公后。我发现战斗基本发展良好，我需要三个先决条件，一是将各个滩头阵地连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二是保持至今一直在盟军手中的主动权；三是在敌人积聚起足够的力量之前，在狭窄的占领区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政后勤系统。当然，我还在不断地考虑着另一个因素，这就是天气。丘吉尔曾这样说道：“天气，就像在半空盘旋的一只秃鹫一样，是一个威胁的因素……”

6 月 12 日，当盟军终于控制了一个长 50 英里、纵深 8—12 英里的地带时，我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从德国第 7 集团军电话记录簿上 6 月 9 日 17 时 30 分的一条记录中就可以看到这即将到来的胜利了：“在维尔河至奥恩河之间的地段将转入防御……反攻应推迟至一切就绪方可实施。”隆美尔的这一命令默认了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于 6 月 8 日在卡尔皮克击退加拿大人的打算已经失败，默认了于同一天到达巴约地区的勒尔装甲师已溃不成军。然而，这一反攻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反攻的计划已经到了西线装甲集群司令官盖尔·冯·施韦彭伯格的手中。十分不走运的是，他的司令部所在的位置被盟军发现，6 月 10 日晚，盟军的大炮精确地瞄准了它并发射了几十发炮弹，除盖尔外，几乎所有人员都被炸死或炸伤。而且，邓普塞已经得到了敌人可能

进攻的警告，他下令采取反措施，对卡昂进行一次空袭，并重新部署了加拿大部队。所有这一切使灰心丧气的德军认识到，他们远不是要发动什么大规模进攻，而是要准备迎击英军的进攻。所有这一切表明无论在士气上还是战术上我都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6月12日，桥头堡得到巩固，邓普塞开始贯彻我的意图。

这一次是美国人提供了机会，这也是对他们从“奥玛哈”滩头摆脱出来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能力的极好考验。这一机会是在他们的最左侧出现的。布莱德雷不分白天黑夜毫不留情地驱使着他的疲惫不堪的部队前进，到6月11日晚，美军就攻陷了卡朗唐，次日上午就进入了离“奥玛哈”很远的内陆地区的科蒙，到达了瑟勒河畔蒂伊西南几英里远的地方，即到达了第7装甲师彼勒尔装甲师阻滞住了的英军前线的右角。邓普塞的计划是让第7装甲师甩开敌人，并向西、向南朝科蒙运动，然后猛地折向东，快速通过维莱博卡日，插到德国人从奥恩河直到蒂伊及其以远地区建立的薄弱防线的后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条防线的后面敌人根本没有什么防御体系可言了。邓普塞这，一设想甚妙的机动很可能形成其后果不可估量的“两面包抄”。但是他选错了实现计划的手段。在这小树林地带的羊肠小路和树篱之中，沙漠战的专长对于第7装甲师来说毫无用处。在诺曼底根本不能得心应手。部队展开后阻力重重，其中一个纵队被阻滞在维莱博卡日，在一次与“虎式”坦克的激烈遭遇中损失了25辆坦克、14辆装甲车和14辆装甲运兵车。虽然第50师保持了对蒂伊的压力，并于6月19日夺取了该地；虽然前线其余部分一直在激战，特别是第51苏格兰高地师正在奥恩河以东激战，但十分清楚的是，第7装甲师缺乏足够的步兵向前推进。6月15日，该师撤回科蒙与蒂伊之间的地段。

虽然这一“挫折”不可避免地使英军感到失望，但比起德军司令部中笼罩的气氛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已在士气上彻底压倒了敌人，这一点生动体现在冯·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都同意的分别于6月11日、12日发给希特勒的报告中。他们的报告要点是：

“德国装甲师的主要打击力量必须用来进行防御，增援部队即使来了也应当不断地部署在防线上。”来自西线的更多的令人失望的消息促使希特勒决心于6月17日飞到靠近苏瓦松的马吉瓦尔，在一次高级会议上会见他的司令官们。对这些司令官们来说，这次会议毫无成果。不准撤退，不管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都不行；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允许，一个师都不能动；增援部队即将到达；不能让盟军突破，得把他们赶下海去。会议上的讨论（或者说是独白）完全是凭空想象、不切实际。希特勒在会议期间给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发去的一份电报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精神，电报说，挽回陆上局势的唯一办法是“消灭或打垮敌人的海军，特别是其战舰。”6月18日，我发出了一项新的指示，其中谈到：“我们现在必须占领卡昂和瑟堡，作为全面铺开我们的计划的第一步。”这是个老问题，但有一个新的重点，因为那时美国人已经拓开了一条横跨科唐坦半岛的宽阔走廊。我准备在奥恩河以东发起一场支援进攻，由新到达的第8军从侧翼进行主攻，即在莱兹河畔的布雷特维尔夺取卡昂南面的高地，控制进出卡昂的道路，来实现占领卡昂的意图。可是，我的运气不太好，那天下午英吉利海峡刮起了风力达30节的强大风暴，海上掀起了巨浪，一连三天不停息。在这一周里，英吉利海峡遭到了40年来最大的6月的风暴蹂躏。事故一个接一个，数不胜数。800艘舰船

遭毁坏、搁浅；两英里半长的钢制车道在拖曳中沉没；渡船、防波堤、仓库船，毁坏的毁坏，受损的受损……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英军滩头外的人工港（虽然还远没有建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了遇难舰船的避难所（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那些在美军滩头外的人工港基本上没有使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两项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处于准备阶段的时刻发生的，如果逐一列举事态的发展当然会令人厌烦，这里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按照登陆时间表，风暴开始以前英国第之集团军缺两个旅，但当风暴于6月22日变弱时，却缺3个师了。于是，我只好把向卡昂的进攻推迟，东面的支援进攻推迟到6月23日，关键的主攻推迟至25日。

6月末是诺曼底战役的重大转折点，6月30日那天，英国特遣舰队司令雅安海军上将和他的美国同行柯克海军上将相继出发前往英格兰，这标志着“海王星”行动正式结束，“霸王”行动计划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负责海边各个滩头的级别稍低的海军军官已撤走，在英国地段由“英军突击区海军将官”代替，在美军地段由“西线海军将官”代替，两人都常驻陆上，都是海军少将。这种从两栖作战向陆上作战的转变，标志着盟军对现已扩大了桥头堡充满了信心，另外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更加强了这一信心。这实际上表明我6月8日宣布的3个先决条件中的后两个已经实现。这3个条件是“把战役建立在绝对可靠的基础之上”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7月1日，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风暴而推迟至6月25日开始的卡昂南面大钳形攻势“赛马场”作战行动结束。这次作战没能按原先期望的那样夺取足够的地盘，但却完成了更为重要的事：它使德军装甲部队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在此前一天，美军在科唐但半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最终攻下了瑟堡的大要塞及其支援炮兵阵地。此后，盟军第一艘船、英国的一艘用来扫雷的汽艇大摇大摆地进了港。

这两件事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赛马场”作战以后，德国人再也不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发动真正的协同进攻（希特勒后来疯狂的莫尔但攻势除外）；第二，美军已夺取了瑟堡，从而可以一心一意地转而向南和向西进攻。

“赛马场”作战是英军在诺曼底的第一个大规模战役，因此理查德·奥康纳爵士中将参加这次作战是非常适合的。这位机动部队的杰出领导人在韦维尔指挥的非洲沙漠第一次攻势作战中，曾凭自己的指挥艺术与勇敢精神消灭了一支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意大利部队。后来，他在意大利当了战俘，现在他又回到诺曼底参加战斗，指挥刚刚登陆的第8军（下辖第11装甲师、第15苏格兰师和第34韦塞克斯师）。该军将是攻击的主力。从一开始就参战的第30军在最后右侧进行侧翼掩护，先夺取罗雷，占领罗雷—瑞维尼一线，然后向南推进。第8军的任务更重、更引人注目，它要从卡昂公路上布雷特维尔—治格约斯以西加拿大人早就建立的阵地开始打开一条通路，经过什窝直到奥东河，然后向东打到奥恩河，强行占领更多的渡口，最后站稳脚根，控制从南面接近卡昂的道路。对于一个刚刚组建的部队来说，这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在诺曼底的小路和树篱中前进尤其如此。有利的条件是：占压倒优势的空中力量、大量炮兵（第30军在右，第1军在左，共有700门大炮召之即来）、3艘巡洋舰和：艘炮舰，但最重要的是3个新编师的热情与能力。这3个师在这一次和此后的战斗中的表现证明它们都是第一流的部队。

简而言之，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第8军到战斗结束前只努力巩固了第一道河障——奥东河对岸的桥头堡，虽然再向纵深突进肯定会收益更大，但

争得地盘不是“赛马场”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所在。从这次战斗中德军日集团军群、装甲军和各个师司令官所发的充满悲观情绪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实际上，“赛马场”行动给德军所造成的威胁是：德军不仅用当地的装甲部队来守阵地，而且把远道而来的师也投入防御，这样就必然在防御中把为将来的反攻准备的预备队消耗掉了。在英军第8军和第30军所形成的突出部周围是德军第1装甲军、党卫军第10装甲师和第9装甲师（后两个师是刚从俄国赶来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主力）、党卫军第2装甲师、勒尔装甲师等组成的圆圈。党卫军第1装甲军是从布鲁日拼命赶来的；党卫军第2装甲师是从图卢兹长途跋涉而来的，路上遭到法国抵抗组织和盟军空袭的严重阻滞，到达时不满员，在英军前线还有德军第2、第21装甲师。这样，不受德军装甲部队纠缠的美军就能实施其战果辉煌的大机动。结果，美军未受到德军装甲部队的任何干扰就攻陷了瑟堡。在这些机动中，美国人比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要幸运得多，因为在6月的最后几天中，希特勒曾竭力敦促他的司令官们把重点移向西面。例如，6月27日那天，希特勒告诉冯·尤德施示特说：“元首坚定地认为，不要攻敌之强，而要攻敌之弱，即维尔以西，较弱的美国人在那里分布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当然，说美国人是弱点，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求将四到五个装甲师调离“赛马场”前线，只是由于他的现场指挥官们从实际出发才使这些师原地未动。即使如此，冯·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还是不得下于6月28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去向希特勒陈述理由。

军事争论的必然结果似乎不言而叫。在常人看来，这笔帐十分简单明了：当时，英军和美军已经登陆的部队大致相等，每家16个师。在英格兰待机而动的还有9个美军师、6个英军或加拿大师，在美国本土，更多的美军师正整装待发。最终美军将补充61个师，而英军最多只能补充20个师，然而，我还是按照我所认为是正确的战略，一直在诺曼底进行机动，把所有的德军装甲部队都引到本国部队（一支受损了就无法补充的部队）的对面。为此，当时和以后我受到了很多批评。

这些批评者不懂得，我这个人对于为一己之利去占领一城一地不感兴趣，对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出风头或在白厅的地图上留下令人赞赏的标记不感兴趣。我就像一名象棋大师一样，开局让棋，以一个宏图大略在胸的人的镇定自若神态，接受一次挫败。批评我的人和我的某些上级很快开始并一直吵吵嚷嚷要夺取那能赢得人心的一时的胜利。就美国人而言，这种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耍心眼、兜圈子，口头上称赞斯通沃尔·杰克逊，但实际上却追随格兰特，这不是美国军事思想的特征。

“每个人随时都应进攻”，这是艾森豪威尔的一种本能冲动。尽管他常常否认，但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真理解我的战略的那种迂回曲折又有远见卓识的特点。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拿下卡昂比拖住德军装甲部队更重要。直到1948年，当他出版《远征欧陆》一书时，他还写道：“登陆开始以后，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消逝，报纸对我们左翼缺乏进展特别表示不满。当然，我和我的所有高级司令官及参谋人员也非常关心卡昂附近的僵持局面。我们考虑过各种可能打破这一僵局的办法，我也曾一再催促蒙哥马利尽力加快他的作战行动，蒙哥马利在炮兵和空军的大力支援下，曾再勇猛地发动进攻，但仍未能摧垮德军的抵抗。”

艾森豪威尔的身边有几个怀疑，曲解我的作战动机的人，这使我的处境

更为不利。空军人员热切地希望在卡昂地区得到机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特德对此尤其心急火燎，而英国战术航空队司令坎宁安对我则几乎是持狂热的敌对态度。这两位空军将领在为他们的需求争辩时，竟歪曲了军事形势。例如，坎宁安6月14日说：“第7装甲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形势近乎处于危机。”后来，他又把英吉利海峡的大风暴说成是“左翼按兵不动的借口，而不是理由。”甚至在“赛马场”行动之后，特德还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反映了艾森豪威尔的如下看法：“英国第2集团军所实施的进攻最多只具有两、三个师的规模。”更有甚者，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现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的摩根将军迫不及待地评头品足，指责我为什么未能实施摩根及其计划参谋们原先主张的机动，即英军通过卡昂—法莱斯公路尽早向南突破。摩根的“蒙哥马利是不可救药的防御狂”的说法更是给舆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但是下表中所列的事实却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段时间里，在美军前线，德军装甲师最多时是3个，最少时还不到1个；而在英军前线，最多时是7个半，最少时是4个（6月15日，6月20日）。美军与之作战的德军步兵营最多时是87个，最少时63个；而在英军前线，最多时是92个，最少时是43个。

	美第1集团军 当面的德军坦克	英第2集团军 当面的德军坦克
6月15日	70辆	520辆
20日	210辆	430辆
25日	190辆	530辆
30日	140辆	725辆
7月5日	215辆	690辆
10日	190辆	610辆
15日	190辆	630辆
20日	190辆	560辆
25日	190辆	645辆

但是，比上述数字更加有说服力的是6月29日贝希特斯加登会见的过程和结果。冯·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书面请求希特勒给予他们放手自行处理战事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从希特勒的遥控作战指挥中解脱出来。“放手”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成有撤退的自由。两位陆军元帅这一趟旅行是为了让希特勒从军事角度了解西线德军处境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但此行毫无结果。他们所要求的灵活处置战事的权力根本没有得手，两位陆军元帅发现自己是在参加一次漫无边际的讨论，其间，希特勒空口许诺所谓“神奇的武器”，要求控制空中与海洋，喋喋不休地叙说他的观点，“我们不能让机动作战发展下去，因为敌人的机动能力远远超过我们。……因此，一切取决于我们把敌人限死在桥头堡范围内，建立起一条挡住敌人的战线，然后打一场消耗战，磨得敌人精疲力竭，不得不败退。”

冯·尤德施泰特和隆美尔空手而归，他们一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就收到最高统帅部于前天晚上，即6月29日发来的希特勒的最新指示，实际是重申贝希特斯加登讨论的内容。但尤德施泰特同时看到了另外两份文件，一份是来自第7集团军代司令豪泽（先前在俄国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他代替了6月28日死于心脏病的多尔曼）；另一份文件来自西线装甲集群司令冯·施

韦彭伯格。两人都主张向南撤退。冯·龙德施泰特立即自作决断，授权隆美尔准备从卡昂撤退，同时把这两份报告附上一封表示他自己完全同意的信发往最高统帅部——他的勇气确堪称赞。预料之中的回答带来了三个结果：7月1日，冯·龙德施泰特收到最高统帅部一封电报：“现有阵地必须固守。”翌日，他得知自己已经被解职；7月3日，被希特勒误认为是他的忠实工具的陆军元帅冯·克卢格前来接任；次日，冯·施韦彭伯格由埃伯巴赫将军取代。

我的策略已经导致我的两个最高级、最有经验的敌手由于认为我已给他们造成了军事上难以挽救的局面而被在战场上就地免职。隆美尔与他们有相同的观点，但鉴于他的声誉，难以在此时将他们免职。希特勒所不知道的是，隆美尔实际上参与了导致7月20日谋杀行动阴谋的准备工作，而十分了解以前几次阴谋的冯·克卢格此时也是一个身怀二心的人。切斯特·威尔莫特对冯·克卢格有过确切的描述：“从思想上说，冯·克卢格早就参加了反对派，只是他的誓言使他对希特勒仍保持着一种十分尴尬的忠诚。”

所以，在诺曼底战役的这一关键时刻，我比某些人更为清楚地看到，战斗正沿着正确的方向朝着预定的圆满成功发展；而“赛马场”行动最后一天（对美国人来说这是灾难性的一天）结束时凯特尔和冯·龙德施泰特之间著名的电话对话极好地概括了我的敌手们此刻的精神状况。

凯特尔：“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冯·龙德施泰特：“讲和，你们这些蠢才！难道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

前文已经介绍过我的登陆诺曼底基本计划。那一基本计划的基础是着眼于将敌人的主力吸引到英国第2集团军正面上——也就是我们的东翼，以有利于我们在西翼方面的进展。最后，运用美军第1集团军，在西翼一举突破。假如在西翼能够迅速推进，我们也便可以在那方面迅速占领有利的广大空间。

至于在东翼卡昂地区占领空间的需要，则不像西翼那般迫切。在卡昂地区的主要行动是以猛打恶斗迫使敌人运用他们的预备队，以减轻西翼的压力，而有利西翼军团迅速推进占领广大的空间。

卡昂地区的战略形势使这一计划受惠匪浅。卡昂是个铁路和公路的交通中心，是由东方和东南方面通达集结地的各主要接近路线的必经之地。因为德军机动预备队的主力是控制在塞纳河北岸地区，他们在遂行反攻行动时，必须经过卡昂才能接近我们的海滩桥头堡阵地。在卡昂西南方，介于卡昂和法莱斯之间，是一片极适于构筑飞行场的平原地带。我确信在卡昂地区有力而顽强的攻势行动，定能获取控制敌人之效果，将敌预备队吸引到我们东翼。我的作战思想正着眼于此，这也是最初我们一切计划的依据。一俟我们在岸上立足稳定，我便着手运目这项战略，等到卡昂地区鏖战完毕，我们开始扫荡瑟堡半岛的时候，这种有利的战略态势也已开始形成。没有任何理由，使我改变自己的计划，当然我从下拘泥于计划。

我在东翼方面的基本目标，是在卡昂东南布尔结卜余附近集结一支装甲战斗力强大的部队；这是牵制东翼敌军的关键性措施，凭借这一措施我们可以将德军装甲部队主力牵制在东翼，以有利于西翼方面美军的扩张。我们一直到第2军于7月18日以优势的装甲部队发起“古德伍德”作战时还不曾攻占这些高地。当这次装甲攻势因敌军顽强抵抗和因大雨地面泥泞不堪而阻碍行动时，我立即决心中止攻击。当我们发起“古德伍德”作战时，很多人都

认为那是由东翼突破，指向巴黎的开端，后来由于我中途变卦，以致“古德伍德”作战攻败垂成。其实，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由东翼桥头堡阵地实施突破的任何打算。英美两军人员间的种种芥蒂，可以说都源于这种简单基本观念的误解。艾森豪威尔于1945年7月13日，对盟军参谋首长战役详报的第32页里，就曾有这样一段因观念误解而导致是非混淆的文字：

“吾人因未能在东翼方面突破，从而未能向塞纳河挺进，吾人在卡昂地区所切需之高地，亦因敌军在该地区集中主力而未能如期攻占。然由于吾人之计划具有高度弹性，是以能充分利用敌军此种反应之好机，以美军由西翼方面之集结地区一举突破敌阵，而以英军及加军在东翼方面牵制敌军主力。蒙哥马利元帅于7月间，才以英军第2集团军对东翼方面之敌继续保持压迫，以抑留敌军主力于东翼地区。”

看到以上文字，任何人都会得到一种错误印象，以为由于英加两军在东翼方面卡昂地区的失利，美军才在西翼采取断然的突破行动。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对邓普塞和第2集团军存有这种错觉，可见他本人对自己同意的计划，还没有弄清头绪。

在诺曼底苦战过程中，我们从没有过由东翼直指塞纳河的任何企图。这从我下达的命令和训令里就可以看清楚。不过有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物，真正在诺曼底战场上负责实施战斗任务的高级将领，连布莱德雷一并包括在内，对于原定的作战计划，根本就没有任何怀疑或错觉。也正由于这种错觉作祟，才导致了許多不必要的矛盾与龃龉，那些在最高统帅部里不太喜欢我的人，也借机兴风作浪，制造纠纷。

我想，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之一，是“霸王联计处”的原定计划草案，在那个未定计划里，是预定在我们的东翼，由卡昂法莱斯地区打出去。可是，我拒绝接受这一计划草案，并且将作战构想加以彻底改变。而联计处负责人毛干将军这时又位居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的要职。在此公心目中，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神明的偶像；因为我曾批驳了他的计划，于是，他便意气用事。一切是非均由此种下。毛干和那些环伺在他周围的落魄“战备专家”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打击我的机会而苟苟营营地在艾森豪威尔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的思想是如何带有浓厚的守旧色彩，我们是如何下会在任何方面采取积极的突破行动！

毛干在这些风风雨雨中，更因空军人员对我的不满而越发振振有词。显而易见，当时空军所切需的，是在东翼卡昂那边的飞机场，而我却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因此，自然难免会有些空军将领借此机会指责我。另外，指挥系统的不健全，也是导致空军对我不谅解的症结之一。过去在沙漠时，“毛利”坎宁安和我是地位相等的搭档，他指挥“沙漠空军”，而我则统率第8集团军。等到的黎波里后他便被调到北非和亚历山大搭配，一直到我们1944年回到英格兰为止，我和他的部队携手合作过，但，当时我们已经不再是地位相等的搭档，我不仅在软帽上带着两个徽章，同时在头上也是戴的两顶软帽——一身兼诺曼底战场21集团军群总司令和地面部队司令官两大要职，因此我有了两个空军伙伴：一个是空军总司令李玛罗，另一个则是协助21集团军群作战的第二战术航空军司令官毛利·坎宁安。“毛利”对向卡昂东南地区推进他的飞机场这件事特别感兴趣，他们也曾在空军计划里提到过这些飞机场。对于他们，这些飞机场自然是事关重大，所以我也不怪他。可是，这些飞机场对于我却不是什么事关重大的东西。假如我们赢得诺曼底会战，不

要说几处飞机场，每件东西都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要知道我并不是专门为夺取飞机场打仗的，而是要在诺曼底打垮隆美尔。坎宁安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这是因为第一，我俩并不像在沙漠里那样天天碰头，我在这一个阶段的直接协调对手，是空军总司令李玛罗。第二，坎宁安所需要的是这些飞机场，目的是据以击败隆美尔，而我所需要的是击败隆美尔。同时顺便夺取这些飞机场。毛利和泰德是老朋友，他们曾在中东共过多年的患难。所以毛利的話，泰德很能听得进去——他们是一对优秀的空军将领。我想，泰德便因此受到毛利的影響，而使毛干在最高统帅部得到一个有力的盟友，一个具有他所缺乏的具有空战经验的盟友。

到7月中旬，新闻界开始显得不耐烦。在他们心目中，我们海滩集结地区，是笼罩在一种沉重的气氛之下。布莱德雷在7月上旬试探着向库塘斯德军阵地发动了一次冲击，但这次试探没有成功，接着我们又在卡昂地区发起了“古德伍德”作战。

“古德伍德”作战始于7月18日。作战企图很简单：3个装甲师将越过奥恩河，踏上东岸，然后向南打击。如果不清楚地了解该次作战地域上的目标，如果不确切地把握它和“眼镜蛇”作战之间的关系，就会对这貌似简单的作战企图感到迷惘不解。在7月10日的会上，我向邓普塞和布莱德雷解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7月13日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我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关系：“我将于下周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第2集团军定于7月16日开始行动，逐步发展为7月18日的大战，届时第8军的3个师将挥师奥恩河以东地区。请注意，日期从17日变至18日。第1集团军将用6个师的兵力于7月19日在圣洛以西约5英里发起猛攻。需空军全力支援第2集团军（18日）和第1集团军（19日）的行动。已见到科宁厄姆并向他陈述一切。”

对于像艾森豪威尔那样早就了解“霸王”作战计划的人来说，应该说这封电报已清楚说明了我的原始意图，这就是，由美军于19日开始发动一次突破，然后向内陆突进，而英军则于前一天发动一次强大的牵制性攻击。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是，要布莱德雷所部“像魔鬼一样拼命战斗，一天24小时不停，为你的装甲部队创造所需的机会……”。这说明，就连最高司令官本人也未能理解当时我的打算——一个精心制定的英美联合作战计划，后来，由于扫清战线的拖延，由于恶劣的天气阻碍了美国轰炸机的出动，“眼镜蛇”战役从19日延至25日方才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不明底细的人哪里能够恰如其分地看待“古德伍德”作战呢！从那狭窄的桥头堡出发，来一次闪电式的向内陆突进，使我的两个集团军跳出小树林地带，踏上法国起伏的大平原。所有那些不无道理地渴望得到这一消息的人自然会把“古德伍德”作战看作是英国人的一次失败，而把一周之后的“眼镜蛇”战役看作是美国人的一次胜利。

然而，“古德伍德”作战的目的不是突破，而主要是英军像磁铁一样吸住德国装甲部队的长期努力在另一种更为强有力的形式下的继续。扩张战果的事当然设想过，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将军都会考虑到利用意外机会夺取意外胜利的可能性。但是，“古德伍德”作战的根本意图和“眼镜蛇”的不一样，它不是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冲出去。对于这一点，我在7月15日给邓普塞的书面指示中又一次说得很清楚，该指示的第五段说：“3个装甲师应控制布尔日比—维蒙—布雷特维尔地区”（即卡昂南面的高地），摧垮敌人，而装甲部队应远远向南推进，直到法莱斯，使敌人惊慌失措、士气崩溃，并

应虚张声势。”这根本不是进行一次突破的命令。而且是诺曼底战役期间他所收到的我的唯一书面命令，是为“备忘”而写的，其他的命令都是谈话时或会议上口头下达的。

尽管我十分注意免遭误解，但还是被人误解了。

因为，我所遇到的反抗确实大得出乎意料，若要实现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必将引起一场大拼杀（这是隆美尔作为一个军人所取得的最后一次战果，7月17日，隆美尔在即将来临的盟军进攻前夕最后一次视察他的防务后，从埃伯巴赫的西线装甲集群司令部返回，他的汽车遭到了英国战斗机的袭击，撞到一棵树上。隆美尔的受伤将导致许多人的伤亡。虽然他活下来了，却再也未能返回战场，而是被怀疑卷入了7月20日推翻元首的十遂阴谋，于当年10月奉希特勒之命服毒自杀了。就在7月20日这一天，一场雷雨把卡昂周围的大地变成了一片沼泽，“古德伍德”作战也就此告终）。

在隆美尔的监督下，埃伯巴赫在这片将要遭到进攻的地区建成了诺曼底地区前所未有的坚固防御系统。两条铁路线由卡昂向东延伸，在从奥恩河东岸沃塞勒的郊区通往特罗阿恩的第一条铁路线北面，摆了两个步兵师，往南是装甲防御地带。由36辆“虎式”坦克的第21装甲师加上党卫军第1装甲师的一部分组成。第三道防御区在从长吊向东南通往维蒙的第二条铁道线上，由布满步兵和反坦克炮的十多个村庄组成，第四道防线主要由炮兵组成，包括布尔日比山脊和塞克维尔树林，然后向北穿过铁路直至特罗阿恩。此段的山脊村庄都修成了步兵的坚固支撑点。第五道防线离前方甚远，所以十分安全，由党卫军第1装甲师的45辆“豹式”坦克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更多的坦克组成。这样，整个战线上一共有3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拥有200多辆坦克，78门88毫米的大炮，194门野战炮，至少22具火箭发射器以及许多轻型反坦克武器和高炮。

虽然，该防御区德军的实力不弱，但与我们相比，他们还是处于劣势。我们所能动用的武器的数量大大超过德国人手中所有，在物质上德国人可以说是无法抵御的。光是第8军就有750辆坦克，在其左右同时作战的第1军和加拿大第2军共有350辆坦克。然而，盟军的真正实力在空中，这是德国人永远无法与之匹敌的。在“古德伍德”作战的第一下，盟军出动各种飞机4500架次，有这样多的飞机对这种规模的作战进行直接支援是前所未有的。轰炸采用新的方法进行，概略地说就是，装甲部队前进路线的两侧翼用重磅炸弹轰击，路线的近旁和前方的选定地域则使用小型高爆炸弹、杀伤弹和燃烧弹，以免形成弹坑。地面部队一旦需要，大批战斗轰炸机和带火箭的飞机召之即来。除此之外，7月8日向卡昂发动攻击时，海军的重炮亦将助一臂之力。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人有始料不及之感。在轰炸过程中，有些目标被灰尘笼罩，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不得不掉转机头，把炸弹原样捎回；其他一些选定目标也只部分击中，在未击中的地区往往有敌人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美国第8航空队投掷的1.3万枚100磅的炸弹和7.5万枚杀伤弹有一大半东飞西散，投错了地方。尽管这样，当第2装甲师过厂桥向前推进时，却发现敌人士气低落，这就出现了一阵虚假的胜利气氛。时隔不久，困难局面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了，7月18日上午9时，向前推进的坦克就超出了此时还困在西岸的支援它们的野战炮的射程。与此同时，出现了此后战斗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状况：桥上越来越拥挤，而在战斗第3天，特别是在卡尼、埃米维尔、弗

雷努维尔这几个村庄中，残存的德军坦克和大炮给英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整个上午和下午，情况更为混乱，第2装甲师和警卫装甲师只有个别单位向前推进。第7装甲师到日过中天还没离开桥，直到晚上，才有一个团投入战斗。据切斯特·威尔莫特说，在第8军军长奥康纳将军当天14时在战斗中间召开的会议上，第7装甲师师长厄斯金认为，“整个战斗是对装甲部队的莫大侮辱，似乎存心尽量不让他手下的坦克卷入这场大旋涡。”左翼的第1军进展甚微，连特罗阿恩都未越过，直到当晚还未占领该地，右翼的加拿大人情况似乎好一些，夺取了科龙贝勒那满是瓦砾的工厂郊区（这些工厂的烟曾是德国人很好的观察所），并扫清了敌人，沿着河东岸进发，拓出了一块桥头堡阵地，开始架桥。

此后两天，经过进一步激烈的战斗，英军只夺取了布尔日比山脊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德军的支撑点穿插其间，出击线也缩短了。7月20日下午，天空雷声隆隆，倾盆大雨把战场上由于轰炸和装甲碾压造成的厚厚尘土变成了一片泥潭。这样，奥康纳手下的坦克就不能行动了。第二天，加拿大人在其位于奥恩河东岸的阵地上打退了敌人多次凶狠的反扑。实际上，在7月20日这一天，隆美尔所负责设计的防御地带经受住了考验；在同一天，希特勒向其子民们宣布企图杀害他的阴谋已经失败，隆美尔后来也因涉嫌阴谋而丧生；也正是在7月20日这一天，“古德伍德”作战宣告结束。

由于人们对我的长远的和近期的意图的误解，也由于我在作战期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得高兴。“古德伍德”作战已经失败的消息引起了一片沮丧甚至失望，伴随而来的是某些早就对我不满意的人的不怀好意的怍头品足，说什么“我早说过会有这种结局。”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从我的文告中抽出“突破”、“广阔地域”这样至关重要的词语，以通栏标题刊出，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同样戏剧般的语调来报道这场攻势已经终止的战役。在“古德伍德”作战之后，“眼镜蛇”作战计划实施前夕（即实现战备突破的前夕），《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大标题是“盟军在法国全线受阻”。这典型地说明人们的误解和不顾事实真相已到了何等地步！

艾森豪威尔几时下知如何是好，这多半是因为他对我究竟要干什么完全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7月20日，艾森豪威尔到我的司令部看望我，第二天给我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确信，我们在重大问题上持相同见解。”在说了一通要注意身体健康以便能持续不断地狠狠打击德国人之类的老生常谈之后，艾森豪威尔接下去写了这样一段非同寻常的话：“你应继续令邓普塞保持其进攻势头……第1集团军要在全线快速投入作战以牵制住该地的敌后备部队，支援主攻。邓普塞亦应如此。……”

如果我也像艾森豪威尔周围的某些人那样脾气暴躁的话，面对这些老祖母般的忠告很可能会暴跳如雷。因为，从进攻欧陆开始至今，差不多所有德国装甲部队都压在英国人的战线上。此外，从布莱德雷发起进攻的7月3日到“眼镜蛇”作战推迟开始的7月25日期间，在英国人的对面又新出现了德国人的5个步兵师（271师、272师、276师、277师和326师）和1个新的装甲师（116师）；在同一时期内，在美国人对面出现的德军新部队只有1个步兵师和另一个师的部分兵力，再加一个众所周知已在英军前线被打得丧失了元气的勒尔装甲师。但是，我对这些婆婆妈妈的忠告和不怀好意的大肆攻击处之泰然。在艾森豪威尔下理解我时没有说过一句过头话。艾森豪威尔的这种不理解来源于他的那种“人人时刻都得战斗”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这种

想法最终体现在他的“辽阔战线”方针中。

当然，能这样婆婆妈妈、苦口婆心地劝说，也得归功于艾森豪威尔的良知。因为，尽管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其它地方，他可能听到过许多要他行使他的权力的呼声，而且，身为最高司令官，他可以到法国来从他这“不得力”的下级手中收回地面作战的指挥权；但是，他措词婉转，从未越过这个界限。在这些人当中叫得最凶的要数艾森豪威尔的副干特德，特德是空军上将，却总是显示出一种他知道如何指挥地面战斗的嗜好，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就此事说三道四，力劝艾森豪威尔快到法国来挽救局势，信的末尾还说：“作为您的一个直接英国下级，我希望我所表示的看法能对您有所裨益，能在您认为形势所要求采取的任何行动中起到某种帮助作用。”

艾森豪威尔曾于7月26日那天，在英伦和首相共进午餐。我不清楚他们谈了些什么，但艾森豪威尔在那天晚上给我一封信，信里有一段话，让我惶惑不安。从那段话里我体会到，在最高统帅部他的幕僚们中间，弥漫着一种对我鸣鼓而攻的情绪。原文如下：

“首相曾一再表示，深知阁下应了解，值兹主力攻势业经展开之际，当如何保持第一线之炽烈状况。”

当时，我感觉到艾森豪威尔可能已经在首相面前告了我一状，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后来听说，艾森豪威尔曾向首相表示他非常担心美国新闻界的舆论，因为美国报纸都一致在说，英军并没有尽到应尽责任，并遭受不应有的伤亡，他向首相表示，他认为在东翼方面的英军，能够而且应该有较积极的攻势行动表现；而实际上，英军却并不曾如此，他还引用伤亡数字的统计来证明他的说法。

他这一席话惹出了不少麻烦。第二天晚间，首相曾邀请了少数几个负责的人，和艾森豪威尔餐叙，我很快听到餐叙的内容。艾森豪威尔向大家抱怨，说邓普塞把一切战斗都一古脑儿推给美国人。当时便有人提醒他注意，我的基本战略方针是在我的左翼方面力战，以吸引德军主力，再从右翼方面一举出击。他们还指出，他已经批准了这种战略指导方针，而我也正是在按照预定的方针行事的；德军的装甲部队主力也已被滞留在英军正面上了。对这些雄辩的证明，艾森豪威尔自然是无法否认。然后他又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俄国人一样，在每个集团军正面，同时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在场的负责人告诉他：“德军在诺曼底的兵力密度，差不多要等于在俄国战场兵力密度的两倍半，并且，在和东线方面俄军百分之三百的优势相形之下，我们才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兵力优势。显而易见我们实在没有在整个战场下发起全面攻势的力量，类似的全面攻势，不但将正中德国人下怀，同时也不符合我们所协议的战略。我们已经于7月25日在右翼发起了突破作战，这是一次倾巢而出的攻势行动，而且正在迅速取得战果。英第二集团军正借助苦战恶斗，让德军在左翼方面穷于应付，无法脱身，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克竟全功，难道还有什么麻烦不成？”

接着又有人告诉艾森豪威尔，假如他觉得我没有依照他的意图遂行当面作战，那么，他便应该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他应该用命令行事，应该对我摊牌，应该明确地让我知道他的意图。艾森豪威尔显然是不好意思这样做。他们又问他，是不是要帝国参谋总长亲自出马帮他忙。艾森豪威尔是否有意请总长告诉我，他曾说了些什么？他是否有意请总长陪他去看我？艾森豪威尔对这些建议一概不曾接受。

减然，特德的别扭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和坎宁安对诺曼底登陆战严重缺乏前沿机场感到失望所致，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搞清楚，我一直是热烈拥护现代军事行动需要空中力量支援这一理论的，并且我在这次战役之中或之后从未因空军问题伤过脑筋。在我的《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这本书中，我对“盟国空军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是这样评价的：“盟国空军保持了战斗地域上空的全部空中优势，这样，终于使敌人在白天丝毫动弹不得。”当时曾在诺曼底呆过的任何人都可证实，上述说法并不是什么溢美之辞，要不是空军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多的车辆、物资和部队的调集实在是不可能的事。空军将领们对分配给他们的地盘不满足，他们也许希望在这拥挤的滩头阵地上得到更多的地盘，但是，事实上敌人在空中已没有立足之地。前面已经说过，之所以出现这一立场上的分歧，主要原因是坎宁安需要机场夫打败隆美尔，而我则要全面战胜隆美尔，同时顺便夺取飞机场。

发动“眼镜蛇”行动困难重重。首先，通过卡朗唐沼泽地带和圣洛附近的树篱时行动迟缓，代价甚高；其次，7月19日发起进攻未能充分利用“古德伍德”作战的成果；再次，迫使“古德伍德”作战结束的狂风暴雨天气也对“眼镜蛇”计划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因为直到7月24日，预定为这次进攻准备战场的轰炸机方能升空作战，准备在主袭后跟进的柯林斯将军的第7军队7月21日起就一直在等待进攻发起时刻。7月24日上午，当轰炸机终于来到时，目标区域上空却又浓云密布，战斗又一次推迟24小时，不幸的是，其中一个空军大队没有收到返回的命令，投下的炸弹离目标足有1英里，落到了美军第30师的头上。此时，布莱德雷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要求指挥官用极大的勇气来承受他麾下的士兵可能遭受的不必要牺牲。不久，真相大白，原来这些该死的飞机没有沿着划定的界线飞行，而是与之成90度角乱飞一气。当时在布莱德雷司令部中的利一马洛里向在英国的第8航空队司令部查核这件事。查核结果，情况属实，但他们是奉命这样飞的，布莱德雷甚感愕然，因为，5天前是他亲自到驻米德塞克斯的斯坦莫尔的第8航空队去安排轰炸计划的。离开该部队时，他确信飞机将按他的计划行事，沿着公路飞行。但现在事实并非如此，按照布莱德雷的计划，在其部队和轰炸线之间有条宽1200码的安全区。如果第二天就要发起进攻，重新安排这一切已为时过晚。布莱德雷下决心继续于下去。

7月25日突击开始时，轰炸更不精确了。第9师被炸，第30师再次遭殃，死伤几百人，其中包括非常能干的麦克奈尔将军。但是，布莱德雷的决心是正确的。因为第一轮轰炸已使德国人警觉起来，如再次推迟进攻，敌人将会加固圣洛的防御，“眼镜蛇”战役将失去在前48小时中所获得的冲击力量。而且，从广义上说。加紧实施“眼镜蛇”作战计划是明智的。对我持批评态度的人当时所不能了解的是，正是我为“眼镜蛇”作战计划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冯·克卢格已经惊慌失措。当初他来到西线时曾显得非常乐观，但他凭自己的经验很快产生了一种彻底的悲观情绪。他在听到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阴谋后，虽然立即向希特勒写信表示忠贞不渝；但他的悲观情绪是如此的强烈，使他接着写上了隆美尔的最后判断：“这场力量悬殊的争斗已接近尾声”，最后他又写上了自己的看法：“与卡昂附近各兵团司令官讨论之后，我已确认这条早已非常吃紧的战线行将崩溃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与此同时，“坚韧”计划还在继续起着欺骗作用，斯派德尔于7月24日从B集团军群发出消息说：“第15集团军所在索姆河以北到塞纳河地段甚受威

胁”（他以为盟军在英格兰还有42个师呢）。还说，美国人只是把战线推到栋夫龙—阿夫朗什一线，而英国人将通过法莱斯向巴黎突进。根据我的命令，加拿大第2军和第7装甲师、警卫装甲师于7月25日3时30分开始沿通往法莱斯的公路发起攻击，这更加强了斯派德尔的上述看法。我曾严格规定，不管“眼镜蛇”计划何时能开始，也不管天气状况如何，上述进攻必须在规定时间开始。

虽然“眼镜蛇”战役是一次以美国人力主的行动，但在准备阶段我却承担着全面责任，而且我在指挥布莱德雷时总是充满谅解精神，委婉从事。我默认美国人的指挥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下级一经领受任务即可独立行事。布莱德雷把我对邓普塞的种种“干涉”（对此“邓普塞知道如何不妒不怒地宽容忍受”）和承认美国军官所享有的“传统的独立行动权”这两种态度作了比较，说我“从不坚持追究我们军事行动的细节”。

从7月25日9时40分开始，3000多架重型、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对布莱德雷选定的圣洛以西的长方形地带进行了饱和轰炸，投下的高爆炸弹、杀伤弹和燃烧弹造成了惊人的破坏。勒尔装甲师实际上已被消灭，其司令官拜尔莱因活了下来并当了俘虏。他甲“月球上的景色”这个词来形容轰炸后战场上的景象。这个词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具有想象力，因为它使人联想起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布莱德雷也感到有些灰心丧气，因为他自己的部队经受了挨炸之苦，而由于部队伤亡和占领地带的性质又必须重新编组造成了战斗的拖延，那疮痍满目的原野上，公路上到处是“烧焦了的坦克残骸、士兵们断手断臂的尸中和腐烂发胀的死牲口”，但不管怎样，柯林斯的那个军毕竟突破成功了。到当天晚上，该军前进了两英里。7月26日，柯林斯将二两个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右翼的美国第8军和左翼的第5军开始成梯队向前开进。7月27日，敌人的抵抗全线崩溃。到30日，美军夺取了布列塔尼半岛的大门——阿夫朗什。德军防线一片混乱，连其后方司令官们也乱成一团。冯·克卢格不得不于7月30日亲自挑起德军第7集团军的指挥担子。第二天清晨，他在西线最高司令部对他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说：“这里的形势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事情已不可收拾。”一星期后，第7集团军司令送了一份“绝密”报告给德军西线最高司令部，详述了他所指挥的“第77、91、243、275师，265师一部，第352、353师，第5伞兵师，党卫军第2装甲师、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师”四分五裂的情况，其幸存者混杂在一起，东奔西散，流落在乡村中，成了法国抵抗运动的猎获物。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检查自己的计划。7月27日，我同布莱德雷和邓普塞会晤。我说：“其他一切地方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为着协助美国人的作战。”因此，我放弃了原先由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向卡昂和奥恩河以东继续进攻的打算，因为这里的作战已经达到目的，不大可能再有更多的德军师团上钩，当时，我们战线上的6个德军装甲师都摆在中间和东面。为了配合行动，我向令邓普塞在英国人战线的正西面从科蒙地区全速发动一次6个师的攻势。第二天，我获悉“眼镜蛇”战役进展的消息后，我命令邓普塞“加大油门向维尔挺进。”因为，德国人在美国人的打击下撤退时，他们首先会从科蒙开始向东，然后到达奥恩河的内陆河区，最后在卡昂和法莱斯之间的高地落脚。

邓普塞的进攻，即“蓝上衣”作战，于7月30日开始。它具有两个令人感兴趣的特点：第一、各级指挥都很内行，使这次战役能正常进行。正如《英

国官史》所描述的：“几乎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的每一个兵团都得马上调整自己的位置，立即出发，直到7月28日中午还未接到命令的第8军的一些部队不得不从奥恩河的另一侧撤出，沿着迂回曲折、拥挤不堪的道路跋涉四、五十英里，通过后方地域，还得十分注意保密。由于出色的参谋工作，良好的行军纪律，特别是由于拥有空中优势，7月30日发动进攻时一切都准时越过了出击线（也许有的部队是仓促领受战前指示，有点喘息未定）”。第二，如同在阿拉曼的“增压”作战和在马雷斯的钳形攻势左翼一样，一旦有突然出现的机会或遭到意外的挫折时，我能在战斗中很快地审时度势，重新调整部署。

“蓝上衣”作战所涉及的地域最为有利，称为“小树林”地带，北起科蒙，南至维尔，东到奥恩河畔的蒂里阿库尔。而且，此处中心地形起伏，丘壑遍地，最高的是海拔1200英尺的潘松山脊。邓普塞用以发动攻击的第8军和第30军，对敌装甲优势为三比一，但步兵所占优势不大。鉴于上述地形，虽然敌人士气低落，要取得右翼那样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好几个星期以来这一线相对平静，双方都布设了许多地雷场。因此，头两天中这两个军的情况大致相同，艰苦混战，险象横生，而且似乎有点得不偿失。然而也不乏顺利的进展，一夜之间第2装甲师在科蒙至维尔的中间、在苏勒弗尔河另一侧的贝尼一博卡日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并在这里与向英军右翼运动的美国第5军会合。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德国第21装甲师已卷入战斗，冯·克卢格根据埃伯巴赫的建议，调动党卫军第2装甲军来对付邓普塞的主要打击，即调来了党卫第9、第10装甲师，一个火箭炮旅，一个重型反坦克营。埃伯巴赫认为，不管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科蒙地段都具有决定意义。尽管有3个装甲师在手，但他还是怀疑科蒙是否能够守住，因此建议向塞纳河撤退。希特勒似乎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7月30日的会上下令成立一个德军最高统帅部特别参谋部，研究撤退的可能性，指明在法国撤退的中止线和要做的工作。与此同时，西线总司令却被完全置之局外，希特勒给他的命令是：“告诉冯·克卢格元帅，他的眼睛应当盯着前线，盯着敌人，不要往后看。”

8月2日，英军第2装甲师几乎进了维尔城，但第30军进展甚慢。同一天，遭到反击的第7装甲师差不多被迫退回到了18小时前据守的阵地上。这样是根本不能取得胜利的。第30军军长巴克纳尔曾受到邓普塞的警告“不成功就滚开”，这时被我撤了职；第7装甲师师长厄斯金连同他的炮兵司令、装甲旅长一起也被撤了职。巴克纳尔的去职与精悍的霍罗克斯的到来可以说是一个巧合。霍罗克斯在突尼斯负伤刚刚复原，于8月4日接管了第30军的指挥权。由于霍罗克斯的影响，第43师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8月6日占领了潘松山脊的各个制高点。同一天，美军终于拿下了维尔，英军第59师渡过奥恩河，在蒂里阿库尔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并打退了敌人的激烈反扑，守住了这个桥头堡。为阻挡德军撤退，我计划夺取三个“关键地点”，现在两个已经到手，正在向第三点顺利前进，但就在这时候，美国人和希特勒却为我增添了许多烦心的事。

对于巴顿将军来说，1944年8月1日是个伟大的日子。巴顿深知他在西两里的“打耳光事件”给自己带来的损害，他心急火燎地希望有个赎罪的机会。当7月20日阴谋杀害希特勒的消息传来时，他大吵大嚷地找到布莱德雷。说他担心战争突然结束，要求在此之前有个参战的机会，就在诺曼底战役发

展到让巴顿可以大展奇才的时候，他接管了美国第3集团军。布莱德雷原先的计划是，在夺取阿夫朗什之后用巴顿的集团军扫荡布列塔尼，包括其所有的港口。然而，布列塔尼此刻除了一些港口之外已经支离破碎。布莱德雷与我和邓普塞会商后，于8月3日发出了新的指示，要求巴顿用“最少量的部队”夺取布列塔尼半岛，而把他其余的部队向南、向东突击，扫清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然后按我的指示所说的，“横扫小树林地带以南地区。……”对巴顿来说，这真是梦寐以求的事。据他自己回忆说，他立即着手进行“这一看来不能做但却做成功了的事”。阿夫朗什大桥那边只有一条公路，白天黑夜都处于德国空军的定期攻击之下。巴顿在72小时内已将其7个师通过阿夫朗什和这条公路，这样的前进速度一直保持到他的前卫第15军冲过开阔地带。到8月7日，巴顿的部队差不多进了勒芒，从而贯彻了我在8月4日的指示中所宣布的精神：“人人心须整天全力以赴，天天全力以赴。”但是，8月3日清晨，希特勒以恰好相反的目标下了一道命令，这对可怜的冯·克卢格是一个致命打击。冯·克卢格曾在阿夫朗什陷落之后立即向德军最高统帅部作了报告：“整个西线已被冲开。”尽管如此，现在希特勒却命令他收缩德军第7集团军的战线，并只留步兵把守，用集中起来的装甲部队，加上大大夸张了的增援部队，取道莫尔坦发动一次反攻，以夺回阿夫朗什咽喉地带。在希特勒所有愚蠢的军事指挥中，这可算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设想，其执行者也未白费力气。据说，德国第5装甲集团军（重新命名的西线装甲集群）的司令官迪特里希为此与冯·克卢格争论了整整一个小时，列举种种正确的理由，把上述计划说得一钱不值。冯·克卢格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这是希特勒的信念。……”

用布莱德雷的话来说，莫尔坦的攻势是“敌人付出了一个集团军的代价，而我们取得了整个法国。”

长话短说。8月7日凌晨敌人开始反扑，先冲过来的敌人坦克意外地（就像在此后的阿登战役中一样，袭击了正在“休整”之中疲惫不堪的美军第30师。该师顽强坚守，其中的一个营被敌人切断、包围，连续战斗6个昼夜，直至解围。而冯·克卢格为这次关键性作战拼凑起来的4个装甲师却没有前进多少。布莱德雷表现得十分冷静，特别是他在最初的日子里估量阿夫朗什以南的12个美军师会不会被切断后路的时刻更是如此。他没有贸然采取紧急措施，而是不慌不忙地挡往陪同人，包围它、挤垮它。与此同时，盟国空军对敌人进行了无情的轰炸，天遂人意，这些日子天气也分外晴朗。也许，对希特勒计划最轻蔑的评价是，它一刻也没有挡住巴顿的前进。是的，这是因为巴顿前进得太远、太快了，他的第15军现在已从勒芒向北直指阿朗松。这样，希特勒开始关心起B集团军的后侧来了。希特勒于8月15日允许冯·克卢格从莫尔坦作一“小小的撤退”。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拙劣补救办法毫无用处，因为冯·克卢格没有可以就近依托的稳固战线。一天以后，巴顿给布莱德雷打电话说，“我的部队已经进入阿让唐，让我前进到法莱斯，我们要把英国佬赶下海去，让他们再尝一次敦刻尔克滋味！”一个集团军司令在同他的集团军群司令谈及一个忠诚的盟国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典型的巴顿风格。这当然不是什么开玩笑，而是带有侮辱性的。因为，当巴顿的坦克烧着汽油沿着宽阔的公路向前飞奔，掠过防护甚弱的村庄时，在北面的英国人，特别是加拿大人，一直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凶狠的抵抗作斗争，这是巴顿在梅斯和萨尔碰上防御工事之前所未曾经历过的。在那

儿，已顿才发现了固定防御设施的重要意义，在一个月之中，他的集团军伤亡达 4.1 万人，相当于整个 21 集团军群从进欧陆开始日至 8 月底总伤亡人数的一半。

在这场被美国报纸称为“史无前例”的“大捷”中，英军担负的确实是一项默默无闻的任务，所以最后在美国报纸上，竟大吹大擂地认为是美军的一次空前胜利。对于这些是是非非的新闻报导，我们虽然可以不置可否。但是，我们都清楚，假如没有英军第 2 集团军在东翼方面的成就，则美军一辈子也没有办法从西翼打出去。诺曼底战役是根据英军的战略打的，这次战役之所以能克竟全功，完全是由于能有参战部队——英军和美军的“第一流”协调合作。但是，就在最后胜利在望的当儿，一股谣言在英军各部队传开，说是最高统帅埋怨我们英军，没有在作战中使出应出的力量。从那时起，直到大战结束，在英美两军之间，一直有一种感情上的鸿沟。

我一直都很清醒地认识到，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是南辕北辙，貌合神离。我的军事原则的基础是如何使敌人在广大正面上运用他们的预备队，以便能在他们的防线上凿出若干罅隙；然后，再于狭窄正面上投入我本身的预备队，对之加以雷霆万钧的一击。我每次使用了预备队后，总是迅速编成新的预备队，在我看来，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将领们，根本就下懂遂行作战时的均衡原则。我是由 1940 年以后的历次战斗中体验领悟到这项原则的重要性的。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教条，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必须采取积极的大胆的行动。每个人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攻击。有一次，比德尔·史密斯曾将艾克比喻为一个足球教练；他在球场上不停地跑来跑去，鼓励每个球员加油。可是，这种方法的伤亡代价却相当高昂。试看，截至 8 月 11 日止，诺曼底会战接近尾声时的伤亡总数：

英军 68,000 人
美军 102,000 人
总计 170,000 人

类似在军事思想方面的分歧，自然会被我那些在最高统帅部里的批评家们用以制造纠纷的日实，我时常想，挑唆艾森豪威尔于 7 月 26 日向首相埋怨第 3 集团军不好好打的可能正是这帮家伙，类似的行径对于盟军的团结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最令人感到惋惜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无须喋喋不休地争长论短，因为胜券已经在握，下出几天我们便可稳获辉煌的胜利。

诺曼底会战在 8 月 19 日结束，我们在这天全歼了莫尔坦包围圈中的残敌，这次战斗干净、彻底，可以说是一次典范。它的胜利具有历史性决定性意义。

诺曼底会战中敌军伤亡情况如下：

集团军司令官、军长、师长 阵亡或被俘 20 人
集团军团司令官（隆美尔、郝瑟）2 人
最高指挥官 负伤冯·龙德施泰特冯·克卢格
消灭或重创的师 约 40 个

全部敌军伤亡损失：很难正确判断，可能在 300,000 名左右。但据若干德方当局统计，则尚不足 200,000 人。

虏获与摧毁的大炮 3000 余门
摧毁的战车 1000 余辆

我实在不愿意用恶言恶语来结束这一章。为了在诺曼底发生的许多事情，我竟一再成为受气包，为千夫所指。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件是非制造者竟是我战术指挥所里的一位参谋。在他的指控下，我不但纵容部下滥施劫掠的暴行，而且连我本身也曾直接涉及这种暴行。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的始末是这样的：

帝国参谋总长曾在7月底接到外交部一封正式公函，说是根据某些私人报告，在诺曼底曾发生过英军部队劫掠的暴行。外交部要求军方应加以调查和纠正，因为法方对于这种情形深表不满。我接获陆军部的训令后，便立刻采取行动，和驻在集结地区里的戴高乐将军的代表库雷先生碰了个头。他在调查后通知我，他们根本不曾受理过任何类似的控诉案，并让我放心，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无中生有的诬告。但我觉得无风不起浪，我想来想去，在伦敦散播谣言的人，可能是被我由指挥所免职的一位上校。7月上旬，有一位侍从参谋用左轮手枪射击一头闯进我帐篷而又抓不到的猪。在猪主提出申诉以后，负责调解那件杀猪案的便是那位后来被我免职的上校，案件处理的结果是猪主得到赔偿，死猪则分给战士们打了牙祭。

后来，有些属于我联络参谋组的军官也被那位上校指控，说他们曾在往返前方地区的旅途中，一路搜刮民间牲口。法国农民们都已经离开他们的田庄，所以鸡兔之类的家畜，全都在野外到处乱窜。

这位上校来向我报告这件事。当时正是我苦思冥想会战指导的紧要关头，问了问案情的原委，便教他向参谋长报告。他居然当着我的面唠叨个不休，言外之意是我本人也个能摆脱这件事的干系。我听着特别烦，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让他马上把那位上校从我的战术指挥所里调走。当他于7月间回到伦敦以后，紧跟着便开始流传一些莫须有的故事，并且他还向陆军部送呈过一个专函报告。

当代于战后就任帝国参谋总长时，曾调阅过有关的案卷。位堂堂的野战军总司令，竟被他自己的参谋控告以劫掠之罪，这真是战争历史上的空前奇闻。

第九章 坐失良机

光复巴黎、挺进第三帝国
巴顿是一个“抱着球跑的队员”
第一批 U—2 导弹倾泻英格兰
安宁会战
冬季来临，盟军面临消耗战
愚蠢的记者招待会
巨大的牺牲迫使艾森豪威尔把两个集团军交我指挥
痛失良机

1944 年 8 月中旬，德军在法兰西境内已危如累卵。

8 月 25 日，巴黎光复。在最高统帅部第二天所颁发的情报摘要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 历经为期两个半月之浴血苦战后，德军已渐不支，欧洲战争之终结已在弹指之间，唾手可及。西线之德军已支离瓦解，巴黎已重属法国，同盟大军上向第三帝国之边唾疾驰挺进。 ”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大战的结束，毫无疑问，已在“唾手可及”之间。但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迅速的决策，尤其需要一个计划。可就我所知，我们却毫无计划。我们已经在“诺曼底会战”期间，几乎将德军在法境内所有的师，牵制在我们正面，我们已经迫使敌人在塞纳河以南决战，并将他们彻底击溃。这场战争虽然起了重大的决定性作用，但我们必须乘势扩张战果，才能取得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计划，在诺曼底最后阶段的战斗完成以前，我就计划去拜访布莱德雷，以争取他的支持。8 月 17 日，我到布莱德雷将军的司令部去看他。和他见面以后，我便将以下的计划大纲提出来和他讨论：

1、第 12 与第 21 两个集团军群，应于渡过塞纳河后以所属的 40 个师之雄厚兵力结成一无畏之强大兵团，并肩向东北挺进。

2、21 集团军群于西翼方面，随处扫荡海峡沿岸、帕德加莱与西弗兰德斯，并进出于此境安特卫普与荷兰南部地区。

3、第 12 集团军群应构成一挺进运动之东翼兵团，以其右翼进出亚尔丁地区——向德境之亚深与科隆挺进。

4、巴黎将成为此一大规模挺进运动之枢纽。美军应于奥尔良——特罗伊——沙龙——里姆斯——拉安一带配置强大兵力，以其右翼依托于罗亚尔河至南。

5、由法国南部北上的“天龙兵团”将向南锡与萨尔地区挺进，我方切忌延伸右翼，以免陷入不均衡状态。

6、此一大规模挺进运动之基本目标在于：在比利时境内建立一强大空军基地；于入冬前占领有莱茵以及河上之各桥头堡；迅速攻占鲁尔区。

这也正是 1914 年德军‘史蒂芬计划’的逆序型，所不同的是这一逆序计划的打击对象是溃不成军的残敌而已。这一行动的成败关键是盟军在左翼方面兵力和支援物资的高度集中。布莱德雷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艾森豪威尔于 8 月 20 日在诺曼底他的前进指挥所里召集了一次参谋汇报会，证询各级幕僚人员有关未来作战指导问题的意见，我的参谋长也应召出席。在那次会上，曾达成了某些一致意见，内容要点为：

- a、9月1日起，变更指挥系统，由艾森豪威尔亲自负责集团军的指挥。
- b、第12集团军群的攻势应指向麦次和萨尔地区，在那里和“天龙兵团”会师。

会后，最高统帅部的幕僚们便开始起草下达给我的训令。戴君干曾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在采取行动之前最好能先和我商量一下；艾森豪威尔当即同意照办，他便连夜赶回我的战术指挥所，向我报告开会的经过。

我因为不同意艾森豪威尔在那次会议上的决策，于是，便又派戴君干回去，向艾森豪威尔当面申复。8月22日，他根据我交给他的有关问题的要点，和艾森豪威尔足足谈了两个钟头，试图说服他采纳我的意见。他呈上我交他代转呈的意见书，并告诉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已经在8月17日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计划。以下便是我的意见书内容：

争取此次大战胜利之最迅速途径在于使盟军之强大兵团锐意北进，扫荡直达安特卫普的沿岸地区，在比利时境内建立一强大空军基地并进入鲁尔区。

此一挺进兵团必须以井然有序的态势遂行紧密协调有力的行动，方能迅速达成使命。

地面作战的单一掌握与指导为奏效的唯一要诀。此次作战应由一人自始至终负责。

法国西北部的辉煌胜利即在此种统一指挥方式下取得。唯有此种指导方式，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如果放任各部下自行作战，则必将使我陷入持久战。

在刚取得辉煌胜利的情况下，变更指挥系统易动摇军心。

戴君干回来向我呈复说他和艾森豪威尔的谈判完全失败，于是我便决定亲自和他碰头。我请他到我的指挥所来和我一起吃中饭。他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和艾森豪威尔碰头以前，特别急于先和布莱德雷再谈谈。这时，他的总部已搬到拉瓦勒，我在8月23日清早，便飞到那里去首他。见面之后，我才发觉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布莱德雷已改变了初衷，他力主他那个集团军群的主攻方向应该向东指向麦次和萨尔。于是，我便默然赶回指挥所，去等候艾森豪威尔，他带着比德尔·史密斯按时应约前来，自从我于6月6日夜离开英格兰以后，这还是第一次和比德尔见面。

我请示艾森豪威尔，是否可以和我单独密谈一下，因为我希望他能就某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们足足谈了一十钟头。我先就如何迫切需要一项健全而坚定的计划陈述我的观点，然后向他说明，他必须决定主攻究竟要指向何方，以及我们必须在主攻地区确保强大的兵力，才能迅速获得决定性胜利。接着我又就后勤支援情况向他做了一番提纲挈领的说明，告诉他我们的兵力部署马上就要形成极度伸张的状态，我们必须把油弹集中在他所选定的挺进轴线后方，假如在整个正面上平均分配，则无法形成决定性打击点。然后，我才提出我自己的计划，在地图上向他加以说明。我已将计划的细节都画在地图上，所以能一目了然。

我强调，假如他采取宽正面的战略，全线一齐向前挺进，让每个部队都遂行从头至尾的战斗，那么这种挺进一定不会发生效力，一定会予德军以喘息的时间，那么大战一定会拖到冬季以后，一定会拖到1945年。

我还告诉他，以他身为最高统帅之尊，实在是不该事必躬亲，亲自指挥地面战斗，变成地面部队总司令。最高统帅一定得高高在上，客观而冷静地

洞察全局，控制全局。因为这将涉及到陆、海、空三军的运用，民事行政的掌握，以及政略问题的处理等等，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他手下必须有一个替他指挥地面战斗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在诺曼底赢得辉煌胜利，完全得力于战斗掌握的一元化，我向他郑重表示，这一点事关重大，切不可等闲视之，假如问题牵涉到美国国内的舆论，那么，他可以让布莱德雷负责地面战斗的统一指挥，我一定会欣然接受他的指挥。

经过更进一步的商讨，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了我的看法，认为在没有协同的情况下，21集团军群确实无法独力遂行向北挺进的行动。他同意无论我需要美方的哪种协助，他一定照办不误。他也同意向北挺进的作战必须由一个指挥官负责统一协调与指导，而这一个指挥官就是我。

我向他表示，希望能有一个至少以12个师兵力编成的美军军团，在第21集团军群的右翼方面挺进。他说，假如这样做的话，那么在第12集团军群的指挥之下将会只有一个集团军，并且一定引起美国国内舆论的反对。

我问他为什么让舆论左右我们的决心，逼我们采用明明是不健全的决策。当时我太急于让他采纳我的计划，而不曾充分考虑到他所肩负的政治责任。为采取我的计划，他势必要喝止正抱着球跑的队员——巴顿和他指挥下的美第3集团军。今天我还时常巨躬自问，反驳艾森豪威尔的看法和做法之前，我是否曾就他的看法和做法作过充分的考虑呢？这一点我确信我做到了，无论怎样，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听着。艾克是我的沙漠老友之一，对他在那次会谈中所表现出的耐性和容忍，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是，我的慷慨陈词依然没发生作用。“宽正面战略”势在必行，向左翼方面挺进，以支援21集团军群行动的第12集团军群，仍然要将主攻指向东方，指向麦次和萨尔地区。我被授予的权力是21集团军群和第12集团军群左翼间的“作战协调”；至于“作战指导”的字样，则在训令里予以删除。但是，当艾森豪威尔于9月1日直接指挥地面大军的时候，却又在另一项训令里规定：第12集团军群应使在我右翼方面对萨尔作战的部队，能获得“切实的后勤支援”。

于是，我们都准备在各自为战、观念相左的情况下，开始北渡塞纳河的作战。

乐观的气氛弥漫着前线，指挥的鞭子划得空气嘶嘶作响。最高统帅驱使全线一齐向前推进，使每个部队都遂行彻头彻尾的战斗，但是，我们都苦干没有一个基本计划，把我们捏在一起。我们的战略这时破绽百出。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英军曾经一再以事实证明：当时机来临时，他们绝不会落后，过去如此，现在仍将如此。但是浓厚的疑惧阴影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根据我所受的军事教育与体验，我意识到，这次我们将占不到便宜，接下来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严冬苦战，英国人将吃尽不必要的苦头。

在我陷入这些纠纷和失望的深渊的时候，8月31日晚上，我接到了首相一封信，“兹特欣告阁下，经余签请保举，陛下已钦定晋升阁下为元帅级，生效日期为9月1日。此种殊荣，系酬懋阁下在法兰西此一决定性战役中所建之卓越功勋者。特此奉闻，并遥申贺忱。”

后来，曾在当时任国王私人秘书的拉塞勒斯爵士告诉我：首相于8月底从意大利回到英伦后，便遵医嘱住院疗养，因为当时他曾经发高烧到103华氏度。8月11日早晨，国王在拉塞勒斯爵士侍从之下，亲临史托雷门医院的特别病房探望卧病中的首相。当时，首相的精神相当好，身上穿着一件东方

式的浅蓝色晨褛。国王进入他的病房后，他便拿出预备好的签呈，请国王批示签署，国王当即拿起床上的枕头当桌子，将公文放在上面一挥而就。一位英军将领在阵前晋升元帅的人事调整大事，竟是由他的元首伏在首相的枕头上签署的，这真可以说是种闻所未闻的佳话。

这是在大战期间我在敌前的第二次晋升。第二天，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里，便公布了这一消息。我立刻便接到艾森豪威尔一封恳切而热烈的贺电。

当我想到我们马上就要动手做些什么的时候，就越发肯定地认为这件事不对头。以当时英国的经济和人力状况而言，我们很想在 19 川年内争取大战的胜利，不能再拖。同时，在不列颠的老百姓们已经受够了战争的折磨，这场大战“必须”赶紧结束才行。可是，我们的“必须”和美国人的“必须”又截然不同：不但在迫切性方面不同，就是在原则理论方面也迥异。对于这一点，美军将领们是不会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国土家园里从没遭受过兵燹之灾。为什么我们为了顾虑美国人的舆论，为了成全美国人的大选（1944 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竟不惜让我们的百姓再受战争之苦？让我们的官兵更多地流血牺牲？这一点真令我大惑不解！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战略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伤亡。将大军展开在广正面上的战略没有任何基于安全着眼的理由；我们的南翼已经相当安全，甚至可以只靠空军以极有限的地面部队作掩护，就已固苦金汤。纵使“天龙兵团”的北上行动一事无成，至少掩护我们南翼安全的目的可以达到。我所建议的行动可以说没有任何冒险，悦句实话，唯有采用我所拟议的计划，才能把握住迅速结束大战的唯一机会。

根据我派驻布莱德雷总部联络参谋的报告，在我右翼的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支援的优先权。艾森豪威尔计划两支部队齐头并进，一支指向鲁尔，另一支则指向萨尔地区。也就是说每一件东西如兵力、空援、供应、输送、车辆等等都要分成两份。他竟完全将“集中”的战争原则抛诸脑后了。

艾森豪威尔将他的总部设在瑟堡半岛西岸的格兰维尔。这个地点可能是恰当的最高统帅所在地。但对于地面部队指挥官而言，却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身为地面部队指挥官的人，一定要随时将他的手指按在他指挥下大军的“脉搏”上，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情况，迅速下当机立断的决心。而现在，他的位置却还在远离第一线 400 英里的后方。并且他总部的通信机能又糟得无以复加。在他的总部与布莱德雷和我之间，不但没有开设有线电话通信网，甚至连无线电话联络都难以保证。事实上，他在 9 月上旬竟全然和地面战斗绝缘。

我决心再做一次努力，设法让艾森豪威尔采用一个健全的计划。9 月 4 日，我又给他发了封电报。

事实上，此时发出这封电报，几乎无法应付当前的事态。向萨尔地区的挺进这时已经发动，巴顿也已经得到为进迫麦次所要的一切。在我右翼方面的美第 1 集团军也已在掩护巴顿的挺进，无法依命令行事，同时给我以适切支援。但是，假如此时我们能“立刻”得到一项决策，则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艾森豪威尔于 9 月 5 日接到我的电报，并在当晚 7 点 3 刻给我复电。因为在格兰维尔他前进指挥所里的通信机能太差，所以他的复电是分成两段发到我指挥所的。我于 9 月 7 日早上 9 点钟先收到第 3、4 两节，第 1、2 两节则在两天后的 9 月 9 日早晨 10 点一刻才迟迟发到！

我接到复电的第二部分后就已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所需的决策。因此，

我便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9月9日，我接到来自伦敦的消息，说是德军的第一批“V—2”型导弹已经在头一天纷纷落到英格兰。他们判断德军的导弹基地可能位于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附近，并问我能在什么时候攻下这一带地区。这一问题的介入，无形中便决定了我横渡缪司和莱茵的挺进方向，我必须向安亨挺进，才能解决攻占导弹基地的问题。邓普塞和布朗宁两人于9月20日清晨再度联袂前来见我，交换有关向安亨挺进作战问题的意见；但我清楚得很，供应支援状况将是决定挺进开始时机的重要因素。

艾森豪威尔接到我电报的第三天即9月10日下午，翩然飞来布鲁塞尔。泰德同行，因为他腿伤未愈，行走不便，所以我们就在艾森豪威尔的专机里作了一次会谈。

我首先将自己所面临的状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我告诉他，德军的“V—2”型导弹已经开始袭击英格兰，以及这些导弹发射基地的位置可能在哪些地方。他说，他一直念念不忘向鲁尔地区挺进和向北路方面的进击，以行成优先，现在终于办到了。我马上告诉他，这一点还并不曾办到。他说：“我所指的并不是‘绝对的优先’，而且我也决不能紧缩向萨尔挺进的行动规模。”我告诉他，我们的供应支援早已青黄不接。当前的情况已非常清楚，如此势必必要给予敌人以更多喘息的时间。自从横渡塞纳河以来，我的总部便一直向北推进，而布莱德雷的总部则向东移动。全盘地面作战已经发生了痉挛和脱节现象。我郑重强调，假如他继续实施两支大军同时挺进的行动，平分支援力量，则两方面的挺进不会有效。我还特别提醒他，我们还不曾攻占的安特卫普以及通达这个港口的所有接近路线部位位于左翼挺进轴线的后面，关于这一点，我早在8月23日就已向他据理力陈——而这已经是远在3个礼拜以前的事情。当前我们所能抉择的，只有两个可能的计划——布莱德雷的和我的。他必须两者择一，倘若他对两者都予以支持的话，我们将不可能迅速取得任何决定性成果。打通到安特卫普路线的最便捷途径便是支持我在左翼集中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有助于我们后勤供应状况的改善，同时还可以对在最重要地区里惊魂未定的德军继续保持强大的压力。因而将有利于大战的迅速结束。我必须使他了解我的观点，而有关应采取行动的决策，则是他的权责。显而易见，他对我这番分析完全不同意，他一再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先行近逼莱茵，并在广正面上渡过莱茵河，然后才能集中一切力量于一个挺进的前头上面，那天，我们便如此毫无任何明确决策地分了手。假如说我们已经得到结论的话，那便是广正面战略仍然势在必行，不过艾森豪威尔却同意21集团军群应指向安亨，尽早遂行北进的打击作战。他还认为，指向安亨作战的成功，将极有利于尔后的作战行动。

经过努力，艾森豪威尔终于决心采取我所建议的行动。对萨尔地区的挺进也中止实施，将3个美军师的车辆全部集中，用以担任对21集团军群额外供应物资的运输补给。第12集团军群的大部后勤机关也拨出以支援我右翼方面的美第1集团军。同时，我也经批准，和美第1集团军司令官何杰士将军直接打交道。

得到这些意想不到的承诺后，我便开始和邓普塞商讨我的计划，决定以9月17日为攻占安亨“市场园作战”的“D—日”。

艾森豪威尔于9月22日午后，在凡尔赛总部召集了一次会议，从事商讨未来战争计划的决策问题。那天安亨的情况并不太好，德军已经在安亨南方

切断了我们的行动走廊，并且在尼美根南侧的维格赫勒和格拉夫间的干线公路上建立了坚强的防御阵地。在这种状况下，我自然不便远离战场，于是，便让戴君干代表我出席会议。何况，我又自知无论在最高统帅部里还是在美军将领之间，都因在遂行战争问题方面的歧见而没有什么人缘；所以我想，在问题依然辩论未决的情况下，最好还是避而不露面为好。

我和艾森豪威尔 8 月 23 日在康德我指挥所里会晤的一幕，不禁又索回于我脑际。那天我曾请求他下决心支持我的计划，而他却拒绝了我的请求。在整整一个月以后，他才予我的计划以全力支持。可是，他这整整一个月的决心已下得为时过迟，我们已经无法避免我在一个月前所不幸言中的后果。

第一线的供应状况现在已非常糟。在我右翼方面的美第 1 集团军由于没有得到所要的弹药，所以一直到 10 月 6 日还无法按计划展开作战。10 月 7 日，我由爱恩德荷文致电艾森豪威尔，就北翼方面的状况提出了非常详尽具体的报告，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除非拨配支援作战的供应物资能够迅速运补，否则我将无力挺进到莱茵一线。我还提到我已经请布莱德雷在第二天——也就是 10 月 8 日，前来共商对策。

在 10 月 8 日布莱德雷到我指挥所来的那天，马歇尔将军也一道前来，我曾在我的指挥车里和马歇尔单独长谈。我告诉他，自从艾森豪威尔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亲理地面战斗的指挥以来，陆军各部队间的区分地境便不是“地理性”的，而变成为“国家性”的。控制既不严密，作战指挥和掌握也不够确实。事实上，我们的作战已经脱节，我们已经陷入一种一团糟的状态，马歇尔一直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言。可以想见，他对我的说法是完全不同意。

10 月下旬，当我和邓普塞解决了未来的计划后，便回到布鲁塞尔我的总部。我在那里指导打通安特卫普的作战比较方便，负责这一作战任务的部队是在席蒙兹指挥下的加拿大第 1 集团军。原任司令官库瑞阿将军这时已因病调回英格兰。

在塞纳河北岸盟军战略的形成，可以说是战史上最尖锐龃龉的空前代表作。我们争来辩去、相持不决的受害者是德国人。我一直认为我们在 1944 年 9 月间最严重的失策是未能继 8 月诺曼底会战后乘胜扩张战果，从而一举破摧、瓦解德军。

有些人曾指责我，说我没有执行艾森豪威尔关于优先开放安特卫普港口的命令，还有，我不应该在安特卫普港口开放以前就贸然遂行对安亨的作战。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艾森豪威尔根本就没有下达过有关安特卫普的命令，同时，对安亨的作战又是经他同意之后才实施的。实际上，截至 1944 年 10 月 8 日止，我所受领的命令都不外“应竭尽人类精力之可能限度”以挺进到莱茵河沿岸线。至于予开放安特卫普以最高行动优先，则是 10 月 9 日的事。

问题纠缠不清的症结在于艾森豪威尔一直念念不忘于萨尔、法兰克福地区、鲁尔、安特卫普和莱茵沿线。德军在诺曼底的那种顽强奋战的情形我看得很清楚。想要在一次前进运动当中攻占这些目标，是不可能的事。假如艾森豪威尔能采用我的计划，他至少能早日攻下安特卫普和鲁尔，能在北部的莱茵河上获得桥头堡，因而必将能处于极有利的态势。或者假如他能采用布莱德雷的计划，则他也将能早日进入鲁尔和法兰克福地区，能在中部和南部的莱茵河上获得桥头堡。但是，他却过分乐观折衷行动。结果，预期的一切目标都没有实现，而不得不面临一种相当尴尬的状况。

我个人对此自然感到极度失望。我曾希望我们能迅速结束对德战争，以挽救数以千万计的生灵，以解脱不列颠人民的战祸之厄。但是，这些希望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到今天想起来，有关北渡塞纳河后战略问题的争辩和在理解方面的格格不入，是有其曲解用语的“因辞害义”根源。这种战略观念的争论一直被打着“狭窄正面对广大正面之争”的招牌。在艾森豪威尔的形容下，我的计划是种“铅笔似的挺进”。有一次，他则称之为“刀状挺进”。可是，运用兵力达40个师的声势浩大的挺进，不但不能形容为“狭窄正面”，而且应该是种有力的打击才对。当时我对这种战略原则的解释是这样：对于一个已经立足不稳的敌人，应该运用“一举挺进”的重击将他打倒。这种战略也是根据我在沙漠战役里所运用的，一拳击倒敌人的“左翼”战法而形成的；不管怎样，对这种勾当总还懂得一点。一旦我们将自己的思想用“狭窄”这一形容词加以曲解之后，形形色色支援广正面的论争自然也就接踵而至，诸如“铅笔状”和“刀状”的帽子也就戴在我们的战略头上。

继诺曼底辉煌胜利之后，之所以发生类似令人丧气的风风雨雨，可以说完全尾因为不管决策如何，都从没有彻底执行过。我们在诺曼底的地面战略以及计划都非常清楚明了。每个接合点都“天衣无缝”，所以那次会战才能打得攻必克、战必胜。我们在诺曼底会战后的战略则是毫无结合——上面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下面全在各自为战。

决策的正确与否还有待辩论，但有一点却不容否认，就是不管所决定的战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全都一概毫无指导。我们并不是在一个“广正面”上挺进到莱茵的，我们是在“几个正面”上，而且是在毫无协调的状态下向莱茵挺进。德国人对我们这种行动的答复是什么呢？在亚尔丁集中兵力给我们以一记迎头痛击。于是，我们就变得失去了均衡，攻势也发生了不应有的顿挫。

我于11月6日离开布鲁塞尔回到英格兰，休息了几天。

自从5个月前我们在诺曼底登陆以来，大家都过着一种非常苦闷的日子。我也确实需要短期的休息。

回到英格兰后，我便马上去见首相，将我们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作了汇报，同时迁告诉他，战争将在冬天继续下去，一直到1945年。

11月10日，我离开英伦，回到布鲁塞尔总部。

我们按照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向鲁尔地区挺进，在这次挺进中，我们必须克服两大河川障碍——缪司和莱茵。无论采取哪条接近路线，我们总是免不了大型运河的障碍。

我的计划是越过所有障碍，向莱茵猛进，乘敌人完成阻止我们前进的部署以前，迅速夺取莱茵对岸的桥头堡。

在布朗宁中将指挥下的盟军空降第1军，这时已经配属给我。这个空降军的所属单位是：英空降第10师、美空降第82师、美空降第101师，以及波兰伞兵旅。我将它列入邓普塞所指挥的第2集团军的序列之下。

我已在前面交代过，为什么北翼的挺进将指向安亨方面。这一计划的基本着眼点是：在主前进轴的各处主要水上障碍上，铺下一条空降部队的“地毯”，这五处主要水上障碍位于爱恩德荷文、乌登、格拉夫、尼美根和安亨。作战部署是以何若克指挥下的第30军沿“地毯”轴线前进，在安亨地区和英空降第1师会师，并在安亨北侧的耐德·瑞金河上建立一处桥头堡阵地。

然后，再以第2集团军在安亨和须德海间的一般地区东向进出，以便能发起鲁尔区北翼的作战。

与第30军沿空降“地毯”轴线北进的同时，另外两个军则在后面跟进，扩展前进轴线的空间——东翼方面是欧康诺的第8军，西翼方面则是李奇的第12军。

这次作战的代号是“市场园作战”，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是最具有创意的战争之一”。可是，当初他听到这一计划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阻止，因为他怕万一因此打开了向北翼进出的方便之门，我曾要求将美军部队放在我的指挥下，从事战果扩张的行动。他和巴顿是力主双重挺进的人物——萨尔和鲁尔并进案。每当艾森豪威尔要支持鲁尔案的时候，巴顿总是悻悻地说，在英军里从没有过像他那样的优秀将领。

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念念不忘占领萨尔和鲁尔，而哈佛尔和安特卫普两个港口的开放则只不过是挺进中顺便的行动而已。在他所有下达给我的命令里，从来就没有任何放弃这种企图表示，直到10月9日，他才破例儿第一遭提到安特卫普，才将安特卫普的打通视为最优先的任务。

我在9月14日所下达的命令，可说是极有趣味，因为我曾力图在命令的字里行间表示出我在试图贯彻他的意图。下面是命令全文，其中第2和第10段尤其值得玩味。

作战训令 M525 号

1、眼下哈佛尔业经攻占，我军已处于有利态势，已经展开攻略鲁尔区之作战行动。

2、安特卫普港口虽已被我军占领，但由于敌军对些尔德河口之控制，尚无法利用该港口；肃清些尔德河之残敌，以早日开放安特卫普港口，将为加拿大军团之优先任务。

3、在本集团军群右翼方面之美第1集团军已进入德境，正与据守“齐格菲防线”之敌保持接触中。在南方之美第3集团军亦已在摩塞尔河上占领桥头堡多处。

4、我军即将与第12集团军群开始并肩作战，以孤立并包围鲁尔区。我军将根据情况占领该地区。因此，鲁尔系我军之真正目标。但于挺进鲁尔途中，尚须攻占安特卫普与鹿特丹两港口，盖鲁尔之攻占，仅系我军循北路进入德境之第一站也。

企图

5、捕捉歼灭佐雷——戴文特——克莱夫——文罗——麦士特利支一线以东之敌，尔后向东进出，攻战鲁尔地区。

战区划分

6、第21集团军群与第12集团军群：

以下线上属第12集团军群：

哈塞勒特——乌塔德——加尔兹维勒——莱维尔库森。

以下线上属21集团军群：

奥普拉登——瓦尔堡——布隆斯威克。

7、前述之地境线，仅可视为一般行动基础。英第2集团军之一般运动应先北后东，迂回鲁尔区之北面。美第1集团军之一般运动方向为东向迂回鲁尔区之南翼。鉴于两集团军之间相互远隔，是以各应采取特种手段，以确保内翼之安全。

加拿大第 1 集团军

8、次第完成布伦与加来之攻占任务。

9、敦刻尔克之攻占，应于尔后行之；目前应仅对之加以监视。

10、该军团应尽全力于安特卫普之攻势作战，务期安特卫普港口能早日开放使用。空降部队将协力此一作战。

对瓦尔赤伦岛之空军作战，目前已经开始，其行动目标如下：

(a) 摧毁公路与铁道桥梁，以孤立该岛。

(b) 攻击海防火炮。

(c) 攻击敌炮与高炮部队。

11、第 1 军司令部与第 49 师应尽快由哈佛尔地区推进至安特卫普地区。

第 51 师应拨出所有车辆，在哈佛尔半岛待命，所有车辆全部供第 10 段所述机动之需；在所属车辆供加拿大军团完成物资运补与部队机动前，该师就继续在现地待命。

12、加拿大军团应自 9 月 17 日起，接替第 2 集团军在安特卫普地区之防务。

两军防务交代完成后之边界线应由加拿大军团决定。

13、加拿大军团于完成前第 10 段之作战，打通安特卫普联络后，应沿布累达——乌得勒支——阿姆斯特丹一线继续北向作战。集团军边界线上亦属加军团：

赫伦萨勒斯——梯勒柏格——赫拖金波许——兹阿勒特波海——乌得勒支——希尔佛萨姆。

任务，捕捉歼灭边界线以东之敌并开放鹿特丹港口。

14、尔后，加拿大军团将转战于第 2 集团军之左翼（或北翼），遂行指向不来梅与汉堡之作战。

英军第 2 集团军

15、该集团军之首要任务为向北遂行作战，并在安亨——尼美根——格拉夫一带地区内确保莱茵与纓司尔河上之渡河点，一个下辖二师兵力之空降军即配属该军团，以遂行此作战行动。

16、该集团军应在佐雷——戴文特——安亨一线巩固东向之立足，并在色尔乐河东岸建立深入之桥头堡阵地。

尔后，应准备自此阵地向东，向莱茵——欧斯那布如克——哈姆——蒙斯特地区前进。

在此前进运动中之重点应置于右翼，指向哈姆方面，尔后从哈姆地区向南，沿鲁尔区东侧发起有力挺进。

17、北向夺取前 15 段各渡河点之挺进运动，应不愿翼侧任何情况，充分发挥迅速果敢之精神，锐意向北挺进。

尔后，该集团军应采取必要手段以扩展初期挺进地区，构成一安全补给线。

18、此等作战之“D—日”定为 9 月 17 日。如天气恶劣不适于空降作战时，则向后顺延。

第 12 集团军群

19、美军第 1 集团军东向运动之行动如下：

(a) 第 5 军指向波昂。

(b) 第 7 军指向科隆。

(c) 第 19 军沿第 7 段所示之集团军边界线负责北翼掩护任务。

20、该集团军之任务为攻占波昂与科隆，并于莱茵东岸建立一约 10 英里纵深之桥头堡。

21、该集团军尔后应迂回鲁尔区南侧，继续向东挺进。在作战行动、时机方面将与英军第 2 集团军迂回鲁尔区北侧之运动取得密切协调。

在此次作战期间，余将与布莱德雷将军确保紧密接触。

一般事项

22、各部队应特别注意 1944 年 9 月 3 日 M—525 号作战训令之第 15 段。我军在进入德境后，各级司令部营区与各级部队驻地均须有严密措施，以防止敌谍与纳粹党之特务分子渗入。狙击可能将形成一特须提高警觉之问题，高级军官在防区行动时，必须注意本身安全。

进入德境后，敌国人民可能将极迅速表明其态度，因此我军应针对当时状况做好应付准备。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非常快。他接到我这一作战训令的副本以后，马上便给了我一封回信，表才完全同意。他显然认为，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辩来辩去、格格不入的情况下，我定会珍视此类的函电。

“市场园作战”终于在 1944 年 9 月 17 日全面发动，这次战役曾经在很多作家们的笔下有过极生动的描述，其中最逼真而最完全的一部是彻斯特·魏勒摩写的《争取欧洲的斗争》。我在这里不再赘述。在那次战役里，我们并没有像一般人所了解的那样曾经攻占过安亨北侧的桥头堡。因此，我们未能使第 2 集团军进出安亨附近耐德瑞金河北岸地区，而不得不将他们配置在能遂行对鲁尔区北面作战的适当位置。但是，在缪司河上的格拉夫以及在莱茵下游（或是荷兰境内的瓦尔河）的尼美根两处渡河点的确具有非常大的战略价值，因为只有占据这两处渡河点，我们才能据以光复荷兰，才能拥有一块可以在莱茵地区连续作战的踏脚石。假如没有这些作战成果，则我们于 1945 年 3 月间对莱茵的强行渡河计划也不可能成功——不过，我却不能否认，我们一直没有拿下最后的桥头堡。

当时，我们的确已经没有充分的余力来完成会师行动，于是我便下令空降师于 9 月 25 日夜将残部撤到安亨附近的耐德·瑞金河南岸，加入我军阵线。全师约两千名不能移动的伤员和军医与看护兵全部留在桥头堡地区被德军俘获。

全师生还的高级军官除师长欧克哈特外，只有一位准将（祁克斯）和炮兵指挥官罗德·西蒙斯。在全师的营长里面，除一名生还外，其余的则非伤即亡。

生还的其他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只有：军官 125 名、滑翔机飞行员 400 名、士官和战士 1700 名。退下来以后，我便立刻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安亨之战之所以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最根本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在最高统帅部的心目中，并没有将这次作战视为盟军在北翼方面主要行动的前锋，北翼方面主要行动的目的在于孤立并攻占鲁尔区——也就是德国在晒线方面所丢不起的一个目标。我一直认为艾森豪威尔总是念念不忘向北翼挺进，以行动优先。他曾下令如此做，同时他也认为已经做到了。可事实却不然。我们从布莱德雷所著《一个军人的故事》那本书里可以清楚地看出，9 月中旬，在第 12 集团军群里，美第 1 和第 3 集团军所获得的后勤

物资完全一样。

艾森豪威尔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他是个坦率笃诚的化身，他对别人能够完全推心置腹，相信别人一定会照他所要求的去做。殊不知，这次别人却并没有贯彻他的意图。

第二，空降部队在安亨的降落，距离重要目标的桥梁过远，他们在降落几小时以后，方才到达桥梁。这项错误，应该由我负起全责，我应该命令第2集团军和空军第1军，在计划空降作战的时候，至少要以一个完整的伞兵旅，降落在距离桥梁相当近的地方，以便能在降落后几分钟之内，加以攻略占领，并且能有充分时间，加强防御部署。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

第三，是天气因素。行动开始第一天，天气就变得不利于我们，致使我们无法实施大规模空降计划。不过无论在什么时候，天气永远是种无法把握的因素。这些没有把握的因素，我们都已经计算进去。但假如我们能多拨配必要的物力以支援这个计划，使之成为一个“盟军”计划，而不仅仅是个“英军”计划，那么，我们必定能使这次作战由没有把握变成为有把握。

第四，德军的第二冲锋队装甲军在诺曼底被打垮以后，已经在安亨地区完成整编。我们事前也明明知道那个军在安亨地区，但是，我们却错误地判断那个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实际上，它的实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料。当我们的空降第1师开始行动以后，那个军竟能很迅速地对空1师发起反击。

这次也像诺曼底会战后的情形一样令我感到失望。这是我第二次试图迅速攻占鲁尔。比勒·威廉士曾一再告诉我，德国人在丧失鲁尔后，顶多还能再支持三个月。可是，鲁尔却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我低估了开放安特卫普这一行动的困难程度。我以为当我们去攻鲁尔的时候，加拿大军团能胜任这一任务。可是我错了！

“亚尔丁会战”开始于1944年12月16日，持续到1945年1月16日，这场为期一个月的会战曾引起英美两军间许多齟齬。

艾森豪威尔于11月28日来到宗荷芬我的战术指挥所，我们曾两度交换过意见。话题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般情况——一种令人很难满意的状况。

由于诺曼底会战之后错误战略的运用，我们不得不面临冬季的消耗战局，不得不坐视所费不货的人命牺牲。当时美军各部队。都痛感弹药的青黄不接，各师的步兵排都兵员不足，而兵员补充状况却又糟糕得无以复加。冬季降临以后，第一线各美军步兵师的战士们渐渐开始感染严重的脚气病，而我这个集团军群里与日俱增的伤患数字也令我忧心忡忡。

我在和艾森豪威尔的那两次谈话中表示，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战术行动方面有失均衡。我建议他将巴顿的若干个师由南向北调动并且立即停止他在南翼方面的攻势，艾森豪威尔将我的看法转告了布莱德雷，12月3日，我接到布莱德雷一封信，他表示不能如此做。

在我的要求下，艾森豪威尔于12月7日召集泰德、布莱德雷和我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我说：“为迅速赢得这场战争，必须注意两大基本要素：

第一，在西线方面唯一有价值的目标是鲁尔。假如我们能将这一带地区和德国其余部分隔断，则敌人的抵抗力必会逐渐减弱，以至消失。

第二，我们必须在春末或夏初，迫使德军遂行机动作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油料已经所剩无几，他们战车的性能也不能在机动战斗中和我们一较短长。一旦战争机动化起来，那也就是德军末日的来临。

这两大要素是基本性的、是根本性的，绝不应再有任何争辩和讨论。因此

a、鲁尔区必须列为我们的首要战略目标。

b、我们的主攻必须都指向北翼方面，因为只有那一带——鲁尔以北，才是适于机动作战的有利地区。

任何其他进入德国的路线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其他方面的地形都易守难攻，想要取道其他路线进入德国，则会使大战陷于持久战；而阵地防御战又是最合敌人胃口的。

我们一定要在北翼方面力求形成强有力的攻势，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才不至于有任何失败的可能。目前，我们是在执行 10 月 28 日的训令计划，但那项计划早已经胎死腹中。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各阶段的行动必须要有利于基本目标的达成。

新的酝酿计划必须着眼于在冬季遂行持续不断的战斗，以消耗敌人的力量。很多困难将随着泥泞的道路和缺乏空中支援而来，但我们必须在整个冬季达成以下作战目的：

a、夺取向鲁尔地区进击途中的中间目标。

b、以最少的代价，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c、为来春发起机动战役，形成有利态势。

冬季作战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设法迫使敌人的 6 个装甲军团决战并将之彻底击败。因为这 6 个装甲军团是敌人在西线唯一的战略预备部队，同时，这些军团所辖各师又是德军唯一能在机动战役中有所作为的部队。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冬季打垮这些师，这样，春季来临时，它们便全部陷于瘫痪。

德军必将拼死奋战，以阻止我们进入鲁尔区，从而使战争阵地化，防止战争机动化。

因此，在莱茵以西地区强迫他们决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为此我建议：

第 2 和 21 集团军群都应该在亚尔丁以北地区作战。第 12 集团军群的右翼应位于普鲁姆附近。沿普鲁姆——波恩轴线的西北方向猛力突进，这样可以稳占地形之利，同时还能避开德军既设阵地和各天然与人为障碍。

第 12 集团军群指向莱茵的作战应循着两条重要轴线：普鲁姆——波昂线和土伦——科隆线，以至少 10 个师的兵力编成的左翼军团在纓司和莱茵两河中间地区向南突进的 21 集团军群的北侧遂行向北突进的作战。

第 12 集团军群的编成兵力应在 35 个师左右。

21 集团军群加以重新编组后应从尼美根地区，在纓司和莱茵河中间发起一次强大的南下攻势，目标是夺取欧梭埃——文罗一线以北、莱茵、纓司两河间的全部地区。

这将是 21 集团军群正面的唯一攻击行动，我们必须投入全力，支援其成功；这项攻势行动将以从容的步调在冬季持续展开。目标是正月初一。

必要时，将以美军师和空降师加强 21 集团军群。21 集团军群应在威塞尔和尼美根之间的若干选定地点东渡莱茵河，尔后，在黎佩运河和莱茵河北地区展开机动作战，以北方迂回鲁尔进入德境，这一行动的实现日期可能在 1945 年 3 月间。

第 12 集团军群则在波恩地区东渡莱茵河，由南而北展开对鲁尔区的迂回

作战。

以南法马赛为基地的第 6 集团军应尽力续行在萨尔地区的作战。

我认为应该指定一个指挥官负责亚尔丁以北地区所有部队的掌握与作战指导。那位指挥官必须是我或者布莱德雷，我很愿意接受布莱德雷的指挥。

艾森豪威尔听了我的发言后说：“我们不能大过分强调进入鲁尔区的行动，鲁尔只下过是个地理目标而已，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捕杀德军，至于究竟该在什么地方达成这一目的，则无关宏旨。”

对这种解释我表示反对。我说：“如果我们向鲁尔地区前进，那么，肯定会捕杀到比任何地方都要多的德军，同时我们还能达成夺取或孤立鲁尔区的目标，以贯彻基本计划。”

他表示同意将第 12 集团军群的左翼加强到足以到达莱茵。

但他对将全部第 12 集团军群转移到普鲁姆以北的办法并不赞成。

他说：我认为第 12 集团军群的右翼应该相当强大，并且应该挺进到窝姆斯附近的莱茵河沿岸，尔后，应该沿法兰克福——卡塞尔一线发起一次有力的攻击。

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主意。

他的战役观点是：

a、在北翼应该是 21 集团军群和由 10 个师兵力编成的美第 9 集团军。第 21 集团军群的南部地界线应该在鲁尔区西北角、莱茵河上的欧梭埃附近。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东渡莱茵河，并由北方迂回鲁尔区。

b、第 12 集团军群的左翼负有牵制部队的任务，这些部队将对科隆——波恩地区及其以南发动佯攻加以威胁。

c、南翼的第 12 集团军群右翼应循着法兰克福——卡塞尔一线展开有力的攻击。

这项计划含有两个攻势行动：一是依照前（a）款的方式迂回鲁尔北侧，另一项是依照前（c）款的办法迂回鲁尔南侧，在这两个攻势行动的中间地区则将全部出之以威胁性的行动和佯攻。第 12 集团军群应由欧梭埃向东伸展——横跨亚尔丁直达窝姆斯。

我说，我实在不能同意这个计划。假如我们将所有作战的人力物力再分开，则任何一方面的攻击都不足以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我们切不可一错再错。

我表示，我们现在就是吃了指挥体系错误的亏，而这个计划将会越搞越糟。

显而易见，布莱德雷将在南翼的卢森堡方面担任向法兰克福的攻击。我已经把我的战术指挥所搬到松荷芬，以便能靠近布莱德雷，但他却一直没有北上。

现在我不得不搬到爱恩德荷文北侧去，以便可以靠近我自己的攻势方面。

我一再请求艾森豪威尔，准许我负责亚尔丁以北地区的作战，由布莱德雷负责亚尔丁以南的作战。按照他的计划，由我担任北翼方面的攻势，而由布莱德雷担任南翼方面的攻势。

而艾森豪威尔却要由布莱德雷一人负责南北两翼的作战。这样，当情况演变到需要当机立断必须尽快决策的时候，必将贻误战机。

最后，我再三恳求他集中所有的力量于北翼，使北翼的攻势强大得足以保证作战的成功。我恳求他马上将指挥体系组织健全起来。

我向他郑重进言，除非我们能办到这两点，否则我们决不可能成功，就是拖到春天也不会分出胜负。

艾森豪威尔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必须以两支大军齐头并进，才能赢得战争。

显而易见，现在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我们却仍然认为不曾失败，仍然要按照这一个计划干下去。

12月16日早晨，我突然觉得需要轻松一下。我便乘那架“迈勒斯”型轻便飞机到爱恩德荷文，在一个高尔大球场打了几个洞的高尔夫。支援第2集团军的空军联队队部正好就开设在附近的高尔夫俱乐部里，而著名高尔夫职业选手戴瑞斯又正好担任着联队队长的驾驶员。我和戴瑞斯不但非常熟，而且还是极好的老朋友，我们曾在沙漠里共过患难。

在出发前，我曾要求空军联队准许戴瑞斯到球场去接我并陪我一起玩。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我们兴高采烈地玩球，可是正当我们玩得起劲的当儿，我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说是德国人已经在当天早晨对美第1集团军正面发起了一次来势极为猛烈的攻击，并且目前情况尚不明了。我便立即和戴瑞斯告别，赶忙飞回松荷芬我的战术指挥所。

德军的攻击重点是第1集团军在亚尔丁方面的薄弱部分，也就是米德敦所指挥的第8军的正面，德军攻势发起之后，便在美国阵线上顶出一个相当大的突出部分。

战斗情况很快地恶化，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被从中拦腰斩断。他的总部开设在卢森堡境内，所以他对集团军的北半部完全无法掌握。我则一直能利用所派出的联络参谋组，随时掌握推进中的状况。我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确保第21集团军群右侧的安全。

12月20日10点30分，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我，命令我立刻负责突出部北翼方面所有美军的指挥。命令归我指挥的美军一共是两个集团军：在我紧盲翼方面的第9集团军（辛浦森）和第9集团军右翼的第1集团军（何杰士）。

当时第1集团军正在奋勇进击德军，战况非常惨烈。

我于11时在会上对邓普塞和柯瑞阿下达了必要的命令，中午时分便赶到第1集团军司令部，并令辛浦森到那里见我。我发现突出部北翼方面的情况非常混乱。第9集团军有2个军3个师；第1集团军有3个军15个师。自从会战开始以来，这两位集团军司令，既没有见到过布莱德雷及其任何高级幕僚，也没有接到过片纸只字的训令。

我的第一步措施便是确保北翼方面的战斗能够在整个的状况下遂行，能够固守住所有的重要地区，以及能够控制住遂行反击的预备兵力。

我将英军部队置于第9集团军的指挥下，让他们和美军战友们并肩战斗，并让第9集团军接过第1军团正面的部分防务。在美国预备队编成以前，我先将英军控制在第1和第9集团军的后方，做为预备队。这样，情况渐趋稳定，并终于恢复正常。布莱德雷也运用第2集团军，以类似的措施稳住了南翼方面突出部的阵脚。

这场会战到正月16日全部结束，艾森豪威尔于正月17日命令我将第1集团军交还给布莱德雷，第9军则继续归我指挥。

12月28日，艾森豪威尔亲临北翼前线视察，我们又一次交换了意见。当时我们已经控制住了亚尔丁方面的战局，我们的谈话主题集中在这次会战

以后的行动方面：会战后应该做些什么。我再次表示，应将鲁尔区列为最迫切的作战目标，一切力量都应集中起来，归一个指挥官统一掌握运用。

2月8日，在尼美根东侧地区，我们发起了“诚实作战”，以左翼依托莱茵东岸向南进击。

美第9集团军则于2月20日以其右翼指向杜塞尔多夫，呼应加拿大集团军的南下攻势，锐意向北进击。

3月10日，美第9集团军和21集团军群所部，终于由杜塞尔多夫对岸的牛斯到尼美根之间一气哈成地到达莱茵西岸，所有横跨河上的桥梁全被彻底破坏。同时，美第1集团军也于3月7日，在雷马根附近攻占了一座完整的铁道桥梁，并且立即在东岸建立了一处桥头堡阵地。这处桥头堡阵地对我们今后的作战具有极重大的价值。不但那一带地区的许多师的德军因而被隔绝在莱茵河西岸，更重要的是给予盟军一处可以随意发展的桥头堡阵地，使整个战役的遂行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到3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盟军各集团军已经在南起瑞士、北达北海的辽阔正面上，并警近迫莱茵河西岸。

在东渡莱茵的整三个月里，我一直不断地检查我们的后勤供应状况。当时的状况还相当好：我们储备有大量的油料、弹药和口粮，各部队的健康状况也正常，每个礼拜官兵的平均患病率不超过6.75%。我们在整个冬天总共才发现了301名脚气患者。

3月23日晚，我们又发起了“掠夺作战”，即在莱茵堡和瑞斯间广正面的强度莱茵河的作战。

作战发起时，首相正在我的战术指挥所里。3月24日凌晨，他亲眼看到各空降师纷纷降落在莱茵河对岸。现在，我们正遂行着深入德国腹地的战斗，我问首相，有史以来英军最后一次在德国领土上作战是什么年代？他说，那是1813年10月18日的“莱比锡会战”。参战部队是“火箭旅”——也就是今天皇家野炮兵“（火箭）营”的前身。

渡过莱茵河后，我便立刻就未来作战的计划问题和艾森豪威尔交换了意见。我们曾经举行过几次会谈，我一直主张将柏林列为首要目标。因为那是个政治中枢要地，假如我们能先俄军一步进入柏林，则我们在战后所面临的问题也必定会单纯得多，他曾同意我对德国首都重要性的评价，他说：“柏林显系吾人之首要鹄的。……是以余认为，吾人亟应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迅速向柏林猛进。”

但是，现在他又推翻前见，不同意我的看法了。他最近的观点可以由他1945年3月31日的来电里充分反映出来，他在那封电报的最后一段里说道：

“吾兄当亦注意及弟最近从未道及柏林其地。盖弟意以为，该地除仅系一地理名词外，别无其他意义可言，弟对此一城市之迅速夺取与否，认为与战局无关，而从未对此等问题介怀，须知弟之目的，在于歼敌也。”

在这种情形之下，再喋喋不休地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毫无用处。我们已在许多问题上一再激辩；现在想再做任何亡羊补牢之计已为时过迟。但是，自从诺曼底大捷以来，我一直主张应将在短期内击败德军视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急务。

因此，问题的症结已经不在于能否击败德军或者何时击败德军，而在于当最后胜利之日来临时我们应如何在欧洲方面确保一种政治均衡，以有利于赢得战后的真正和平。而达成此目的的最有效途径，只有抢先俄国人一步占有若干欧洲的政治中枢要地——地点是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若西方的政

治领袖们能根据合适的战争指导方针，对盟军最高统帅下达切合实际的训令，则我早就能抢先俄国人一步，掌握这三大政略要地。但是，实际怎样呢？当我们决心在南法用兵，以“天龙部队”在南法登陆之后，夺取维也纳的可能便化为泡影；因为登陆南法所需的兵力是由意大利境内亚历山大元帅那里抽调的，因而便于无形中使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境内的作战受到影响。我们应该留心斯大林对“天龙部队”在南法登陆的行动自始至终是深表赞成的。他自然赞成这种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麾下的红军就能抢在我们前头，稳稳当当地进入维也纳！

至于对布拉格的行动，也因我们这巡不前而坐失了抢先进入的良机。向东疾进的美第3集团军竟于4月底突然奉命停止在捷克的西部边境外一为什么？我始终没弄清楚。当最后再度奉命于5月初越过边境的时候，却又因命令的限制而未能长驱直入布拉格。布莱德雷在《一个军人的故事》里说过，他奉命不得前进到比尔森以东（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划为红军的解放范围）。假如盟军的命令迟到一步，则巴顿可能在24小时之内，已经进入了布拉格。

其实在诺曼底大捷之后就已经注定了坐失柏林的命运。

假如我们在政治方面打败了的话，那么就算取得了军事战略上的胜利，也于事无补，但美国人却不能体会到这一点；也正由于我们忽视了政治胜利的价值，所以我们从“欧胜日”那天起，便开始遭受折磨，并且一直到今天还深陷于这种折磨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要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一旦发现胜利的征兆，就应从政治上考虑，以决定尔后的行动。远在1944年秋天，我就已经清楚，我们那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能结束大战，但战后的问题却仍无法解决。

第十章 终于到来的胜利

走投无路，纳粹希姆莱乞降

受降书

最后的训话

英国陆军，大不列颠的光荣

我们于5月2日在维斯马和卢卑克两地挺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在俄军到达前6小时封锁住丹麦半岛。我们由维斯马向南直到易北河右岸的多米兹之间建立了一道东向防线。德国部队和平民为了逃避俄国人，纷纷向这里涌来。我们还在卢卑克到巴德·欧德梭之间另外建立了一道西向的防线。在这两道防线的中间，每条公路上都挤满了从东部逃来的德国士兵和难民。第2集团军在5月初2、初3两天所捕获的战俘有将近50万人。

1944年6月以来，德军在盟军手里遇到过两大灾难。1944年8月在诺曼底惨遭败绩，但那时他们还有喘息的机会，他们的人力状况足以编成新的师。但是，1945年3月间的惨败却又和当年诺曼底的败绩截然不同。人力和领土的惨重损失使他们再也无力编成新的部队。他们再也没有畅行无阻的交通，再也不能确保稳稳当当的机动了。因此，他们已经进退失据，对德战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希特勒的德国现在正面临着最后的劫运。

我于4月27日接到陆军部一份情报，说希姆莱在24日通过瑞士红十字会向英伦方面乞降。

希姆莱表示，希特勒已经病入膏肓，他（希姆莱）已经握有采取行动的全权。对此我淡然置之。在我的眼里，从东方杀奔而来的俄国人比已经丧魂失魄的德国人要危险得多。对德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德国人目前已没什么大的气候了。当前最迫不及待的行动是以全速向东北挺进，挺进到波罗的海沿岸，然后再向东构成一道防线。这是阻止俄军进入石勒苏益格——霍勒斯坦因地区并占据丹麦的唯一对策。

现在，局势急转直下。我们在5月1日晚从德国无线电台里收听到一个公报，说希特勒已经死在柏林他的指挥所里、并且已指定由杜尼兹元帅继任元首。公报对希姆莱则只字未提。后来，我的一个联络参谋曾经在弗伦斯堡杜尼兹的总部里看到过希姆莱。他判断，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纳粹要员，这时已完全失势。

5月1日下午，负责指挥波罗的海和威悉河间所有德军地面部队的布鲁门垂特将军曾上书第2集团军司令部，请求准许他在第二天早晨亲自前来洽降。但第二天，他并没有出现，只是派遣军使投书，表示有关投降的事情将由高层次统一协商处理。

5月3日，启泰勒元帅经杜尼兹元帅核准，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卢内堡沼地我的总部，开始洽降谈判，这个代表团于11点半到达，全部代表人员是：冯·弗瑞德堡海军上将——德国海军总司令。

金塞勒上将——布许元帅的参谋长，他的地面部队就在我的北翼和西翼。

魏格纳海军少将。

弗雷德勒陆军少校——一位参谋。

后来又赶来一个叫做波莱克上校的参谋，加入了他们这四人代表团。

他们被引到我的帐幕所在地，颓然肃立在做然飘扬于微风中的英国国旗下面。我让他们静候了几分钟，然后才踱出帐幕，向他们走去。他们都在英国国旗下面向我举手敬礼。这是让人感觉到极其兴奋、极其令人鼓舞、极其令人骄傲的一刹那。我知道这些德国人是来投降的，大战已经过去。在指挥所通信帐幕和作战帐幕里工作的官兵都不会忘怀那令人兴奋而紧张的一幕，都不会忘怀无线电里传来的微弱的“滴嗒”声，那是德军通信人员试图叫通我们的指挥通信网，以便能由他们的代表团听取有关投降的训令。

我的第一句话是问自己的译员：“他们是什么人？”他一一给我作了介绍。接着我又问，“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冯·弗瑞德堡上将便向我宣读启泰勒元帅的乞降书。他在那封信里要求我接受3个德军军团的投降，而这3个军团则正从柏林——罗斯多克间的俄军正面被迫向西退却。我当即断然拒绝考虑这件事。我说：“这些军团应该向俄军投降。当然，假如任何德军士兵举起他们的双手，走向我这一面，那么，他们自然会被视同战俘收容。”冯·弗瑞德堡说：“向野蛮的俄军投降，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他们会把我的士兵们送回俄国去做苦工的。”

我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在发起战争以前，尤其在1941年6月攻击俄国以前，早就应该想到今天这样的后果。因为，俄国人也绝对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更狡猾、更狠毒。”

冯·弗瑞德堡接着又表示，他们对在梅格林堡地区遭到俄军蹂躏的平民非常关切，他们很想和我们研究研究怎样可以救出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我告诉他：“很遗憾，我‘尊贵’的客人，梅格林堡不在我的责任地区范围之内，任何与这一带地区有关的问题必须和俄军研究。你们必须弄清楚，有关我东翼方面——维斯马和多米兹间一带地区的任何问题，我都一概拒绝和你们讨论；你们必须和俄军去研究这些问题。不过，我倒很想知道，你们是否有意就我西翼方面的投降事宜和我进行讨论？”他们表示不能。但是他们却特别关切这一带地区里的平民，想和我拟定一些计划，以便当我的部队推进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慢慢撤退，我当即予以严辞拒绝。

我决定运用一点高压，使他们迅速就范。我告诉冯·弗瑞德堡说：“你是不是愿意将在我西翼和北翼方面的德军——包括在荷兰、荷北的弗里斯兰、弗里西安群岛和石勒苏益格——霍勒斯坦因以及丹麦境内的所有部队，全部向我投降？假如你同意这样做，那么，我将会视同我当面敌军和在丹麦境内支援我当面敌人的敌军——的一种战术性战场投降而予以接受。”

他说，他不同意这么办。他一再表示急于就这一带地区里的平民撤退问题和我们达成某种协议。我拒绝讨论，并义正辞严地告诉他：“假如德军拒绝我所列举地区里的部队向我无条件投降，那么我将下令继续攻击；更多的德军士兵将会无谓地牺牲掉，有些平民也将在炮火和空击之下惨遭池鱼之殃。”接着，我又向他们说明全部西战场上的实际战况。他们对当前战况毫无所知，听到我的说明后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确信迫使他们就范已经不会再有多大的困难了。我认为此时应该休息片刻，使他们利用吃中饭的时间，冷静地考虑一下我的话。我叫他们在一个帐幕里面单独吃饭，只留下我的一个军官。据他事后报告，冯·弗瑞德堡在吃饭时曾潸然泪下，其他的德军将校也都默默无言。

饭后，我又将他们召来，这次会谈改在我的会议室里举行。我在会上摊开了一幅战况图。会谈一开始，我便对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我告诉他们，

一定要在我所列地区里的德军全部向我无条件投降；只有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我才会和他们讨论如何以最理想的方式占领这些地区，以及如何照顾德国平民。假如他们拒绝无条件投降，那么，我就要继续打下去。他们立刻看出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他们虽然明知大势已去，但却回答我说他们无权同意我的要求。他们准备现在就向启泰勒元帅建议，让第 21 集团军群西翼和北翼方面的全部德军向我无条件投降。他们决定派两个人回到德军大本营，向启泰勒当面报告，并带回他的批复。

于是，我便拿出一份会谈记录，我告诉他们，我和冯·弗瑞德堡两人心须在这上面签字，然后再带到弗伦斯堡，交给启泰勒和杜尼兹。

那份记录的内容如下：

“1、所有由东部进入第 21 集团军群地区并自愿投降之德军官兵，一概视同战俘处理之。

有关想让正与俄军激战中的完整的德军军团向盟军第 21 集团军群投降一事，不可能为盟军接受。

2、盟军不同意讨论有关平民的处理问题。

3、蒙哥马利元帅指令在荷兰、弗里斯兰、石勒苏益格——霍勒斯坦因，以及丹麦境内的所有的德军部队，应一律向其缴械，无条件投降。

蒙哥马利元帅准备于投降协议签订后就占领此等地区之方式以及处理战地平民等问题分别加以讨论。

4、冯·弗瑞德堡上将目前因未经授权，是以未能同意前第 3 条之无条件投降指令，因此，他将派遣将校二员（魏格纳海军少将与弗雷德勒陆军少校）前往德意志国防军大本营，觅致并携回有关无条件投降之同意批复。

因汽车行动过于缓慢，所以要求蒙哥马利元帅即拨派飞机 1 架，供该 2 员德军将校乘用。此外，并要求准予冯·弗瑞德堡上将与金塞勒上将二人暂留于蒙哥马利元帅之总部内。”

实际上，回到弗伦斯堡去的是冯·弗瑞德堡本人和弗雷德勒少校，而且他们还是坐汽车回去的，并没有搭乘飞机。我派自己的加拿大军侍从参谋瓦伦中校护送他们经由汉堡进入德军防线。我告诉他们，必须在第二天——也就是 5 月 4 日午后 6 点钟回到我的战术指挥所复命。金塞勒和魏格纳两人则留在我的总部里。

冯·弗瑞德堡和弗雷德勒回到我的总部的时候，我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一看到厄瓦特上校走进帐幕，就知道有了答案。但是，我却相当沉得住气地说完了在招待会上要讲的话后，才对厄瓦特明知故问：“冯·弗瑞德堡是不是已经回来了？”他回答说：“是的”。于是，我便告诉出席招待会的记者们，他们可以和我一道去我的会议室参观这最后一幕的演出。

德军代表团再度出现在我的帐幕外边，神态颓然地肃立于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旗杆之下，我先将冯·弗瑞德堡唤进帐幕，和他单独会谈。我问他，“你是否能就我所提出的全部投降条款在降书上署名呢？”他答称可以。他非常沮丧。我叫他再到帐外和其他的德军将校会齐。当时差不多将近午后 6 点钟，我下令立刻在一座专设的帐幕里开始受降典礼，那座帐幕里已经布置好了各种录音器材。在一群群英军官兵、战地记者和摄影人员以及其他人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德军代表团走进了帐幕——所有在场的人都显得非常兴奋而紧张。大家都知道，这便是大战的最后一幕。

我已经将降书准备妥贴。受降典礼所在的帐幕布置得极其简单——一张

铺着军毯的粗木会议桌上摆着一个墨水瓶、一支可能花两个便士买到的普通钢笔，还有两只英国广播公司的麦克风。当我走进帐幕时，德军将校们全都起立致敬；然后我们环桌就坐。德国人都显得非常紧张，其中一个人曾拿出一支香烟，打算镇定自己的情绪，我看了他一眼，他又悄悄地将香烟收了回去。

我在卢内堡沼地的那座帐幕里面，在新闻记者和其他观礼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用英语宣读降书。然后我告诉德军代表团，除非他们立刻签署这份降书，而不再斤斤计较于他们崩溃以后种种问题的辩论，否则，我将下令英军继续战斗。我唤着德军代表团里每个军官的名字，叫他们依次在降书上签字，他们当即默默地遵令照办。接着，我便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签署上自己的名字。

那份降书的正本是用英文写的，德军代表团自然是不会认得，我另外给了他们几份德文的副本。我在签字下面所写的日期原来是5月5日，后来打算改为4日，但是因为涂改得太不清楚，于是索性又将改写的“4日”删掉，另外在旁边重新写了个“4日”。降书的原件是用打字机清缮在一张普通的陆军公文用纸上面。最高统帅部虽曾要求我将原件呈送上去。但是我所呈出的却是照片。原件我则留在自己的手边，那是种有历史性的文献，我舍不得将它割爱。我们用以在降书上签字的那支钢笔则下落不明，可能是被什么人顺手牵羊拿走，作为那次受降典礼的纪念了。

降书全文如下：

降 书

荷兰、西北德国含所有岛屿，以及丹麦境内全部德军武装部队的投降文件。

1、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意以在荷兰、西北德国含弗里西安群岛、黑里哥兰与所有其他岛屿、石勒苏益格—霍勒斯坦因上述各地区以及丹麦境内的所有德军武装部队向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投降。

上述地区内所有德国海军舰艇均包括于投降德军部队之内。

此等德军部队应立即解除武装，向英军无条件投降。

2、上述地区内的德军均应于1945年5月5日（星期六），自不列颠夏令时间8时起，停止在陆上、海上与空中的一切敌对行为。

3、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尔后盟军就任何问题所下达的任何命令均应立即切实奉行，不得有任何争辩或阳奉阴违的事。

4、凡有违抗命令或奉行命令不力者，均将视同破坏此等投降条款的行为，而由盟军依照现行法律与战时习惯法加以调查，严惩不贷。

5、本降书并不属于经盟国所签署的适用于任何全德国或全部德国三军的全局性降书；一俟此类全局性降书签署，本降书即作废。

6、本降书分别以英、德两国文字制成。但以英文本为降书的正本。

7、倘有关投降条款的含义或诠释发生任何疑问或争执时，则应以盟军的抉择作为最后的裁定。

B·L·蒙哥马利元帅弗瑞德堡

金塞勒

魏格纳

波莱克

弗雷德勒

1945年5月4日18时30分

在这五位于5月3日来到卢内堡沼地我指挥所的德军将校中，只有一个人今天还依然健在。他是魏格纳海军少将，现在正担任着西德国防部海军部的副部长。其他3个人都不得善终：冯·弗瑞德堡饮药自杀，金塞勒饮弹自裁，弗雷德勒则在投降后不久死于车祸。

降书签署之后，还有许多要做的事。当德军投降代表团于5月3日来见我时，我已经下令停止一切攻势行动，我觉得大战已经结束，我实在不愿意使部队再遭受任何伤亡。接着，我又颁布一道正式停火令，命令的生效时日是星期六，1945年5月5日上午8点钟。

我认为有立刻对所属各部队指挥官和士兵们训话的必要；他们辛辛苦苦地翻山越海而来，而且在艰苦卓绝的奋战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勇敢、非常出色。现在大功告成，应该对他们着实地慰勉一番才是，我们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多半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的战斗，而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第一封公开信是给我的高级军官们的，全文内容如下：

第21集团军群当面的德国三军部队已经向我无条件投降。值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我对各集团军司令官以及后方交通线指挥官的能督励所部、克尽厥职，亟愿深致谢意。我原期能稍待大局小定之后，再以较得体的方式，从容表达由衷感激之情。然在兴奋激动之余，我深感迫不及待，而亟欲早日倾吐心声，以使各位得悉，各位的成就是如何卓越辉煌，我对能指挥第21集团军群这样的部队是如何深引以为自豪。希望把我由衷谢意，转致全集团军群官兵为要。

这封公开信发出之后，我又花费了相当时间，埋头起草了一封告第21集团军全体官兵书。很多士兵和军官都是由第8集团军一直追随我到欧洲来的。所以这封告官兵书，很不容易下笔。

我时常反躬自问，我们究竟是否已经赢得了和平。事实上，我想我们并不曾赢得。

告官兵书

1、值此欧陆战胜之日，我深感应对曾随我奋战数载之诸君，一叙衷肠。我所欲奉告诸君者，极简短扼要。

2、我曾与诸君共勉，对于在斗争中为国捐躯之同胞将永志不忘。他们为争取他们的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暴骨沙场、离魂异域，再没有什么人能作较此尤为壮烈伟大的牺牲了。我想，上帝必将嘉勉这些灵魂：“你辈善良虔诚信徒之作为，殊堪嘉许。”

3、现在我们历经百战而得余生，已目击了这一伟大斗争最后的胜利；我们对能够保全首领，目睹此全胜终局，莫不欢欣鼓舞。然而我们在鼓舞感谢之余，必须深刻体会此一全胜得之非易，必须饮水思源，而念及：“这是全能的上帝的所做所为，是我们心中所想而力所不能及的伟大奇迹”。

4、回忆大战初期，大英帝国在茕茕孤立的状态下独抗轴心列强的联合势力。其间，我们虽曾一再遭受惨重的挫折，然我们始终能巍然屹立。我们虽被迫困守一隅，然我们终能随处伺隙反击。待苏、美两大盟友，相继加入我们的抗暴行列后，我们的最后胜利即已确切在握，我们对于此两大盟友的隆情厚谊，实应永铭弗忘。这一伟大同盟组合，已经在战争中建树伟大成就，我迫切诚望和平时期的建树，将更千倍于战时。

5、诚然，我们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尚多。我们所立足的世界在大战之后尚难迅速恢复常态；须知我们的艰巨大业，正方兴未艾。

兹谨奉告各位，我们必须以面对此次大战最险恶时期的坚毅气质迎接这一方兴未艾的时期。展望未来，我们的国家与个人将面临若干荆棘遍布的前途，而唯有恃我们固有的纪律始能斩棘披荆，步入坦途康庄；然须知所谓卓越纪律之为物，应产生自牺牲小我、以

全大我之卓越气质。

6、我对能在西欧方面统率大英帝国加入这一伟大战斗行列；引为毕生的光荣。对各位负责尽职的指挥官，我重申感谢之忱。

7、今后我们更应以炽热的乐观心情共赴时艰。我们已经赢得对德的战争，今后更应致力于赢得战后的和平。

8、敬祝诸位身心康泰，事业成功。

对陆军官兵的公开信写好之后，还得要对其他军种有所表示才行。

自从大战于 1937 年爆发以后，陆军中能了解我们受惠于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究竟到什么程度的，恐怕除我之外更无他人。我和皇家空军之间的关系一直密切，但是和海军的配合就不是那么愉快。

我代表在西欧方面英帝国全体陆军将士，分别对海空军同胞各发出了谢函。

之后，我也接到了许多祝贺函电，其中最值得在这里加以引叙的是“陆军委员会”的贺电。因为我听说在我事业的早期过程中，陆军委员会一直对我不太满意。

由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好像他们过去对我的嫌隙至此已一笔勾销！

对于阁下与第 21 集团军群全体官兵今日所建的不朽成就，陆军委员会谨电驰贺。此次阁下在卢堡击败德军、所订城下之盟，不仅是过去 11 月来辉煌战役的成果，同时也是我们由西北欧一再退却、英国人民多年屹然孤立奋斗、争取自由以来，卧尝磨励的结晶。今天，阁下已与盟友大军携手并肩，击溃顽敌，完成了伟大事业。

举国对阁下卓越的统御风格以及阁下所部将士英勇奋战的气概无不深感钦佩。自有历史以来，不列颠从未如此倚重其陆军；英军对于祖国的贡献，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言表。

